



第六十四届会议

暂定项目表* 项目 58 (b)

消除贫穷和其他发展问题:

妇女参与发展

关于妇女在发展中的作用的世界概览

秘书长的报告

妇女对经济资源的控制和获得财政资源，包括小额供资

摘要

《关于妇女在发展中的作用的世界概览》报告着重讨论影响了妇女在经济中的作用的新增发展问题，每五年向大会第二委员会提交一次。本报告是第六次《关于妇女在发展中的作用的世界概览》。大会在其第 59/248 号决议中请秘书长在 2009 年更新《世界概览》，又在其第 60/210 号决议中决定本概览的主题是“妇女对经济资源的控制和获得财政资源，包括小额供资”。

* A/64/50。



目录

	页次
一. 导言	4
A. 全球政策和法律框架	5
B. 两性平等获得和控制资源	8
C. 《关于妇女在发展中的作用的全球概览》的结构安排	12
二. 宏观经济与赋予妇女经济权力	13
A. 宏观经济环境	13
B. 宏观经济和贸易政策	15
C. 妇女在经济决策中的话语权	24
D. 为赋予妇女经济权力创造有利环境	25
三. 获得充分就业和体面工作	26
A. 劳动力市场的制约因素	27
B. 进一步获得劳动力市场上的经济机会	32
四. 获得土地、住房及其他生产性资源	38
A. 土地和财产	39
B. 共有资源：水和森林	43
C. 基础设施、服务和技术改进	45
D. 住房、公用事业和服务	47
五. 获得金融服务	50
A. 妇女获得正规金融服务	51
B. 小额供资和两性平等	52
C. 女企业家获得金融服务	59
D. 妇女参与金融部门的决策	62
E. 增强妇女获得金融服务	62
六. 获得社会保护	63
A. 制订全球最低社会保护制度	64

B. 儿童的收入安全	66
C. 对具有经济活力年龄组中的穷人和失业者的社会援助	68
D. 老年人和残疾人的收入支持	70
E. 获得基本保健福利	73
七. 结论和建议	76
A. 未能解决有性别区分的制约因素	76
B. 赋予妇女经济权力的倍增效应	77
C. 以就业为中心、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相结合的、对性别问题有敏感认识的发展战略	78
D. 协调办法	79
E. 建议	81
参考文献	88

一. 引言

1. 妇女平等获得和控制经济和财政资源，对于实现两性平等和赋予妇女权力以及实现公平和可持续的经济增长与发展至关重要。经济资源是指直接的生产要素，如“不动产”，包括土地、住房、共有资源和基础设施，以及“可动产”，如生产设备、技术和牲畜。财政资源是指以货币为基础的资源，包括政府支出、私人资金流和官方发展援助，以及收入、信贷、储蓄和汇款。经济和财政两种资源对于妇女维持家庭生计及其在劳动力市场和更广泛的经济中发挥作用具有重要影响。
2. 劳动是大多数人，特别是低收入家庭可以获得的主要资源，劳动力市场是许多妇女和男子满足其自身及其受抚养人需求和投资于未来的手段。尽管在发达国家和转型经济体中绝大多数劳动力拥有带薪工作，但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则分布在带薪工作岗位和各种形式的自营职业中。
3. 世界低收入家庭的生计战略一般不会集中在一种经济活动形式上，因为没有哪种单一的经济活动使他们能获得固定的或丰厚的薪水以满足其所有需要。因此，这些家庭的妇女和男子参加各种不同的经济活动，常常为寻求新的机会而迁移。然而，这些经济活动一般都属于劳动密集型，它们并不能与以带薪工作为主的劳动力市场的传统经济模式完全吻合。穷人生计战略中的劳动密集型活动包括：无报酬的家务劳动、计件工资工作和无数自营工作，如非正规的小型贸易、服务和制造企业（Whitehead, 2005年；Chen等人，2005年）。虽然这些活动为世界大多数贫穷劳工提供了一种谋生手段，但在官方统计中却罕见其踪影。
4. 妇女和男子的生计活动回报，取决于其劳动质量及其“人力资本”以及他们所能调动的经济和财政资源。由于在资源分布上长期存在两性不平等现象，因此，相对于男子而言，妇女处于劣势，而男子能够参与并受益于更广泛的发展进程。这常常使得她们不得不依附于男性的供养，以满足其家庭的部分或全部需求。
5. 改善妇女获得和控制经济和财政资源的政策，将直接影响妇女获得经济权力和更广泛的发展进程。将这些政策植根于一套权利框架，以确保妇女获得和控制资源，成为其应享的公民权利的一部分，而不是听由男性供养者摆布、靠国家慷慨解囊或受制于变幻无常的市场。
6. 尽管在赋予妇女经济权力的许多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例如，通过提高妇女教育程度和增强其有报酬工作份额——但对妇女根深蒂固的歧视和不平等现象仍然存在。变革步伐一直缓慢而且不均衡。教育水平提高并没有带来两性平等和劳动回报的改善。更多地参与有报酬工作，没有转化为她们在家中的无偿劳动负担减轻。妇女持续遭受暴力侵害制约着各地区许多妇女获得和有效利用经济

和财政资源的潜力。无法获得和控制经济和财政资源，如土地、个人财产、工资和信贷，会使妇女更容易遭受暴力侵害（联合国，2006年a）。

7. 大量强有力的证据表明，在经济和财政资源分配方面，两性平等不仅有助于增强妇女的福祉和获得权力，而且对一系列重要发展目标，包括减贫和经济增长也具有积极的倍增效应。另外，数十年以来，在妇女有偿劳动和无偿劳动的重要性上、在获得和控制资源、使家庭摆脱经济危机方面，也都积累了大量证据。

8. 越来越多的例子表明，国家、国际组织、公司、妇女组织、劳工运动及民间社会的其他阶层均在为应对不平等现象采取行动。事实上，所发生的变化表明，两性不平等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们是能够改变的，是可以从行之有效的方法中吸取大量经验的。《关于妇女在发展中的作用的全球概览》将审查在这方面取得的进展及继续阻碍或减缓进步速度的障碍。

9. 第六次《世界概览》是在全球经济的制度弱点受到质疑的时刻编写的。2007年发生的粮食和燃料危机已被更为严重的全球金融危机所替代，后者的严重程度令世界可能要进入一个漫长的经济衰退期。这场金融危机的后果已经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经合组织）国家得到赤裸裸的体现，如：各大银行破产倒闭、其他金融机构用纳税人的大量现金进行拯救、房地产市场崩溃以及许多经济部门的失业率在不断攀升。

10. 这场危机正在通过全球经济的各种途径对发展中国家缓慢地产生负面影响：如贸易、移民、资本流动、直接投资和官方援助。早期迹象显示，出口订单下降，汇款减少，贸易保护主义呼声抬头。预计在未来会出现大量人员失业、外国直接投资减少、援助流量缩减，因为捐助国的经济在萎缩，这些国家政府要将收入用于解决国内问题。危机对两性平等的影响必须得到解决。

A. 全球政策和法律框架

11. 在1995年举行的第四次妇女问题世界会议、2000年举行的大会第二十三届特别会议和其他政府间进程，包括2002年举行的千年首脑会议、2005年世界首脑会议以及2002年举行的发展筹资问题国际会议和2008年举行的审查蒙特雷共识执行情况的发展筹资问题国际会议上，国际社会就两性平等和妇女在获得和控制资源方面做出了有力而全面的承诺。

12. 《第四次妇女问题世界会议行动纲要》认识到，赋予妇女权力是消灭贫穷的一个关键因素。¹《行动纲要》突显了男女在其社会中获得经济资源及对经济

¹ 《第四次妇女问题世界会议的报告，北京，1995年9月4日至15日》（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C.96.IV.13）。第一章，第1号决议，附件二，第49段。

资源行使控制权的机会方面存在着差异。²《行动纲要》建议各国政府和国际社会从两性平等角度分析政策和计划，以促进生产性资产、财富、机会、收入和服

13. 大会第二十三届特别会议认识到，应当制订政策和方案以确保生计和充足的社会保护措施，包括建立安全网及加强家庭支助系统，促进平等获得和控制财政和经济资源，以在妇女中消除日益严重和不成比例的贫穷。⁴

14. 妇女地位委员会在其 2008 年通过的关于为两性平等和赋予妇女权力供资的商定结论中，敦促各国政府进行立法和行政改革，使妇女能够充分和平等地获得经济资源，包括获得继承权和拥有土地及其他财产、信贷、自然资源和适当的技术。⁵2009 年，在有关“男女平等分担责任，包括照顾艾滋病毒/艾滋病感染者”的商定结论中，该委员会敦促各国政府制订和完善可持续的和适当的社会保护和/或保险计划，包括养老金和储蓄计划，以满足最低限度的基本需要，在计算相关福利金时承认相关的假期。⁶

15. 2005 年，妇女地位委员会在其关于“提高妇女经济地位”的决议中呼吁各成员国进一步促进金融领域的发展，通过鼓励和发展中介机构，促使妇女进一步获得和控制储蓄、信贷和其他金融服务，在平等的基础上满足城乡地区女企业家的需求，让妇女充分参与管理、规划和决策过程。⁷

16. 在 2000 年千年首脑会议上，各国政府致力于促进两性平等和赋予妇女权力，将此作为战胜贫穷、饥饿和疾病的有效手段，以促进真正可持续发展。⁸后来通过的《千年发展目标》包含了关于两性平等和赋予妇女权力的目标，具体目标涉及就业、教育和参与。在 2005 年世界首脑会议上，全球领导人决心促进两性平等，消除普遍存在的性别歧视，特别是保障妇女自由平等拥有和继承财产的权利，确保妇女对财产和住房的使用权和所有权，促进妇女平等进入劳动力市场、

² 同上，第 150 段。

³ 同上，第 58 (b) 段。

⁴ 第 S-23/3 号决议，附件，第 53 段。

⁵ 见《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正式记录，2008 年，补编第 7 号》(E/2008/27)，第一章，A 节。

⁶ 见《社会及经济理事会正式记录，2009 年，补编第 7 号》(E/2009/27)，第一章，A 节。

⁷ 见《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正式记录，2005 年，补编第 7 号》(E/2005/27 和 Corr. 1)，第一章，D 节，第 49/8 号决议，第 7 段。

⁸ 第 55/2 号决议，第 20 段。

可持续就业及得到充分的劳动保护，确保妇女平等获得生产资料和资源，包括土地、信贷和技术。⁹

17. 在 2008 年通过的《关于发展筹资的多哈宣言》中，全球领导人重申其致力于消除一切形式的性别歧视，包括消除在劳动力市场和金融市场，尤其是在资产所有权和财产所有权方面的性别歧视。全球领导人决心促进妇女权利，包括赋予其经济权力，将两性平等观点有效地纳入法律改革主流、商业支持服务和经济方案中，让妇女充分平等地获得经济资源。各国同意促进和加强国家和其他利益攸关方在促进两性平等的公共管理方面的能力建设，包括但不限于将两性平等观点纳入预算编制。¹⁰

18. 大会在其关于“妇女参与发展”的第 62/206 号决议第 19 段中，鼓励各国政府进行适当的基础设施和其他项目投资，为赋予妇女经济权力创造机会，以减轻妇女和女孩繁重的日常工作负担。大会在其关于“改善农村地区妇女的境况”的第 62/136 号决议第 2 (f) 段中，敦促各会员国制订和修订法律，以确保在私人可拥有土地和财产的情况下，赋予农村妇女充分平等享有土地和其他财产的权利，包括通过继承权，通过采取行政改革和其他必要措施，给予妇女在信贷、资本、适当技术和市场准入及信息方面与男子同样的权利。

19. 人权条约、机制和文书中也涉及妇女获得和控制经济和财政资源问题。《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要求各缔约国采取一切适当措施，消除对妇女的歧视，并确保切实执行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任何其他领域男女平等的原则。各缔约国不仅有义务禁止对妇女歧视，而且有义务消除任何个人、组织或企业对妇女的歧视。该公约规定妇女在就业和经济生活以及公民事务上享有平等的不受歧视的权利，如订立合同和财产管理的权利。它还要求各缔约国确保配偶双方在财产的所有权、购置、管理、经营、享有和处置上享有同样的权利。

20. 《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要求各缔约国确保男女平等享有该《权利公约》规定的所有经济权利。《公约》还特别规定平等工资和男女同值工作同等报酬。

21. 《国际劳工组织（劳工组织）关于消除就业和职业歧视的第 111 号（1958 年）公约》要求各缔约国宣布和推行一项国家政策，旨在通过采取适合各国国情和实践的办法，促进就业和职业上的机会和待遇均等，以消除基于种族、肤色、性别、宗教、政治见解、民族血统或社会出身的任何歧视。《劳工组织关于男女工人同值工作同等报酬的第 100 号（1951 年）公约》规定，各成员国应通过适当

⁹ 第 60/1 号决议，第 58 段。

¹⁰ 第 63/239 号决议，附件，第 19 段。

有效的办法，确定报酬比率，并以此方式促进和确保同工同酬原则平等地适用于所有男女工人。

22. 《劳工组织关于有家庭责任工人的第 156 号（1981 年）公约》规定，为了有效促成男女工人的机会和待遇切实平等，各国应根据各自的国情和可能性采取一切措施，使有家庭责任的工人有权自由选择就业机会，在就业和社会保障条款条件方面考虑到其需求。《劳工组织关于保护生育的第 183 号（2000 年）公约》促进劳动妇女人人平等以及母婴健康和安。

23. 暴力侵害妇女行为及其因果问题特别报告员近期审查了当前全球政治经济秩序与妇女享有人权之间的内在关系，特别是暴力侵害妇女的深远影响（A/HRC/11/6）。

24. 劳工组织在 2009 年 6 月第九十八届会议讨论了工作领域的两性平等问题，将此作为其讨论主题之一，并且就以下方面通过了综合建议：就业、社会保护、工作中的原则和权利、社会对话、政府、雇主组织和工人组织代表参加的三方经济计划制以及劳工组织。¹¹

B. 两性平等获得和控制资源

1. 有性别区分的制约因素

25. 界定社会不同群体之间的社会关系的标准和规范，使一些人的社会地位凌驾于其他人之上，并且使得提供给不同群体的选择出现差异——包括获得和控制资源方面，这被称为“制约结构”（Folbre, 1994 年）。有性别区分的“制约结构”，是指社会中形成男女不平等现象的社会规范、价值观和做法，人们通常给他们分配不同的角色和责任，贬低与妇女有关的智能、能力和活动。有性别区分的规范通常包括将家庭的生育工作责任分配给妇女，而男子主要承担挣钱养家的责任。

26. 这些制约因素还包括限制妇女在公共领域的活动，这种现象在全球的一些地区盛行，包括妇女或男子只能从事某些类型的工作或使用某些类型的技术的陈规定型观念。男子如果从事被认为“女性化”的活动和职业，可能面临文化上的障碍，如果妇女从事被认为“男性化”的活动和职业也是如此。这些制约因素在整个生命周期表现不完全一样，会随着年龄、婚姻状况和在家庭中的地位及其他因素而改变。

27. 由于固有的差异，有性别区分的制约因素造成男女之间在宝贵资源和能力分配上不平等。更普遍的不平等形式涉及财产权和继承权、生产资料所有权及获得教育、技能和有偿就业的权利。这些权利普遍对男子有利，他们被视为主要的生

¹¹ 见 ILC98-PR13-2009-06-0323-1-En. doc。

产者和雇用劳动者，而妇女则被视为次要的雇用劳动者（世界银行，2001年；Grown等人，2005年）。

28. 尽管来自低收入家庭的妇女和男子，由于缺乏教育、技能、资产和网络，在谋求生计时都有可能处于劣势，但在获得资源和机会方面，性别往往加剧了其他的社会不平等现象的影响。

29. 必须强调这些制约因素的体制性质和个人性质（Kabeer，2008年a）。由于积极歧视、无意识的偏见或无知，这些制约因素可能被公共机构施加于公共领域。当公共机构的主要行为者有意或无意地反应和强化那些限制妇女进行选择的歧视性标准和价值观时，公共机构便成为有性别区分的制约因素的传承者。有关公共机构强加的有性别区分的制约因素有很多例子可寻。男女雇主都偏向于男子，认为男子没有生育责任的“麻烦”，以妇女处于雇用劳动者的次要地位为借口，少支付她们工资。而歧视性法律、政策和方案会导致两性不平等，认为男子是主要的雇用劳动者而妇女主要承担家务劳动，但现实情况却并非如此。

2. 有性别区分的能力和力量

30. “能力”概念指的是人们根据自己可以处置的资源及其在权利关系中所处的位置，行使选择权和实现价值目标所需要的能力和力量（Sen，1999年）。“力量”是指在何种程度上妇女和男子能够挑战其生活中的制约因素。所有行为者均行使某种选择或力量，但都要在限制范围内行使。在两性关系中，男性权力取决于男子在家庭内外获得物质资源的特权及其对妇女行使权威的能力（Kabeer，2001年）。妇女的劣势很明显，家庭调查数据表明，在许多地区，在家庭的重大决定上，妇女拥有的控制权有限，比如在涉及其自身健康和福祉方面，在一些面临重大的流动性限制的领域，这限制了她们发挥才能（联合国妇女发展基金（妇发基金），2008年）。

31. “话语权”和“谈判权”指的是弱势群体以不同方式寻求施加影响力和带来变化（Sen，1990年；Agarwal，1997年）。他们这样做的能力取决于多种因素，包括他们获得和控制资源情况。例如，妇女退出或者至少威胁退出不利处境或关系的能力，而不是因为她们别无其他选择只能留在这种处境或关系的能力，取决于她们可以处置的资源。例如，如果女工有可以依靠的社会保障，或者有组织支持她们的斗争，或者现行法律使得歧视妇女为非法行为，女工就更有可能抗议工作中遭遇的性别不公正。

32. 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当妇女接受的教育达到一定程度，拥有比较稳定和高薪的工作，且能获得资源，如土地、信贷和国家的社会支助，妇女在其家庭内可行使的决策权就会增大（Kabeer，2008年b；Jejeebhoy，1995年）。在印度、孟加拉国和美利坚合众国，妇女获得有报酬工作、住房和土地有助于减轻她们遭受

家庭暴力的情形是不同的（Agarwal 和 Panda，2005 年；Salway 等人，2005 年；Basu 和 Famoye，2004 年）。获得资源可以增强家庭和社区对妇女的尊重，可为老年妇女提供更稳固的财政安全。移民妇女提供的汇款也增加了家庭的安全感。财产所有权使得妇女在遇到离婚、分居或丈夫死亡时不至于陷入贫穷。在艾滋病/艾滋病方面，获得资源对于孤儿寡母的生存至关重要（Strickland，2004 年）。

33. 本报告承认，两性不平等与阶层、种姓、种族和其他主要的社会不平等因素相互交织。无论男性还是女性，都无法构成身份和利益统一的同质群体。赋予妇女经济权力的战略必须认识到妇女在经验、需求和优先事项上的差异。

3. 赋予妇女经济权力的倍增效应

34. 两性平等本身是一个宝贵的目标，也是实现其他广泛赞同的发展目标的手段。增强妇女获得各种经济和财政资源，要有强有力的发展理念来支持。其中的一套理念应考虑到妇女获得资源对其子女福利的影响。长期研究积累了大量有力的证据，这些研究证据表明，妇女获得资源，包括教育、有报酬工作、信贷、土地、技术和其他生产资料，比男子掌握类似资源对儿童的生存、福利和教育有着更重大深远的影响（Smith 等人，2003 年；Quisumbing，2003 年）。研究还表明，向家庭汇款的女移民会优先考虑家庭的需要，特别是儿童的健康和教育（联合国提高妇女地位国际研究训练所（提高妇女地位研训所），2007 年）。这些调查结果被用来为政府针对儿童采取政策干预，包括有条件的现金转移提供依据（见第六章）。

35. 第二套理念主要围绕减贫目标。早期的研究指出，在贫穷的农业经济中，妇女为家庭物质生活做出了重要贡献。¹² 最新研究表明，常常是妇女的收入使得低收入家庭的生活在贫困线以上（Chen 等人，2005 年）。虽然人们对穷人中女户主家庭数量过多问题进行了激励的辩论（Chant，2003 年），但有证据表明，家庭贫穷与完全依赖或主要依赖女性收入有着密切的联系（Kabeer，2008 年a；Chen 等人，2005 年；Sender，2003 年）。

36. 在经济衰退时期，妇女作为“可依赖的最后一张安全网”的作用也得到凸显。1980 年代，有关结构调整的分析方案记载了妇女在家庭中肩负的双重负担有多重：因社会开支削减，人们对妇女无偿劳动的需求增长；由于男子就业率下降和生活成本上升，妇女不得不更加努力维持生计（英联邦秘书处，1989 年；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儿童基金会），1989 年；Elson，1991 年）。在对亚洲等地金融危机之后开展的研究证实，由于非正式工缺乏社会保障，妇女的有偿和无偿劳动帮助维持了家庭生计（联合国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亚太经社会），2003 年）。

¹² 早在 1970 年，Boserup 提出了妇女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问题。这表明政策忽略妇女在农业生产中的作用所产生的生产率差距越来越大，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尤其如此。

37. 另一套论点围绕两性平等的微观经济效率。事实证明妇女获得土地和住房，对家庭生产率具有重要影响（Deere 等人，2004 年；Katz 和 Chamorro，2003 年）。相反的事实证明，家庭内部存在生产资源分配上的两性不平等，制约了女农民应对市场激励机制的能力（世界银行，2001 年）。其应对能力还受到物质供应和社会基础设施有限，包括市场运输的限制，以及受到她们无力购买技术或雇用劳工以弥补其自身时间上的不足的限制（Evers 和 Walters，2000 年；Whitehead 和 Kabeer，2001 年）。

38. 其他研究人员把重点放在了两性平等对宏观经济效率的影响上。利用国家、跨国和时间序列数据进行研究，已找到两性平等指标与经济增长率之间的积极增效关系证据。¹³ 许多研究依赖强调教育对经济增长率的重要性的内生增长理论，侧重于教育程度，重视中等教育上的两性差距。大多数研究表明，教育上的两性平等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正向的积极关系，妇女受教育经常比男子呈现出更强的相关性（Ranis 等人，2000 年；Klasen，1999 年；Knowles 等人，2002 年；Seguino，2000 年）。¹⁴ 各项研究还证实，增强劳动力参与和教育方面的两性平等，对于经济增长具有重要意义（Klasen，1999 年；Klasen 和 Lamanna，2009 年）。

39. 两性不平等的成本对于国民经济是不可小视的。在一些亚洲国家进行的模拟演练发现，这些国家劳动力参与方面的性别差距成本达到每年约 420 亿美元至 470 亿美元。而教育成本上的性别差距为每年约 160 亿美元至 300 亿美元。成本差距最大的国家收益也有可能最大。

4. 无偿的生育工作与宏观经济

40. 微观一级的综合研究结果以及国家和跨国数据集有助于提请人们注意经济增长主流理论及其支持的宏观经济政策在对待劳动力方面的一个基本缺陷（Elson，1991 年；Walters，1995 年）。劳动力通常被看作“既定”的生产要素，如同土地和其他自然资源一样，而不被视为一种必须通过人类努力“生产”出来的资源。

¹³ 在对经济衰退进行合并因果关系的一般性批判分析的同时，人们还一直对各种不同环境下的多国衰退做出了评判，而这种评判并未找到可能对结果产生影响的根本性的体制差异因素（Rodriguez 和 Rodrik，2001 年）。本报告中讨论的结果应被视为提示了具有暗示意义的经验性规律，说明两性平等与宏观经济运行情况之间的关系，而不是确凿的因果关系证据。

¹⁴ 研究人员发现两性教育平等与经济增长之间成正比关系仅限于中高收入国家（Dollar 和 Gatti，1999 年），这似乎反映了此项研究在计量男女受教育水平时采用了分开计量的办法，而不是男女的受教育比例，因此未能核实不同国家在男女受教育程度上的强烈相关程度。它也可能反映出研究所涉时期较短，而两性教育平等给经济增长带来的益处需要长时间才能见效。采用比率衡量法重新分析同样的数据发现，不论穷国还是富国，在教育方面增强两性平等都与经济增长水平提高相关（Klasen，1999 年）。

41. 在现实当中，劳动和人力资本体现在须要得到日常照顾的人身上，尤其是在生命的早期和晚期。大部分照料工作是由妇女完成的，且这种工作往往是无偿的。在发展中国家，减轻这项工作负担的国家规定、市场条例及基础设施和技术，在很大程度上是缺失的，妇女要花大量的时间照料儿童、老年人和病人、准备食物、砍柴取水，此外，还要从事经济活动，如生产粮食、赚取收入、种植作物、饲养牲畜和家庭园艺。

42. 在一些国家，政府削减保健、教育、运输和公用事业的开支增加了家庭劳动负担，妇女专门照料和供养其家人的时间增加。特别是在非洲，艾滋病毒/艾滋病蔓延，导致照料负担大增，增加了个人和社会的护理成本。在保健和福利资源已经捉襟见肘的情况下，大量的照料工作由家庭成员提供，一般由妇女，有时还由老年人来照料（Addati 和 Cassirer，2008 年）。在许多国家，由于大环境的改变，如气候变化和环境退化，对妇女无偿劳动的需求在不断增长。

43. 在家提供无偿照料是一种“公益”，因为它在日复一日地培养劳动力，培育未来的工人、家长和公民，为实现共同商定的发展目标做贡献。尽管如此，生育劳动基本上未在宏观经济理论和政策中得到体现。进入正规市场交易并明码标价的生产活动，在《国民账户体系》官方统计中有明确的计量，并在国家和国际两级构成被计量为“经济活动”和“劳动力参与”的主要部分，而构成发展中国家穷人生计战略的非正式生计劳动没有得到充分体现。家庭经济中的无报酬照料工作被完全省略（Razavi 和 Staab，2008 年）。

44. 目前有一种隐含的设想，即随着妇女经济机会的扩大，家庭将会以某种合适的方式调整两性无报酬劳动的分工，使妇女能和男子一样平等地应对不断变化的市场奖励机制。但这种设想尚未得到实践的验证。妇女越来越多地参与有报酬工作并没有相应增加男子参与家庭无偿劳动的份额（见第三章）。无偿家务劳动的性别分工已出现明显反弹，继续构成妇女接受有报酬工作的前提条件。它限制了妇女在家庭中和更广泛的社会中就业的改变潜力。

C. 《关于妇女在发展中的作用的世界概览》的结构安排

45. 本《世界概览》第二章概述了两性平等对经济增长、货币、财政和贸易政策以及资本流动的潜在影响。它还审查了妇女在经济决策中的话语权。

46. 第三章审查了妇女在劳动力市场中的地位和限制其应对新经济机会能力的制约因素以及她们为获得更公平的劳动回报而发出的诉求。这些问题包括家庭无报酬工作责任分担不平等以及她们参与劳动力市场时所遭遇的两性不平等。

47. 第四章重点阐述了其他经济资源在两性中的分布，如土地、财产、住房、共有资源和基础设施及其对城乡低收入家庭生计战略的潜在影响。

48. 第五章着重于妇女在正规和非正规金融部门通过储蓄和贷款获得金融服务。它记录了小额供资组织的兴起，以此来补偿妇女被排除在正规部门之外遭受的损失。该章讨论了小额供资组织的有限推广问题以及正在向“包容性金融制度”转变的过程。

49. 第六章讨论了通过社会保护提供经济资源。该章将劳工组织的“全球社会保护基准”作为一个框架，从两性平等角度考虑不同的社会保护战略。

50. 第七章汇编了报告的主要结论和建议。

二. 宏观经济与赋予妇女经济权力

51. 宏观经济框架影响了国家的经济增长模式和速度及不同人口部分的机会和资源分配。宏观经济政策通过市场和国家干预措施对两性平等施加影响，这些措施对重要的经济和金融资源及经济机会进行分配。这些有性别区分的影响因国家愿意且有代表社会弱势群体进行干预而得到削弱，同时也因社会治理结构中不同阶层妇女的呼声和影响而得到缓解。

52. 本章审查了当前宏观经济政策框架的组成要素以及妇女获得和控制资源的重要意义。尽管最近几十年来妇女受教育的机会和就业状况有所改善，但是这些变化的改变潜力因为两性在资源分配方面持续不平等而受到影响。本章讨论了增加妇女在经济决策中的话语权的重要性。

A. 宏观经济环境

53. 最近几十年来，全球经济不断走向一体化。信息和通信技术及交通技术的快速变化，为人员、金融、商品和服务在极短时间内以半个世纪前成本的几分之一进行国际流动提供了可能。这导致了全世界经济交易范围得到大规模扩展，使生产和分配过程出现国际重组、各国国民经济向全球开放并参与全球竞争。

54. 在此过程中，财政、货币和汇率政策重点一直放在控制通货膨胀上，而结构性政策则用来减少国家的作用，促进私营企业发展，放松对国内市场的管制，贸易和资本流动实现自由化。全球一体化程度反过来决定了各国政府可用的“政策空间”。吸引和保留国际流动资本的需求迫使各国保持高利率、降低通货膨胀率、采取灵活的劳动力市场政策和税收奖励政策，以鼓励外国直接投资。这些政策日益受到质疑，因为政策空间正在缩小，通过反周期政策来充分应对当前的金融和经济危机受到限制。

55. 当前的金融危机是对金融部门放松管制的产物。取消国内市场的信贷拨款控制和放开资本账户，导致资本流动性越来越强和国际金融市场的出现。当前金融

危机及其带来的全球性影响的根源在于，对金融市场监管不力与日益依赖高度一体化资本市场上复杂金融产品二者之间的交互作用。

56. 即使在当前的金融和经济危机爆发之前，人们已对如下这个核心假设提出质疑，即财政纪律和限制性货币政策，加上市场自由化，将会促进经济增长和减贫。这种假设尚未得到证据证实。在发达国家，自 1970 年代以来其人均国内总产值一直呈下降趋势（Heintz，2006 年）。自 1990 年代以来，发展中国家的增长一直呈上升趋势，主要体现为中国和印度在快速增长。如果不算中国和印度，在过去 30 多年中，发展中国家的人均产出增长趋势远远低于 1970 年代的增长水平（联合国，2008 年 a）。

57. 减贫方面的进展同样也是参差不齐。根据世界银行发布的订正的贫困率估算，参照 2005 年的价格水平，按每人每日 1.25 美元作为贫困线，2005 年，发展中国家中有 14 亿人生活在赤贫中（Chen 和 Ravallion，2008 年）——比早期预测的计算结果多了 4 亿人。1981 至 2005 年间，减贫速度保持不变，但就发展中国家整体而言，减贫速度每年还下降了 1%。

58. 据估计，2009 年，全球生产总值预计下降 2.6%，2008 年的增长率为正的 2.1%，2004-2007 年间的平均年增长率近 4%（联合国，2009 年）。发展中国家尤其受到商品价格下跌、出口需求减少、官方发展援助可能下降及私人资本流动下降，尤其是汇款减少的不利影响。

59. 金融危机通过全球经济衰退不仅会影响全世界的金融市场，而且还会对实体经济和人民生活产生更广泛的严重影响，发展中国家尤其如此（Fukuda-Parr，2008 年）。除非金融危机得到遏制，否则，其对贫穷的影响可能是灾难性的。预计这场危机将使 7 300 万到 1.03 亿人不能脱贫或陷入贫穷（联合国，2009 年），2009 至 2015 年，将另有 20 万至 40 万婴儿会死亡（世界银行，2009 年 a）。对 59 个发展中国家的研究表明，国内总产值的下降可能导致在平均婴儿死亡率中女孩大大高于男孩（Baird 等人，2007 年）。预计当前这场危机对世界大部分地区的妇女失业率的负面影响比对男子大，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尤其如此（劳工组织，2009 年 a）。

60. 发展中国家仅有少量的资源可用来执行适当的反周期政策来抵消当前金融和经济危机所产生的影响。这场危机将危及发展中国家实现国际商定的发展目标的进程，包括实现千年发展目标的进程。分配的资源仍然不足以落实两性平等的承诺。低收入国家实现千年发展目标 3 的资金缺口估计由 2006 年的 86 亿美元增至 2015 年的 238 亿美元（Grown 等人，2006 年）。对拉丁美洲六个国家的研究估计，预计 2009 和 2010 年经济衰退，到 2015 年经济会逐步缓慢复苏，恢复到危机前的增长水平，一些低收入国家，如玻利维亚多民族国、洪都拉斯和尼加拉瓜，

将会因此进一步偏离实现千年发展目标中完成小学教育、儿童和孕产妇保健目标及获得饮用水和卫生设施目标的轨道（Sánchez 和 Vos，2009 年）。

61. 各国应对经济衰退的方式可能会给妇女和女孩造成过大的影响。例如，在保健和教育领域削减公共开支，会削弱妇女和女孩获得基本服务的权利。应对危机时设计的偏向于男子的安全网，迫使妇女和女孩从事不稳定的非正规经济工作。这种应对措施的设计和执行，将决定这场危机是将逆转实现千年发展目标方面业已取得的成就，包括关于两性平等的千年发展目标 3，还是将为今后的复苏和两性平等进程提供一个坚实公平的基础。

B. 宏观经济和贸易政策

62. 宏观经济政策对男女产生了不同的影响（Berik 等人，2009 年）。制订促进两性平等的政策，需要了解和注意经济增长战略及货币、财政、贸易和投资政策的分配结果，及其对赋予妇女经济权力的限制。但是，许多政策并没有注意到两性平等的主要方面。例如，这些政策往往忽略有报酬工作和无报酬工作的两性分配状况及其对妇女获得经济机会的潜在影响。

1. 经济增长

63. 研究表明，从经济增长政策类型和分析中采用的两性平等措施来看，经济增长对两性平等的影响会有很大的不同（Berik 和 Rodgers，2008 年）。例如，公共服务私有化带来的经济增长，可能导致价格上涨，限制妇女和女孩获得这些服务。同样，促进出口如果给雇用大量女工的出口部门的工资带来下行压力，促进出口带来的经济增长会导致两性工资差距。

64. 研究还审查了经济增长与妇女就业之间的相关性。1991 至 2003 年间的数据显示，这一时期经济增长的就业弹性——即与经济增长变化相关的就业变化——一直成正比，而且妇女的就业弹性一直大于男性（Kapsos，2005 年）。¹⁵ 1980 年代以来妇女所占就业份额的增长一直持续到 1990 年代末（Standing，1999 年；Kapsos，2005 年）。但是，1990 年代末，增长给男女带来的就业弹性开始缩小（Kapsos，2005 年）。在过去十年里，妇女的就业份额保持在 40% 左右（劳工组织，1990 年b）。

65. 最近几十年来，妇女福利增长的影响不是那么明显。一个广泛采用的指标是妇女相对于男子的预期寿命，这个指标粗略概括了总体健康状况方面的两性差异。妇女的寿命通常比男子长，这是因为基因构成差异和妇女的不健康生活方式

¹⁵ 这些数字主要指正式工作，即在大中型注册企业中工作，不包括在穷国中构成劳动力活动的许多非正式工作，因此应谨慎对待。

较少，而且在总人口中，妇女人数多于男子。对增长率大不相同的八个亚洲国家所做的调查研究表明，经济增长与预期寿命的性别差异之间没有关系。研究结果显示，相对于男子而言，妇女较高的预期寿命积极体现了妇女的劳动力参与和扫盲率的提高，这增强了妇女在经济体内的话语权和议价能力（Seguino, 2002 年 a）。

66. 本章还审查了 1980 至 1995 年间 95 个国家的经济增长率与两性平等的更广泛计量——两性平等标准化指标——之间的相关性（Seguino, 2009 年）。两性平等标准化指标是一种综合指标，由女性相对于男性的受教育程度、女性与男性的预期寿命比率、相应的劳动力参与率、妇女担任技术、专业和行政管理职务的份额以及她们在议会中所占的席位组成。对于两个最高收入层次来说，经济增长与其两性平等标准化指标呈正比关系，对于两个最低收入层次来说，两者呈反比关系。穷国的经济增长率增高与两性平等整体恶化相关联。

67. 另外，研究还审查了两性平等指标对经济增长率的重要意义。使用正规就业中工作年龄女性人口所占份额的变化及妇女占总劳动力份额的变化的计量办法，对两性平等就业的增加与经济增长率增加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审查（Klasen, 1999 年）。尽管这两种计量办法都对经济增长率产生了积极影响，但妇女占正规就业份额的影响被认为比较重要且具有统计意义。¹⁶ 后一份研究采用了类似的分析方法，使较早的、1960–1990 年的数据集得到延伸，包括了 2000 年以来的数据。它证实了在劳动力参与和教育方面增强两性平等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意义。尽管早先的数据集表明，由于两性不平等，在南亚、中东和北非，每年由此造成的增长率损失约为 0.9%，但在中东和北非区域，受教育方面的性别差距减少，使该区域每年的人均增长率损失降低到 0.7%，而南亚国家的损失为 1%（Klasen 和 Lamanna, 2009 年）。

68. 诠释两性平等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还可能有许多其他途径。其一是在微观层面积极分析妇女受教育和从事有报酬工作对生育率、儿童存活和儿童人力资本投资的影响。第二个途径是分析一国劳动力和人力资本投资的最佳利用产生的效率。例如，这个论点得到微观层面的证据支持，它表明在非洲耕作制度中土地、肥料、信贷更公平地分配会显著提高劳动生产率。这个论点也得到宏观研究的支持。宏观研究表明，按人均收入计算，增强教育方面的两性平等与劳动生产率提高具有关联性（Knowles 等人，2002 年），消除职业和工资上的性别歧视会提高妇女的工资（Tzannatos, 1999 年）。在拉丁美洲经济体中，消除性别隔离和工资差距会使妇女工资提高 50%，但对男性工资的影响不大，使国民产值提高 3% 至 9%（同上）。有关八个拉美国家的最新研究表明，消除妨碍妇女参与劳动力的障碍

¹⁶ 研究建议谨慎对待这些研究结果，因为因果关系显然有可能是反向的。

和平等从事不同工作，会减少贫穷的发生，促进所有八个国家收入的增加（Costa 等人，2009 年）。

69. 同时，虽然加强劳动力参与和教育方面的两性平等会刺激经济增长，但缩小工资差距并不一定具有同样的效果。关于中低收入半工业化国家的小组数据分析发现，在工资方面两性不平等水平越高，投资和经济增长水平就越高（Seguino，2000 年）。相对于妇女的生产率而言，支付其低工资的企业是利可图的，因为大量受过教育的妇女争相竞争为数有限的就业岗位，这些岗位在出口外向型、劳动密集型的制造部门，这类企业流动性很强，价格竞争激烈，而且很少或根本没有工会组织（Seguino，2009 年）。

2. 货币政策

70. 货币政策的着重点一直在于由各国中央银行通过调整短期利率来控制通货膨胀，同时辅之以放松对国内金融部门的管制并放宽对资本流入流出这些国家的控制。货币政策可能产生有性别区分的影响，包括通过劳动力市场。研究表明，在发展中国家，利率变化产生的有性别区分的影响更甚于经合组织国家。1980-2004 年间九个经合组织国家的数据显示，这些国家短期利率变化对就业的影响微弱，对就业也没有产生有性别区分的影响（Takhtamanova 和 Sierminska，2009 年）。

71. 但是，在发展中国家，利用利率政策来控制通货膨胀对妇女就业产生了显著影响（Braunstein 和 Heintz，2006 年）。1970 年至 2003 年间，17 个中低收入国家的 51 个“减轻通货膨胀小插曲”研究发现，71% 研究案例的总就业增长率有所缩减，相对于男子而言，在大部分紧缩案例中，妇女就业受到不利的影响（同上）。在那些伴随就业率扩大的减轻通货膨胀案例中，没有产生有性别区分的影响。减轻通货膨胀最有可能导致就业缩减，随之而来的是对妇女产生不利影响，当中央银行为减轻通货膨胀压力而提高实际利率并使其高于其长期趋势时尤其如此。在紧缩时期，保持具有竞争力的汇率也有助于抵消对妇女就业的负面影响（同上）。

72. 紧缩的货币政策、较高的实际利率和放松管制的金融市场影响了经济体的信贷供应，包括向处境不利的经济行为者提供信贷。身为小农和中小企业家的妇女则属于被剥夺获得信贷机会的人。银行私有化和开发银行的借贷和投资业务变化，意味着商业因素而非发展因素将决定谁会获得信贷。商业银行还倾向于支持那些信用记录好、交易成本低的借贷人。他们还倾向于在城市地区集中活动，使得农村人口没有机会获得金融服务。虽然小额供资已有大幅增长，并且专门向贫穷妇女推广，但这无法弥补广大金融机构对多数中小型企业的不作为（见第五章）。

3. 财政政策和公共部门改革

73. 财政政策改革的重点是削减公共开支的财政赤字，最大限度地减轻私营企业的税收负担，其根据是人们认为财政赤字将“排挤”私人投资、助长通货膨胀，并导致投资者信心丧失，同时征税将对私营企业产生消极影响。“财政空间”因需要吸引和留住国内外流动资本，致使资本税征税范围稳步缩小而受到限制（劳工组织，2008年a）。这导致国内资源局限于投资于结构性政策，以促进优先发展项目。

74. 各国政府对落实两性平等和赋予妇女权力的承诺负有首要责任。国家、地方和各省的预算，是政府为确保妇女受益于公共支出而建立的一个重要机制。政府征税和分配资源的方式会对男女产生不同的影响。

75. 征税制度可以产生两性不平等并使其永久化。由于税收影响工资和可支配收入，它们会影响男女如何分配各自在正式、非正式和无偿工作上的时间（Barnett和Grown，2004年）。例如，人们发现所得税联合申报制度——高收入高税率——会阻止妇女进入劳动力市场（Elson，2006年）。而一些间接税，如增值税和消费税，会增加贫穷妇女的负担，因为妇女往往需要购买使家庭受益的商品和服务——保健、教育和营养品（Barnett和Grown，2004年）。

76. 减贫和两性平等所必需的再分配政策要得到无通货膨胀的供资，就必须建立一套健全的税收制度（Huber，2006年）。近期的预算分析表明，同发达国家相比，在许多发展中国家，税收占政府总收入的比率非常低。2000年代初的估计表明，其比率从孟加拉国和印度的约8%到尼日利亚的10%、再到巴巴多斯和博茨瓦纳的约32%不等，而税收占澳大利亚和美国政府收入的29%至30%，占瑞典政府收入的51%（Barnett和Grown，2004年）。征税水平低会伤害穷人，尤其是贫穷妇女，因为这会阻碍一些发展方案的制订，这些方案能够阻止市场引发的两性不平等。

77. 政府削减基础设施和服务方面的开支也会产生有性别区分的影响。但凡遇到财政改革要削减社会开支，或实行用户缴纳服务和公用事业费用时，为了省钱，作为补偿手段，妇女往往不得不增加在家里照顾子女、病人和老年人的时间，甚至长途跋涉去寻找诊所看病，或长时间排队等水（Razavi，2007年）。

78. 同样，减少农业推广服务和补贴化肥、种子和其他投入的供应，也对小农户，尤其是女农民产生不利影响。例如，在赞比亚，在结构调整下废除销售委员会、推广服务和农村信贷服务实行私有化，使女农民比男农民受到更多的不利影响。对女农民来说，地方市场合作社过去是稀有的信贷和推广服务来源之一（Evers和Walters，2000年）。如果没有这些服务，生产者不得不走出村外，去寻求更好的价格。而妇女却不太能够做到这一点，因为她们负担重，而且没有交通工具。

许多人被迫将她们的农作物出售给一些流动商贩，这些商贩往往支付较低的价格或以货代款（Whitehead, 2009 年）。

79. 财政紧缩政策还导致一些福利国家的社会保护私有化，使发展中国家的安全网定位狭隘。在东亚危机之后，人们认识到忽视社会保护所付出的沉重代价。妇女尤其受到社会保护制度薄弱或缺乏的影响，因为她们的的工作更不稳定，负担不起为将来储蓄或支付私人保险的保险费，且很少有足够的财富使自身度过危机或安享晚年（第六章）。

80. 财政改革还通过减少国家提供的服务和国有企业私有化使公共部门裁减工人。有太多的妇女受到裁员的严重影响，因为一般来说她们的工作资历比男子浅，受教育程度也较低，还可能受到直接歧视（Berik 和 Rodgers, 2008 年）。例如，在乌干达、科特迪瓦（Appleton 等人, 1999 年）、中国（Appleton 等人, 2002 年）和越南（Rama, 2002 年），女工被迫离开其在政府的工作岗位，她们更难在私营部门获得同等职位，这迫使她们转向地位较低的就业岗位，或进入非正式部门。

81. 为了提高财政预算过程的效率、增强透明度和加强问责制，公共财政改革通过更有效地征税和确定支出目标，使倚重投入和业绩的项目预算编制向倚重产出和结果的预算编制转移（Sharp, 2003 年）。这种趋势通过引入两性平等产出和结果指标，为预算编制过程更加注重两性平等提供了机会。将重点放在监测和问责上，为加强两性平等方面的资源分配提供了有利环境（见 E/CN.6/2008/2）。

82. 在过去十年中，促进两性平等的预算倡议已在 60 多个国家中采用，以评估在何种程度上公共财政管理对性别问题有敏感认识，以及在何种程度上两性平等政策承诺与资源分配相匹配。性别分析还就财政改革的不同方面对男女的影响分别做了说明。大多数倡议包含了预算分析，但却很少重视对这些分析结果和建议的落实。重点一直放在预算开支上而不在预算收入上，强调社会部门而不是生产部门。这种倡议取得成功，取决于一系列利益攸关方的合作，包括财政部和计划部、国家提高妇女地位机制、议员、双边和多边捐助者、研究机构和妇女组织。性别分类数据有限，对于落实促进两性平等的预算分析是一个重大挑战。

4. 贸易政策

83. 贸易政策通过影响就业、价格和收入，对两性平等具有意义。在一些出口劳动密集型制成品的国家，贸易能为妇女创造就业机会，但也可能导致妇女失业，如果廉价进口商品的竞争力迫使当地行业倒闭或解聘工人（联合国, 1999 年）。与此同时，消除关税和其他贸易壁垒会减少政府的收入，导致社会开支削减或提高消费税，对家庭预算产生不利后果，对妇女造成较大的影响（Williams, 2007 年）。

84. 经济增长对两性就业分配的影响部分上似乎已被贸易自由化模式所缓解。对 16 个中低收入国家 1970 至 2003 年间的发展状况所做的研究，审查了经济增长、贸易自由化模式、利率和政府收入占国内总产值的比例对整体就业率和按性别划分的就业率的影响 (Heintz, 2006 年)。国内总产值的上升速度与就业率的整体提高速度是相关联的。贸易自由化的影响好坏不一：强劲的出口业绩与就业率提高相关联，而进口渗透与就业率增长率减缓相关联。与具体的经济增长率相关的政府国内总产值份额，对整体就业状况产生了积极影响，同时，高利率可能通过阻止经济体中的固定资本投资而降低就业增长。

85. 分析表明，妇女就业率与出口水平呈正比关系、与实际利率呈反比关系 (同上)。进口渗透对男子就业影响最大，导致男子就业水平降低。妇女就业的上升往往与男子就业的外源性增加呈正比关系。不过，男子就业增加对妇女就业中的外源性增加的反应并没有如此强烈。这意味着男女就业是一种互补关系而不是竞争关系，证明男女就业处于劳动力市场的不同部分。这种情况还表明，在广泛增长时期，男女有可能获得就业，同时，在以出口为导向的增长条件下，受益的主要是妇女。

86. 然而，一些证据表明，妇女在出口外向型制造业中就业得到的收益不会持久。例如，在大韩民国，1980 至 2004 年，在制造业中就业的妇女比率从 39% 下降至 35% (Berik, 2008 年)。墨西哥也出现了类似的趋势 (Fussell, 2000 年)。但是，这些下降不是不可避免的。例如，自 1980 年代以来，泰国妇女在制造业中所占份额在持续上升 (Jomo, 2009 年)。

87. 在许多情况下，贸易自由化也会导致妇女在制造业中就业的机会流失。例如，对 10 个经合组织国家的研究发现，在制造业中，南北贸易增强减少了妇女而不是男子的就业机会，其中损失最大的是妇女密集型贸易领域最没有能力与进口商品相抗衡的国家 (Kucera 和 Milberg, 2007 年)。发展中国家中非正规经济的位移效应不太可能出现在官方数据中，但研究表明，这些情况也存在 (Williams, 2003 年；家庭网络/社会研究信托基金，2006 年)。

88. 制造业中女性劳动力减少，对此有人提出了各种原因来解释 (Braunstein, 2008 年；Ghosh, 2009 年)。在某些情况下，由于制造业生产变得更加技术密集或资本密集，妇女工作机会便让给了男子。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在于，妇女的正规教育和技能水平偏低，很少获得在职培训机会，或者雇主倾向于让男性劳动力从事高工资工作。在某些情况下，妇女的就业率下降反映了资本向其他国家转移或工作从正规经济向非正规经济转移，¹⁷ 使得工作条件具有更大的灵活性。

¹⁷ 妇女参与非正规经济没有在官方统计中得到充分体现。

89. 妇女在出口部门就业的一个具体问题是，妇女通常基本上被安置在低薪岗位上，该部门通常以移民工人为主。例如，尽管人们发现在马达加斯加服装行业中就业的妇女受教育水平略低一点，但与男子基本上相似，但大多数妇女仍被排挤到低技能的工作岗位上，其工资较低，而高工资的技术职位大都被男子占据。工资增长仅局限于熟练工人；由于社会上还存在大批失业或未充分就业的个人，非熟练工人的工资一直较低（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贸发会议），2008年）。出口行业常常依靠临时雇用的工人工作。而几乎所有临时工的空缺往往都由妇女来填补，工资待遇较低，没有正式工享受的大多数福利（同上）。

90. 粮食贸易自由化尤其对妇女产生了特别严重的后果。在发展中国家，家庭种植粮食作物向出口外向型农业转型，对全球粮食市场越来越依赖，导致发展中国家的粮食更加没有保障，其脆弱性体现在粮价波动及全球粮食储备下降上（Patnaik，2003年）。虽然2008年严重的粮食危机的直接原因在于全球粮价急剧上涨，但其一系列根本原因¹⁸突显了发展中国家对农业忽视和对全球粮食市场日益依赖付出的代价。据一项估计，2006至2008年间，由于粮价上涨，全球至少另有1.09亿人落到每日收入不足一美元的贫困线以下（联合国，2008年b）。

91. 由于欧洲和美国对农业部门实行高补贴，其农业部门能以低价向发展中国家出口粮食，这样一来，发展中国家的小农户不得不应付政府对基础设施投资削减、取消农业投入补贴以及推广服务和机构信贷私有化带来的种种不便。作为粮食生产者，女农民发现自己更难以应对粮食高价，因为她们在获得现金和土地、种子、信贷和技术培训等生产资料方面处于不利地位（见第四章）。粮价上涨损害妇女养活自己和家人的能力。为了应对这些困难，一些妇女自己通常比男子更节衣缩食，去供养孩子，转而购买更便宜、营养少的食物，或者靠出售自己的资产换取粮食（Quisumbing等人，2008年）。

5. 资本流动

92. 资本流动是由私人外国直接投资和证券投资以及体现为赠款和贷款形式的官方发展援助流动资金组成。放宽对资本市场的管制、取消对资本流动的控制，导致国际资金流增长。在发展中国家，私人资本流入一直在稳步增长，而官方贷款有所减少，但不包括债务减免。

¹⁸ 这些根本原因包括石油价格急剧上涨，增大了食品商品运输成本和化肥生产成本；人们对能源安全和生物燃料的需求不断增加，导致甘蔗和玉米产量增加但粮食供应却大大减少，这增加了高速增长的发展中国家对粮食和燃料的需求（联合国，2008年b）。

私人流动资本

93. 外国直接投资流动在促进妇女在某些部门就业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东亚和东南亚及拉丁美洲和加勒比部分地区，妇女主要集中在劳动密集型、以出口为导向的制造业。直接为跨国公司工作的妇女以及在以出口为导向的制造业，包括家庭企业中就业的妇女，往往比那些在国内其他企业就业的妇女获得更高的工资、享受更多的好处(Kabeer 和 Mahmud, 2004 年; Davin, 2004 年; Brachet-Márquez 和 de Oliveira, 2004 年)。跨国公司的利润往往比国内企业高，规模很可能会更大，因此，这些跨国公司受到劳动管理条例的规范，经常受到包括全球一级的消费团体和工会的压力，以保持一定的工资标准。但是，工资奖金可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下降。例如，在中国，1995 年的数据表明，由于外国直接投资比率在总投资中所占比率较高，在各省工作的男女工资奖金都比较高，而且妇女也获得更大的收益。但到 2002 年，由于外商独资企业转移到主要雇用男子的高附加值行业，这种模式发生了逆转 (Braunstein 和 Brenner, 2007 年)。

94. 然而，尽管外国直接投资被认为没有有价证券的国际流动性那么强，但要维持较低的工资同时又要避免劳动管理条例的制裁，就要承担投资再定位的风险，尤其是在资本投资水平较低且妇女就业非常集中的领域 (Doraisami, 2009 年)。吸引外国直接投资的竞争可能会导致劳工标准的削弱，特别是在出口加工区，这可能导致妇女丧失权力 (Floro 等人, 2004 年)。

95. 私人资本流动也会通过与资本市场自由化相关的周期性金融危机对两性平等产生不利影响。资本流入某国的情形若突发逆转，往往会伴随着货币迅速贬值和大规模的经济紧缩。过去的经验表明，资本流动波动的影响程度如何，取决于男子密集型部门还是妇女密集型部门所受影响最严重。在大韩民国，在 1990 年代后期东亚爆发金融危机期间，妇女的总就业率降低了 6.1%，而男子的总就业率降低了 4.1%。正式工人¹⁹的差距更大：男子的就业率降低了 6.6%，妇女降低了 18% (联合国社会发展研究所 (社发所), 2005 年)。在菲律宾，男子失业人数的增长速度超过了妇女，以男性为主的部门受到的影响更大。妇女则投入更长的时间从事有报酬工作，特别是在农业部门，将此作为一种权宜之计 (Lim, 2000 年)。同样，在 2001 年金融危机期间，在阿根廷，男工的净就业率比女工下降得更大，这主要是因为妇女增强了对劳动力的参与，以应对家庭收入的恶化 (McKenzie, 2004 年)。此外，妇女的无报酬劳动由于资源日益减少而有所增加，儿童，特别是女孩不得不辍学，以帮助家里维持生计或从事有偿工作。

¹⁹ 正式工人的定义是“就业合同时间为一年或一年以上的工人”和/或“工作一年或一年以上且能领取附加福利的工人” (Lee, 2007 年)。

96. 许多国家的汇款超过了官方发展援助流量，成为发展中国家家庭的一个主要的外部筹资来源。2008年，官方记录流入发展中国家的汇款流大约为2 830亿美元，比2007年的2 650亿美元增加6.7%。然而，按实际价值计算，汇款预计将从2007年占国内总产值的2%降至2008年的1.8%（世界银行，2008年a）。世界银行估计，由于全球金融和经济危机，2009年汇款将减少5%至8%。其下降幅度小于其他资本流的下降，表明与许多其他类型的流入资源相比，汇款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将保持了弹性（世界银行，2009年b）。

97. 妇女占国际移民的比例越来越大，她们移民独立寻找工作，赢得了经济独立且获得了权力（联合国，2004年）。鉴于女移民利用了一些服务和产业对女性劳动力需求的增加所创造的机会，特别是在以出口为导向的产业，她们也会为汇款流做出贡献（同上）。例如，来自缅甸在泰国当佣仆的女移民中有76%定期往回汇款（Caouette等人，2006年）。在印度尼西亚，2006年，移民工人往回汇款60亿美元，使得汇款成为仅次于石油的第二大外汇收入来源，妇女在海外就业的680 000名移民中占近80%（世界银行，2008年b）。2004年《关于妇女在发展中的作用的世界概览》确定，女移民的汇款是发展中国家家庭收入的一个重要来源（联合国，2004年）。汇款使许多家庭能有更多的资源用在提供食物、保健和教育上，使生活水平得到提高（国际农业发展基金（农发基金），2008年）。

98. 研究证明汇款格局中存在着性别差异，反映了收入差异和家庭责任差异（Piper，2005年）。例如，在泰国当佣仆的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女移民每年平均给家里汇款300美元，而主要从事农业工作的老挝男移民每年平均给家里汇款257美元（Caouette等人，2006年）。

99. 虽然移民和汇款能力使妇女获得了权力，但不能忘记她们付出的代价。许多女移民的工作时间较长且债务加重（农发基金，2008年；联合国，2004年）。专业贩运增多，意味着有些自认为移民出去将找到合法职业的妇女发现自己落入陷阱，被迫从事卖淫、家庭服务和血汗工厂劳动，工作条件类似于债役工（联合国，2004年）。

官方发展援助

100. 发展合作是赋予妇女经济权力的一种重要机制。1999-2003年间，在总计172亿美元的官方发展援助中，每年有31亿美元重点用于两性平等。2001和2005年，在每年200亿美元的官方发展援助款中，估计有50亿美元用在这方面（经合组织，2008年）。大量的资金划拨给保健和教育社会部门，少量投放到农业、能源、运输或金融等生产部门的妇女手中。

101. 衡量两性平等和赋予妇女权力的双边捐助者和伙伴取得的进展和问责制仍然是个挑战，因为有关财政资源分配的数据有限。在过去十年中，经合组织发展

援助委员会（发援会）成员国使用了“两性平等政策标记”，对着重于两性平等和赋予妇女权力的援助进行报告。政策标记旨在衡量这两项有针对性的活动和将性别观点纳入主流的努力，标出将两性平等作为主要目标或重要目标的活动。尽管政策标记报告近年来有所改善，但经合组织发援会成员国在应用方法上还面临挑战（经合组织发援会，2007年）。截至2004年，只有15个成员国定期向信用报告系统提供数据。并非所有成员国都以同样的方式使用该标记，而且并非所有机构都依照两性平等政策标记进行筛选。报告方面面临的进一步挑战包括参与提供援助的机构和政府部门过多及援助管理部门的权利不断下放（经合组织，2005年）。

102. 落实《援助实效问题巴黎宣言》²⁰ 阐述的五项原则——自主决策、协调实施、目标一致、追求实效、共同负责，使捐助者和伙伴国有机会进行有系统的性别分析和性别影响评估，并在国家、部门和项目一级制订和落实相关政策（经合组织-发援会两性平等网络，2007年）。例如，追求实效原则为跟踪投资于赋予妇女经济权力的资源提供了一个机会。

103. 捐助者越来越多地通过政府向非政府组织提供援助，为捐助国境内的国际非政府组织提供资金，或者资助国内的大型非政府组织，有时不惜牺牲较小的妇女组织，特别是那些开展基层工作的组织（妇女发展权利协会，2007年）。全球、区域和国家/地方一级的大多数妇女组织的工作预算非常小，而且发现越来越难以确保自身工作所需要的经费。对845家妇女组织所做的调查发现，这些组织中有三分之二的年度预算不到50 000美元。2005年，全球700多个主要妇女组织的集体收入为7 600万美元（同上）。

C. 妇女在经济决策中的话语权

104. 有相当多的证据表明，妇女代表参与各个领域的决策具有积极影响。对美国1 000名高级公务员，即美国高级行政人员服务局成员所做的调查表明，在政府机构工作的妇女人数与政府部门倡导两性平等的意愿有着直接的关系（Dolan，2000年）。有关在印度地方政府工作的妇女的一项研究发现，当选的妇女领袖更有可能为建造、维修和提供各种公益物分配资源（包括道路、诊所、公共卫生设施、交通、托儿中心和助产士培训），并能以较低的成本取得效果。她们还更可能向妇女青睐的公益物分配资源（Beaman等人，2008年）。有关财富500强企业的研究表明，董事会中女性成员人数较多的公司得到的财务收益高得多，其中股权收益高出53%、销售收益高出42%、资本投资收益高出67%（经合组织，2008年）。

²⁰ 《援助实效问题巴黎宣言：自主决策、协调实施、目标一致、追求实效、共同负责》，2005年2月28日至3月2日在巴黎举行的高级别论坛上通过。

105. 尽管有这个证据，但赋予妇女经济权力的一个主要制约因素是，她们缺席公共论坛，无法做出直接或间接影响经济和财政资源分配的决策。妇女在治理机构中的任职人数依然不足，而有关政策决定和资源分配决定都是由这些机构做出的。在区域一级，在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欧安组织）成员国议会中，妇女占议会席位的 21.3%，从土耳其的 9.1%到瑞典的 47%不等。在其他地区，妇女代表所占席位从美洲国家的 21.7%到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 18.1%、亚洲国家的 18%、太平洋国家的 13%、阿拉伯国家的 9.1%不等（各国议会联盟，2009 年）。欧洲联盟 27 个成员国的妇女部长都在社会文化部门中任职（占 36.7%），如社会事务、保健、儿童、家庭、青年、老年人、教育、科学、文化和体育，而不是在经济部门任职（占 17.7%）——金融、贸易、工业、农业（欧洲联盟委员会，2008 年 a）。

106. 妇女在全世界公共和私营领域管理职位上任职人数也不足。在经合组织国家，在美利坚合众国、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担任管理职务的妇女所占份额最高，达 8%和 12%，相比之下，男子所占的比率为 12%和 18%。南欧国家，如意大利、西班牙和希腊的该比率最低。在美国，在财富 500 强企业中，女性首席执行官仅占 2%。在经合组织，大公司的董事长中妇女只占 7%（经合组织，2008 年）。

107. 妇女在一些大公司董事会中代表也不充足。在经合组织国家，46%的大企业董事会中没有妇女，而仅有 23%的公司董事会中有一名以上的女董事（同上）。女董事人数最多的是挪威和瑞典，最低的是意大利、葡萄牙和日本。虽然北美公司是全球佼佼者，但在美国，妇女占董事会成员的比率仍不到 13%，而加拿大仅为 11%。在欧洲联盟，所有的中央银行行长都由男子担任，妇女在这些组织的关键决策部门中仅占 17%（欧洲联盟委员会，2009 年）。

108. 虽然世界其他地区还没有提供详细资料，但 2000 年劳工组织对 70 个国家进行的分析发现，妇女平均占据被归类为“有地位、有影响力、有权利和有决策权”的职位，如立法人员、政府高级官员、企业高管和一般管理人员的 27%（Anker，2005 年）。妇女所占比率各不相同，转型经济体为 32%、发达国家为 28%，例如，拉丁美洲 31%、亚洲 15%、中东 9%（劳工组织，2004 年 a）。人均国内总产值不是解释妇女占据决策职位比率差异的一个主要因素。不过，妇女担任决策职务与妇女在非农业劳动力中所占比率之间成密切的正比关系，具有统计意义（Anker，2005 年）。

D. 为赋予妇女经济权力创造有利环境

109. 有证据有力地支持了一种发展战略，这种战略有可能改善男女的就业前景：即与减贫和两性平等目标相一致的“平等向上”战略而不是向下战略（Elson，2009 年）。所需的改变是将宏观经济政策的重心转移到充分就业、人人有体面工

作上来，将此作为经济发展的中心目标，并辅之以加强货币、财政和汇率政策之间的协调。

110. 对性别问题具有敏感认识的经济政策应当以一个分析框架为基础，它考虑到活动的整体性有助于创造经济财富和人类福祉——不论这些活动是生产活动还是生育活动、是有报酬活动还是无报酬活动、是正式活动还是非正式活动。经济和社会发展应当通过以就业为中心、对性别问题具有敏感认识的增长战略，以及对保健、教育和社会保护的投资连接在一起。男女有能力兼顾有报酬工作和无报酬工作以及男女平等地分配有报酬工作机会和无报酬工作责任，对于确保两性平等的成果十分必要（Berik 等人，2009 年）。

111. 财政政策应当将更有效地调动国内资源与扩大公共支出结合起来，保护和促进不同经济部门的生计活动。促进两性平等的预算分析将是一个重要的政策工具，用以识别在公共资源调动和支出中有意和无意的偏见，使这些过程接受公众监督，让政府对其两性平等承诺承担责任。

112. 货币政策应当支持财政扩张和促进出口，为日益增长的经济提供充足的流动性，保持较低的但积极的实际利率，以促进私人（和公共）投资。谨慎的资本管理方法，包括精心设计的资本管制，有助于经济沿着一条更加稳定健康的轨迹增长，少受危机的影响。这样做可以防止利率过低触发大规模的资本出逃。在开放的经济环境下，它还将加强各国政府和工人对金融资本的谈判能力。减缓资本流动的政策还会为出口部门女工提供空间，使其能够根据日益提高的生产率争取到更高的工资（Seguino 和 Grown，2006 年）。

113. 面向全体公民的基本社会保护是国家与其公民之间达成的社会契约的一部分。社会保护措施应尽量减少妇女在履行其生产与生育职能时的取舍。除了社会保护外，还需要制订更广泛的社会政策，以支持照料儿童、病人和老人，并增加维持经济长期增长所必需的人力资本和能力的投资。努力加强妇女参与经济决策也很重要。

三. 获得充分就业和体面工作

114. 劳动是全世界人民最广泛使用的、可以自由支配的生产要素，也是人们靠其谋生的主要手段。它往往是绝大多数穷人唯一可自由支配的资源，人们通过在劳动力市场上参与劳动，能满足其基本需要。妇女进入劳动力市场的重要性，已在有关两性平等和赋予妇女权力的千年发展目标 3 中得到认同，增加妇女在非农业部门的就业份额也被列为一项进步指标。认识到提高有报酬工作的质量对于消除极端贫困和饥饿的重要意义，致使“使所有人包括妇女和青年都享有充分的生产性就业和体面工作”添加为千年发展目标 1 的一个具体目标（A/61/1，第 24 段）。

115. 劳工组织所定义的体面工作涉及生产性工作机会，能带来公平收入、在工作场所安全、家庭得到社会保护；有更好的个人发展前景和融入社会的前景；人民可自由表达他们的关切，组织并参与影响他们生活的决定，所有男女都有平等机会和平等待遇。缺乏体面的工作已被确定为导致贫穷的主要原因（劳工组织，2009年 a）。

116. 在就业越来越不稳定的时期，妇女的就业份额增至占总就业人口的 40.5%（劳工组织，2009年 b）。尽管随着时间的推移各地区的就业率变化不一，但性别分工依然存在，在男女如何获得就业和受益于就业方面存在着许多相互关联的差异。这些问题包括，妇女过度集中在“弱势”工作类型中；职业性别隔离和工资差距；以及在无报酬家务劳动中性别分工不平等。

117. 这些因素有助于解释没有明显性别之分的宏观经济变化产生了有性别区分的影响，包括经济危机的短期和长期影响。到 2008 年底，由于经济衰退蔓延的影响，在业穷人、脆弱的就业和失业开始再度上升。这种经济危机的影响将波及男子和妇女，虽然影响方式不一定相同。

118. 本章探讨了限制妇女获得就业、限制其劳动生产率的各种制约因素，分析了削弱她们争取更好的生活工作条件的能力的因素，并探讨了应对劳动力市场相关制约因素的一些政策干预措施。

A. 劳动力市场的制约因素

1. 非正式工作占主导地位

119. 虽然在 1990 年代到 2000 年代中期，就业率提高了约 30%（劳工组织，2008年 a），然而，这一时期却以正式就业和体面工作缩减为特征（劳动立法所指的全职、正规、固定和长期合同），而且在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各种“非典型”或非标准工作在扩散。近年来，大量新的就业机会，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和转型经济体，一直以非正规经济形式出现（劳工组织，2002年 a）。这种形式的工作通常是不稳定的，工资待遇低，工人基本上没有福利，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这种工作没有被劳动立法或社会保护覆盖。最新估计表明，在转型经济体中，非正规工作占 24%以上，在中东和北非地区占非农业就业总数的 47%以上，在拉丁美洲国家占 50%以上，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和南亚地区占 70%以上（Charmes，2009年）。估计所有地区的非正规就业呈上升趋势。

120. 非标准或非典型工作增多背后有许多因素（社发所，2005年；Benería 和 Floro，2005年）。公共部门精简和国有企业私有化是导因，因为被公共部门裁减的雇员为了谋生往往转向非正规经济。另一个导因是现行的增长战略失败，不能让所有的人得到正规就业。非正式工作安排的出现也反映了作为经济自由化进程

一部分对劳动力市场的管制放松。在正规企业中，雇主往往可以根据保障日益减少的合同雇用劳动力，将一些工作分包给那些未注册的企业的工人或家庭来做（Benería 和 Floro，2005 年；Heintz 和 Pollin，2005 年；Tokman，2006 年）。在竞争日益激烈的全球环境下寻求灵活的劳动安排，导致跨国公司将生产的不同阶段、甚至整个生产过程分散到世界不同地区，以充分利用工资成本、要素禀赋和同质投资环境的差异。

121. 由于这些趋势，在许多国家，收入分配也出现了脱离劳动力而有利于资本的变化（Epstein 和 Power，2003 年；劳工组织，2008 年 a）。根据 73 个国家中的 51 个提供的数据，在 1990 年代初至 2000 年代中期，工资占总收入的份额已经下降（劳工组织，2008 年 a）。根据现有数据，在同期，在提供了数据的国家中，工资劳动者中最高的 10% 与最低的 10% 之间的收入差距加大了 70%。许多国家工会工作比率降低强化了这些趋势（Katz，2000 年）。

122. 现有数据表明，进入劳动力市场和拥有体面工作对妇女来说仍受到特别限制（劳工组织，2008 年 c）。大量妇女从事非正规工作，集中在自营职业的低档次工种上（劳工组织，2007 年 a）。在全球一级，2007 年，弱势就业占妇女就业总数的 52.7%，相比之下，男子的弱势就业比率为 49.1%。不过，弱势就业在男女总体就业中所占份额的性别差距显示因地区不同而有所不同，其中差距最大的是北非和中东。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和南亚地区，弱势就业在总体就业中所占份额不仅较高，而且弱势就业份额的性别差距也较大（超过 10 个百分点）（劳工组织，2009 年 b）。从事非正规工作的妇女无法获得社会保障和社会保护，组织起来确保落实国际劳动标准和人权的能力也有限（Chant 和 Pedwell，2008 年）。凡雇主雇用没什么选择的劳动力，他们便能够支付剥削性工资。例如，出口加工区的女工受到的剥削引起人们的关切，其中包括低工资，对试图自我组织起来的工人进行恐吓以及暴力和性骚扰（劳工组织，2004 年 b）。

123. 哥斯达黎加、埃及、南非、加纳和萨尔瓦多的家庭数据表明，非正规就业的家庭比正规就业的家庭陷入贫穷的风险更高，就业于农业领域比就业于非农业领域的家庭陷入贫穷的风险更高。此外，相对于男子比较集中的各类工资就业而言，在妇女比较集中的各类非正规活动中就业——自营职业者和家庭企业无报酬工作者——的家庭的贫穷程度高于平均家庭贫穷水平（Chen 等人，2005 年）。

2. 职业隔离和工资差距

124. 妇女在劳动力市场上做出选择的一项重要指标，是具体部门、职业和职位上的性别隔离程度。横向隔离限制了妇女进入具体部门和从事具体职业的机会，纵向隔离将其限制在职业阶梯的特定职位上。

125. 全球只有一小部分就业妇女在工业领域工作（2008 年占 18.3%，而男子占 26.6%）。越来越多的妇女在服务部门工作，2008 年从事服务工作的妇女占女性总就业人数的 46.3%，相比之下，从事服务工作的男子占男性总就业人数的 41.2%（劳工组织，2009 年 b）。虽然在世界所有地区妇女继续走出农业部门，但 2007 年的估计表明，妇女在该部门的人数总体上仍然偏高。据劳工组织估计，在全球一级，妇女在农业中所占的就业份额达到 35.4%，相比之下，男子占 32.2%。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和南亚地区，在女性总就业人数中，60%的妇女集中在农业部门（同上）。发达国家的大多数工人，不论男女都从事薪酬工作。在发展中国家，工人的两性分布存在着更大的差异，但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南亚、东亚和东南亚以及中东的贫困地区，妇女比男子更有可能从事自营职业（劳工组织，2008 年 c）。

126. 纵向隔离是指妇女和男子集中在劳动体系的不同级别上。即使在以妇女为主的职业中，男子通常也占据更熟练、“负责”和报酬更高的职位（劳工组织，2004 年 a）。“玻璃平顶”是指体制障碍，包括规范和态度妨碍了妇女晋升到更高级别管理职位的各种情形（同上）。

127. 劳工组织的数据显示，自 1980 年代以来，劳动力市场上的性别隔离在逐渐减少，各区域之间有一些差异。2000 年，男子或妇女占劳动力总数 80%的职业少之又少（Anker 等人，2003 年）。但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相对于妇女占劳动力总数的份额而言，妇女在护理人员中占相当大的比例。针对 12 个主要高收入国家的《卢森堡收入研究》提供的数据表明，妇女占这些国家劳动力总数的 32%到 54%，占带薪护理人员总数的 68%到 88%（Razavi 和 Staab，2008 年）。如今，大量的妇女通过国际移民以从事护理工作，充当家庭雇工和公共部门的工作人员，特别是向那些护理危机导致对护理人员有很高需求的国家移民（Benería，2008 年）。

128. 劳工组织指出（2004 年 a），在提供数据的国家中，妇女占据了约 30%到 60%的专业职位。然而，正如上文（第二章）所指出的，妇女只占据少数具有权力、影响力或决策权的职位（立法人员、高级官员或经理）。在信息技术产业“新”职业的熟练工种上，她们尚未得到更大的受益。她们占计算机编程和系统分析职位的份额从 20%到 30%不等，在中国、法国、德国、大韩民国和美国，情形各不相同。例如，在加纳，虽然在信息和通信技术方面的业务中 70%的雇员为女性，但她们从事数据录入和呼叫中心服务工作，大多数都在较低的职位上（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开发署），2008 年）。

129. 平等获得体面工作的一项重要指标是两性工资差距，即男性与女性所得工资之间的差别（劳工组织，2009 年 b）。据估计，在全球一级，妇女比男子少挣 16.5%的工资（国际工会联合会，2008 年）。根据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大样本，对

1980 和 1990 年代特定职业类别中两性工资差异对经济增长、贸易和外国直接投资的影响进行了研究，研究发现，有证据证明，两性工资差距在缩小，但这一情况仅限于富裕国家（Oostendorp，2009 年）。在低收入国家或不同的技能水平或职业上，这方面还没有取得明显或重大的效果。

130. 对于两性工资差距变化方面的证据必须谨慎解读。虽然大多数国家制造业中的两性工资差距已经缩小，如哥斯达黎加和联合王国，但其他国家的工资差距却在不断拉大（如，埃及、斯里兰卡和萨尔瓦多）。凡工资差距缩小，是因为男子工资降低而不是妇女工资增高（劳工组织，2007 年 a）。在某些情况下，男女之间工资差距缩小，可能掩盖妇女的阶级鸿沟在不断增长（McCrate，2000 年；Benería，2003 年）。

131. 对欧洲和中亚劳动力市场进行的分析表明，虽然减少性别工资差距是一项重要的政治目标，但进展仍然缓慢。在整个欧洲联盟，在所有经济机构中，男女之间的每小时平均毛收入差距仍然高达 15%（劳工组织，2009 年 b）。

132. 收入差距也影响到在非正规经济领域工作的妇女。作为工资劳动者，她们往往更多的是从事临时工作或计件工资工作，而且收入比男子的少。在印度，妇女临时性工资劳动者的工资收入只是男子收入的一半（Das，2006 年）。在加纳东北农村地区，女性农业工资劳动者得到的薪水仅为男性的三分之一到一半（Whitehead，2009 年）

133. 各地区持续存在的性别工资差距反映了不同的因素，包括在教育 and 技能方面妇女继续处于不利地位；她们缺乏有组织的话语权和谈判权；其在劳动力市场上的流动受到针对其性别的限制；她们从事非全时或临时工作的比率高。这还反映出在女工集中的就业领域里，全球竞争压力迫使将工人工资压低。在某些情况下，它反映了报酬方面的直接性别歧视。例如，在工业化国家，报酬方面的直接歧视问题已受到人们关注，尤其是针对专业和管理一级的工作岗位（劳工组织，2007 年 a）。

3. 有报酬工作和无报酬工作的性别分布情况

134. 各区域现有的数据，包括时间使用研究产生的数据，揭示了男女之间在有报酬工作与无报酬工作上，包括在家庭责任分工和照料工作分工上存在着重大差距和不平等。1970 年代初，无报酬家务劳动的不平等责任的影响，被称为妇女在时间上额外支付的“生育”税（Palmer，1991 年）。

135. 尽管人们就将无报酬工作纳入国民收入账户展开过重要的辩论（开发署，1995 年），²¹ 但大多数照料工作仍然是无报酬的，并继续被列为非经济活动（劳

²¹ 另见 2010 年将出版的关于无报酬工作、时间使用、贫穷和公共政策的《女权主义经济学》。

工组织，2009年b)。妇女的照料责任直接影响到她们在劳动力市场上的选择。在快速老龄化的社会里和艾滋病毒/艾滋病人流行的情况下，人口变化增加了照料需求，将家庭照料的重点从照顾儿童扩大到照顾老年人和重要的劳动适龄成年人上。此外，城市化和移民削弱了传统的家庭支助系统，使单亲家庭增加，这更加重了照料工作的负担（见E/CN.6/2009/2）。

136. 在大多数情况下，妇女更多地参与有报酬工作，并不意味着男子参与无报酬工作的份额会增加。高收入国家提供的有报酬和无报酬工作性别分工的数据表明，在所涉的所有国家中，男子在以市场为导向的工作中花费较长的时间，而妇女则比男子将更多的时间花在做饭、清洁和照料子女上（开发署，1995年；Razavi和Staab，2008年）。在所涉的所有国家中，除北欧国家外，兼顾市场工作和非市场工作，使得妇女的劳动时间更长。

137. 对阿根廷、印度、尼加拉瓜、大韩民国、南非和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进行的时间使用详尽研究显示，如果把妇女从事有报酬工作和无报酬工作的时间都计算在内，妇女的工作时间通常更长，而当家里有幼儿时，妇女的无报酬工作量会进一步增加。较富裕的家庭花在无报酬家庭照料上的时间较少，他们更有可能获得能节省时间的基础设施，如自来水和电，并能够购买节省劳动的技术和雇用家庭佣工（Budlender，2008年）。

138. 为了帮助男女调和工作和家庭责任，一些国家出台了政策上的工作安排，包括缩短较长的法定工作时间、工作时间和地点具有弹性及可从事非全时工作（见E/CN.6/2009/2）。特别是，欧洲联盟做出了重大努力，在其成员国之间推广调和政策。许多国家通过了立法措施，以帮助平衡家庭劳动与劳动力市场的工作（Benería，2008年）。

139. 非全时工作为男女兼顾家庭责任提供了一定的灵活性。不过，它主要由妇女使用。在经合组织内部，将近四分之三的非全时工作是由需要抚养子女的妇女承担的，超过四分之一的妇女从事非全时工作（经合组织，2008年）。在联合王国，在成为父母后，妇女往往从事非全时工作，而男子则延长了他们的工作时间（Bellamy和Rake，2005年）。从事非全时工作的妇女往往面临工资处罚。全职工作的妇女仅赚得全职工作男子计时工资的82%，而从事非全时工作的妇女仅赚到男子工资的59%。工业化国家提供的证据表明，与养育子女相关的工资差距是：养一个孩子的收入差距为6%至7%、养两个孩子的收入差距为13%（劳工组织，2004年a）。不过，在瑞典，由于妇女占非全时工作人员的97%，她们得到国家全面的支持，因此相对于从事全职工作的妇女来说，非全时妇女不会受到工资处罚（Bardasi和Gornick，2008年；Stark，2008年）。

140. 反之，如果没有选择非全时工作，妇女则会受到工资处罚（Nagy，2008年）。在许多东欧国家，社会主义时期曾盛行一时的托儿服务支助业已废除，同时非全时工作方面没有任何规定，这就意味着现在妇女被迫在养育子女与挣工资之间做出选择。要在这两者之间取得平衡，现在越来越困难（Fodor，2009年）。

141. 在发展中国家，许多贫穷妇女将自营职业作为调和其家庭责任与收入需要的手段。这并非总是自愿决定的。在危地马拉城的贫民居住区，40%低收入家庭有工作的母亲自己照顾子女，这意味着如果其子女不能在其身边，她们不可能就业（Hallman等人，2002年）。在吉尔吉斯斯坦进行的研究表明，24%的妇女指出，照料责任使得她们无法利用劳动力市场中的工作机会，有这种说法的男子只占2%（Morrissey等人，2007年）。在拉丁美洲，全部未就业的20-24岁妇女中有一半以上指出，无报酬的家务劳动是她们没有就业的原因（Addati和Cassirer，2008年）。

142. 同时，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其他有年幼子女的贫穷妇女可能不得不去工作，因为她们缺少自己创业所需的资金、技术和必要的社会网络，或者她们觉得薪酬工作比她们可从事的任何形式的自营职业能给自己带来更高的回报。这些妇女通过各种方式维持生计（Kabeer，2008年a；Addati和Cassirer，2008年）。一些妇女依靠其他女性亲属，包括较大的儿童，来承担其照料子女的责任，这样做对儿童的教育前景会产生不利影响。一些妇女带着孩子到市场、田间或路旁工作。其他人则将孩子留在家里，让他们自己照顾自己。

143. 在世界各地，对那些寻求调和家庭责任与就业需求的富裕家庭来说，雇用家庭佣工一直是一种常见的解决办法。充当家庭佣工已成为妇女就业的主要来源之一；例如，2004年，在拉丁美洲国家，在所有新增的就业岗位中，家庭服务占10%（Antonopoulos，2008年）。在许多国家，家庭佣工（通常是移民妇女或少数群体妇女）的工作条件普遍恶劣，常常易受暴力侵害和性剥削（联合国，2006年a）。许多家庭雇工没有正式合同，得不到社会福利，如医疗保险或退休金（Razavi，2007年）。而家务劳动的隐蔽性使得执法变得更为困难（劳工组织，2009年c）。

B. 进一步获得劳动力市场上的经济机会

144. 妇女在许多不同的经济部门工作、拥有不同的职业地位，这表明，没有任何一种单一的干预政策能全面解决妇女面临的制约因素。关键的干预措施重点放在培养和提高妇女的人力资本和能力上，对她们进行能力投资，使她们能适应不断变化的劳动力市场；为她们的家庭照料责任提供支持；制订公平的劳动力市场管理条件；增强妇女的话语权和集体行动能力。

1. 教育和技能培养

145. 教育在促进两性平等和赋予妇女权力及更广泛的发展目标方面的改变潜力已得到广泛认同。千年发展目标 3 强调需要缩小初等教育的性别差距，这方面已经取得了重大进展（国际复兴开发银行/世界银行，2008 年）。通过教育获得的知识和技能，增加了就业机会。据估计，妇女每额外增加一个学年的学校教育，其工资增长 10%到 20%（Psacharopoulos 和 Patrinos，2004 年）。与发达国家相比，发展中国家的学校教育回报率更高，且因受教育水平和性别而有所不同。在发展中国家，按性别分列的回报率最大的差异体现在初等教育上，通过接受教育，男子获得的经济利益比妇女更大。对此，可能的解释包括对妇女的歧视和对不同教育水平的男女提供的就业机会不同（国际复兴开发银行/世界银行，2008 年）。

146. 在受教育机会上歧视妇女和女孩，是世界许多地区劳动力市场出现性别隔离的一个潜在原因。2006 年，女性在大学本科理科专业中所占的中位份额通常为 29%，占工科专业 16%（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教科文组织），2008 年）。必须努力鼓励女孩学习非传统科目，包括数学、科学、工程和计算机技术。将数学和科学与女孩和男孩的日常生活联系起来，这种对性别问题有敏感认识的课程设置和教育学的重要意义一直受到强调，将此作为提高女孩对科学兴趣的一种方式。

147. 教育投资还需要弥补当代劳动妇女在人力资本和能力方面的不足。失去扩大受教育机会的贫穷妇女可能找不到工作，或被限制在现有岗位上而很少有晋升机会，因为她们缺乏教育和技能。加强对妇女的教育和培训还会增加她们在技术移民计划下的移民机会（国际移民组织，2008 年）。技能培训还将解决移民妇女中的去技能化和技能侵蚀问题。有必要采取各种方法，包括进行非正规教育、技术和职业培训、农业推广服务、在职培训、终身学习及新技术培训，帮助这些妇女找到更好的工作。

148. 在技术和市场迅速变化的背景下，工人们需要技能，以使它们能利用新机会。2008 年举行的国际劳工大会第九十七届会议得出结论，要求向工资劳动者和自营职业者提供继续学习的机会，以提高他们的竞争力，使他们可以终身学习新技能。社会从属群体，包括妇女也需要投入，以提高她们的自信心、认识自己的权利及谈判技巧（劳工组织，2008 年 d）。

149. 妇女获得培训机会的证据表明，培训工作还有很大的改善余地。许多职业培训方案在培训机会和内容上都重现了性别偏见，并有利于“男性”职业培训（木工、金工、泥瓦工和汽车机械师）。凡是为妇女提供的培训方案，往往只限于传统上被认为面向妇女的科目——如家政学、文秘、裁缝、理发和美容。在这种情况下，即使训练成果带来了就业机会，工资往往也很低。即使课程中包括信息和

通信技术培训，妇女往往被降级到文字处理上，而软件开发则以男子为主（联合国提高妇女地位司，2005年）。

150. 职业培训使妇女获得了新技能，帮助妇女应对了在劳动力市场面临的一些障碍。加勒比海地区在非传统技能方面对妇女进行培训，评估这一努力得出了以下结论，越来越多的妇女到非传统行业找工作。但是，由于妇女面临未来雇主的偏见，许多妇女在如下领域开始创业，如木工、小家电修理和制造业。对在建筑部门就业的妇女进行的一项调查发现，多数人认为，正规的建筑技术培训增加了妇女的职业选择，但妇女在走上这些岗位时仍遇到一些障碍（Ellis，2003年）。

2. 重新分配无报酬工作

151. 重新分配无报酬工作、促进平等分担家庭责任需要一系列的政策干预。其中一个办法是提供公共服务和节省劳动的技术和基础设施。另一个办法是由其他行为者提供服务 and 基础设施支持。第三个办法是在男女之间重新分配无报酬工作负担。

152. 对公共基础设施投资，如对水、运输和能源投资能大大减轻家务劳动，包括家庭里的照顾工作，在发展中国家尤其如此。同样，技术发展，如自来水或电器能进一步减轻时间和能量负担。需要采取措施，以增强贫穷家庭获得基础设施和技术。例如，毛里求斯出口加工区雇主福利基金以优惠利率向工人提供贷款，以购买家用电器（Addati 和 Cassirer，2008年）（另见第四章）。

153. 提供可靠和负担得起的儿童、病人和老年人照料设施和服务，在促进调和工作与家庭生活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某些情况下，投资于教育服务，能使家长兼顾家庭和劳动力市场上的工作。最常提供的设施是学龄前学校和幼儿园。政府鼓励私营部门和非政府组织成为积极的服务提供商，并向照料提供者提供补贴，或给家长提供收入津贴，使托儿服务更加优惠。例如，阿根廷、智利、大韩民国和乌拉圭通过扩大服务范围和试行供资和服务提供机制，努力提供更全面的托儿服务（E/CN.6/2009/2）。但是，世界上几乎有一半国家没有3岁以下儿童的正式方案，即使在有这种方案的国家，其覆盖面也是有限的。不过，在西班牙，儿童从6岁开始接受义务教育，学龄前教育（3至5岁）是免费的，而且有95%的3岁以上儿童在接受学龄前教育（Benería 和 Mertíaz-lylisias，2009年）。

154. 在男女之间重新分配无报酬劳动负担需要采取广泛的政策干预，重点是要改变个人的行为和态度以及机构安排，尤其是在劳动力市场。对20个发达国家1965至2003年间进行的研究发现，男子的无报酬劳动有所增加。引起这一变化的主要原因在于，妇女越来越多地参加有报酬工作，加上国家和雇主出台的政策，使得男子更容易参与无报酬工作（Hook，2006年）。这项研究指出，确定哪些政策和结构阻碍或促进男子参与无报酬工作具有重要意义。北欧国家对平等发挥照料

作用和平等分担无报酬劳动进行了最系统的推广。这些国家也是经合组织中女性劳动力参与率最高的国家（经合组织，2008年）。

155. 在某些情况下，转变要通过民间社会倡议来促进。在巴西和墨西哥，H 方案制订了动员青年男子参与的记录完善的方案，利用为人之父、照料儿童和艾滋病毒/艾滋病方面的讲习班、录像和手册，促进态度和行为的转变（Barker，2008年）。南非的 Sonke 性别公正网络采用了创新办法来增强男子照料子女的能力和承诺，包括对农村地区受艾滋病毒/艾滋病影响的孤儿的照料（Esplen，2009年）。津巴布韦推出了一个名为“关爱非洲”的创新项目，连续培训了120名20岁至65岁男子作为照料志愿者，以加强男子参与家庭照料和艾滋病毒/艾滋病教育（E/CN.6/2009/2）。

156. 不过，男女之间更多地分担家庭责任并不足以应对长期存在的家庭照料挑战。需要所有利益攸关方——国家、私营部门、民间社会和家庭——更多地参与照料工作，以应对社会中长期存在的照料挑战（A/CN.6/2009/2）。政府提供完善的护理服务，促进了工作与家庭生活的调和。在北欧国家以及欧洲联盟其他国家，政府提供这些服务，使得妇女在劳动力市场上获得了更多的机会。现有的研究表明，更平等地分担各种责任对男女双方都有益，特别是能使工作与生活更加平衡兼顾并使福利得到改善，增进了配偶之间及父母与子女之间的关系。这样做还使那些倡导家庭与工作调和的企业的生产率得到提高。

3. 监管框架

157. 1998年国际劳工大会第八十六届会议通过了《劳工组织关于工作中的基本原则和权利宣言》及其后续文件，标志着成员国之间达成了一项新的普遍承诺：尊重、促进和落实结社自由原则；承认集体谈判权利；消除一切形式的强迫劳工和强制劳动；废除童工；以及消除就业和职业歧视。

158. 劳动力市场管理条例影响了雇主与劳工签订服务合同的方式，其中包括明确双方的权利和责任、工作条款和条件及争端处理。这种管理条例有助于消除两性不平等和劳动力市场上的歧视，确保妇女获得体面工作（Seguino，2002年b）。这种管理条例有性别区分——可以明确适用于男子或妇女，或者没有性别之分。有性别区分和没有性别区分的管理条例可以促进两性平等和赋予妇女权力，但也可能造成有害影响。

159. 有些有性别区分的某些形式的立法——如禁止妇女上夜班原本是为了“保护”妇女，可能反而限制了妇女的就业选择。加班，包括上夜班，均对男女的家庭没有好处，各国政府应当指定男女加班的时限，强制执行工时和加班工资管理条例。其他一些旨在解决限制妇女就业的制约因素的、有性别区分的管理条例，可能会损害妇女的就业机会，如果这些管理条例会产生成本，尤其是如果这种成

本由私人雇主承担 (Rodgers, 1999 年)。雇主、雇员和政府分摊费用的有性别区分规定较为理想, 这既会减少性别歧视, 又能抑制对工资的消极影响。一些国家已经在努力限制妇女移民, 力图保护妇女在劳动力市场上免受虐待, 特别是在充当家庭佣工方面。该法律旨在保护工人, 但也可能限制妇女的流动性及其就业机会 (联合国, 2004 年)。

160. 一些看起来无性别区分的管理条例可能使女工大大受益。不过, 这些管理条例在何种程度上会使弱势女工受益, 取决于劳动力市场的条件及这些管理条例的执行情况。对最低工资影响进行的研究表明, 这些管理条例往往对剥削劳动最严重的领域产生积极影响 (Devereux, 2005 年)。最低工资为工人争取“公平的报酬”提供了一个可以参照的基准, 即使是在非正规经济环境下。

161. 管理条例得到公正和正确执行, 可使弱势工人得到保护, 有助于弥合正规工作条件与非正规工作条件之间的差距, 有助于创造更加统一的劳动力市场。然而, 现在越来越难以确保所有妇女都受益于劳动力市场的管理条例, 因为在发展中国家, 许多妇女在非正规部门工作, 而这些部门是管理条例可能没有触及到的 (Cornish, 2007 年; Franck, 2008 年)。虽然人们认识到非正规经济再也不能被定义为正规经济没有包括的一切经济活动, 因为如此狭隘的概念未将两者之间日益增加的工人流动包括在内 (Kaufmann, 2007 年), 核心劳动标准, 无论多么有效, 通常都局限在正规经济领域 (Luce, 2005 年)。劳工组织有关体面工作议程的最高目标是, 使更多工人从事正规工作, 获得更多的权利, 获得社会保障和集体谈判权 (Chant 和 Pedwell, 2008 年)。

162. 劳工组织关于体面工作和非正规经济的报告指出, 将相关权利延伸到非正规经济具有坚实的国际基础。它指出, 国家和地方两级的非正规部门缺失劳动权利, 可以追溯到国家和地方法律及实践如何表达和执行这些权利, 以及如何使非正式工人有权诉求自己的权利。权利缺失与企业是否注册、是否遵守管制商业活动的管理条例有关。该报告还强调了劳动管理部门实施的限制。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 劳动监察部门的人员或设备配备不足, 无法在非正规经济中有效地执行相关标准, 当涉及到无数的微型企业和小型企业或越来越多的家务劳动者时尤其如此 (劳工组织, 2002 年 a)。

163. 有些国家制订了创新计划, 以应对这些制约因素, 这包括劳动监察助手、工会和非正规工人自我监督。以印度古吉拉特邦为例, 其邦政府同意允许自营职业妇女协会协助监督家务劳动者的状况, 并根据最低工资制订最低计件工资标准 (同上)。

164. 有些国家, 如阿根廷、智利和南非已采取立法措施, 为家庭佣工提供基本的劳动和社会权利 (E/CN.6/2009/4)。自 2002 年以来, 南非的家庭佣工有权获得

最低工资，有权带薪休假和获得加班费及遣散费。雇主必须帮助家庭佣工在失业保险基金注册，并为该基金缴费，使她们有资格获得失业保险和生育津贴（国际劳工组织，2009年c）。

165. 劳工组织的国际劳动标准、《劳工组织关于工作中的基本原则和权利宣言》以及其他国际文书，如《千年发展目标》、《北京行动纲要》和《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为把有关权利扩大到非正规经济提供了坚实的国际基础（劳工组织，2002年b）。

4. 话语权和谈判权

166. 政府代表、雇主和工人就共同关心的经济和社会政策问题展开社会对话，对话包括所有类型的谈判、协商或信息交流。在开展对话时应当提出妇女的优先事项和需求。不过，劳工组织对50个社会对话机构进行的研究发现，几乎有一半机构没有将两性平等方面的问题纳入他们的议程。一些国家在努力地应对这种排斥现象。在非洲法语国家，劳工组织促进社会对话区域方案在23个国家推广一种社会对话文化，并将两性平等作为一个交叉问题纳入其中。在一些拉丁美洲国家，在国家一级的采取行动包括设立专注于两性平等问题的三方委员会。在一些具体部门采取了相关行动。英国女警察协会与其他组织合作，促进警察部队的性别均衡，创造一种有利于争创佳绩的环境，促进妇女参与政策制订（劳工组织，2009年d；Breneman-Pennas和Rueda-Catry，2008年）。

167. 女工主张其优先事项和需求及诉求权利的能力，往往因她们在劳动力市场上的弱势地位而受到削弱。在世界一些地方，妇女比男子更有可能在家工作，在非正规经济领域从事自营工作，或在私人住宅充当家庭佣工，在那里她们可能远离与其具有共同利益的其他工人。为此，培养女工的能力，使她们在代表自身的需求和利益的组织中发挥积极作用非常重要。妇女通过各种组织积极要求其经济权利，包括通过政党和工会以及妇女组织和网络。

168. 在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并非只有工会站在斗争的最前线，维护弱势工人的权利，尤其是妇女的权利。一些妇女活动家也在做出协调一致的努力以促进主流工会对女工的需求更具敏感性，这方面取得了一些成功。许多国家的工会开始越来越关注社会问题，这种关注超越了传统的对工资和工作条件的关切，包括更加重视两性平等方面的问题并要求制订对家庭友好的政策（Addati和Cassirer，2008年）。工会越来越多地帮助解决与移民女工有关的问题。一些工会设立了专门机制以确保妇女问题不被忽视，如墨西哥妇女联盟网络（Brickner，2006年）。

169. 促进女工权利的、仅由妇女组成的联盟和组织越来越多。例如，在大韩民国，在1990年代金融危机后期，就成立了三个新的妇女工会，以打击对女工的剥削和虐待（Broadbent，2007年）。在尼加拉瓜，1994年，由于主要工会未能支持

果酒业女工的要求，该国妇女成立了女工和失业妇女运动（Bickham Mendez, 2005年）。印度的自营职业妇女协会和南非的街道网络也是专门为非正规经济领域妇女服务的众所周知的妇女机构典型。

170. 一些国家还成功地将一些边缘化女工组织起来，如南非的家庭佣工（Devenish 和 Skinner, 2004年）、印度的拾荒者（Chikarmane 和 Narayan, 2005年）以及马来西亚移民妇女（Lyons, 2006年）。这些组织创造性地使用法律公约，包括《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促进社会认可她们的工作，使她们的劳动得到公平回报，并使她们获得社会保障。

四. 获得土地、住房和其他生产性资源

171. 在世界许多地方，构成家庭生计战略的各种活动要求获得一系列的生产性资源。土地和住房是生产场地，具有保值功能，可防备紧急情况，是收入来源和以消费和投资为目的的信贷担保手段。它们还为人们提供保障且界定个人的社会身份。土地和其他自然资源，再加上为实现其生产潜力所需的基础设施和服务，对于城乡生活是至关重要的。在农村地区，妇女和男子还需要获得水和森林产品，以及农业和非农业工作所需的生产性投入，以支持他们的生计战略。

172. 在世界许多地方，妇女在粮食生产中的重要性，彰显了有必要向她们提供耕地的保有权保障，以及她们获得和控制必要资源的权利，以提高农业生产力和增强粮食保障（Grown 等人, 2005年；Agarwal, 1994年）。妇女获得土地、住房、信贷、技术、市场和推广服务的权利有限，将损害妇女的可持续生计。

173. 人口增长、经济政策、气候变化、市场普及和城市化带来的变化，对妇女获得和控制资源带来了新的挑战 and 新的机遇。要掌握这个复杂问题的全球概况是比较困难的，尤其是鉴于资源所有权/控制权/使用权方面缺乏按性别分类的数据。

174. 气候变化和粮食及能源危机对可持续发展造成了日益严重的威胁。鉴于妇女在生产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她们特别容易受到干旱和降雨不稳定的影响，这进一步加剧了她们获得和控制资源方面的不平等（世界银行/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粮农组织）/国际农业发展基金（农发基金），2009年）。不过，妇女在家庭和社区一级负责管理自然资源，使她们在生计战略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现实方面处于有利地位。她们在水资源管理、森林管理和生物多样性方面的知识和技能有助于促进适应和减轻战略（开发署，2009年）。

175. 粮食危机所导致的粮价上涨，已影响到数百万人的生计。穷人花费他们的大部分收入来购买粮食，妇女和女孩也深受影响。妇女不能平等获得资源，限制了她们确保其家庭粮食保障的能力。从短期和长期来看，进一步重视农业妇女所面

面临的挑战，对于有效应对粮食危机是必不可少的。能源危机也影响到妇女的经济活动，因为她们需要提供和使用能源，要承担最大的时间和健康负担，每天要花多达 3 小时的时间收集传统燃料，如木柴、牛粪、木炭和农产废料（世界银行/粮农组织/农发基金，2009 年）。

176. 本节审查了在主要经济资源分配上存在的两性不平等，重点放在土地和住房上。本节还讨论了在习惯法和成文法、公共政策、市场准入及其行动的可持续所需的政策大环境变革方面消除性别歧视所做的努力。

A. 土地和财产

177. 促进妇女获得和控制确保生产率和生计战略安全所需的基本资源有确凿的理由。妇女在农业和农村生计上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作为无报酬的家庭劳动者、独立的农民和工资劳动者，妇女往往得不到土地、信贷和其他生产性资产。在一些地区，由于男子移民外出，妇女在农业和农村发展中的作用有所增强。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许多国家，妇女占农村劳动力的比例越来越高（劳工组织，2008 年 c）。

178. 未能获得和控制土地和财产，与贫穷、移民、城市化、暴力和艾滋病毒/艾滋病的联系越来越密切（Agarwal 和 Panda，2007 年；Grown 等人，2005 年）。越来越多的证据证明，妇女进一步获得不动产资源，可使妇女本身及其家庭和社区得到多重好处，能够提高生产率（Mason 和 Carlsson，2004 年）、改善福利待遇，包括使儿童保健和教育方面受益（Quisumbing 和 De la Briere，2000 年）。

179. 决定资源分配的规则、规范和惯例已植根于社会各个组织中——植根于家庭、亲属、社区、市场和国家。所有权、使用权和控制权之间的区别，以及成文法与习惯法之间的区别，给土地和财产分配带来了不同程度的复杂性。

180. 妇女可通过遗产继承、婚姻、土地改革方案和土地市场获得土地和财产。在决定妇女获得和控制资源的能力方面，遗产继承、婚姻、立法改革和政府政策通常比土地市场发挥了更大的作用。事实证明有些渠道对变革具有较强的抵抗力。

181. 虽然只有少数国家拥有在获得和控制土地资源上男女不平等程度的综合数据，但对世界许多地区所做的小规模调查和研究表明，这方面的两性不平等现象比较严重（Grown 等人，2005 年；Deere 和 Leon，2001 年；Agarwal，1994 年）。有若干因素助长了不平等现象，包括歧视性的遗产继承惯例；不平等的土地市场准入；及带性别偏见的土地改革，包括以“户主”名义登记的土地登记做法，而户主通常都由男性担任（Grown 等人，2005 年）。

182. 在许多国家，成文法管制着土地和财产的所有权。凡是成文法和习惯法双轨制度并存的国家，都做出了一些努力，以确保这些系统的统一。土地和财产的公有制和私有制也可并存。例如，在莫桑比克，自独立和实行法律改革以来，尽管土地实行了国有化，但土地和财产分配仍然主要以用户使用权为基础（Jenkins, 2004 年）。

183. 在世界的一些地区，土地和财产归社区所有。例如，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社区所有权可能归属于家族或部落。在某些情况下，男女双方只有土地使用权，男性长者保留对土地财产的控制权。在其他情况下，土地分配给有血缘关系的男性成员，当他们结婚时，妇女便从丈夫手中接收部分土地的使用权，并对土地耕种和收益使用有不同程度的自由裁量权（Lastarria-Cornhiel, 1997 年）。其他资源作为共同财产，在社区内广泛分配其使用权，包括公共牧场、森林、河流、小溪和乡村池塘。这些资源对于贫穷家庭和土著团体具有重要的价值，对妇女来说尤其如此，她们依靠这些资源提供燃料、食品、饲料以及收入来源。

184. 在确定妇女获得土地、住房和其他形式的财产上，继承和婚姻制度发挥了关键作用（Agarwal, 1994 年）。传统的继承法在对妇女财产权的认可上程度有所不同。男性直系成员之间继承遗产，是非洲和亚洲国家最广泛采用的遗产和财产继承形式，在这里，财产通过家族中的男性成员一代一代传承下去。这种制度把妇女排挤为家庭农场无报酬的家庭劳动者，或在无土地和土地贫乏的家庭日益增多的情况下，把妇女排挤为农业雇用劳动。在母系社会制度下，血缘和财产是通过母亲家族继承的，尽管在实际当中存在着广泛的差异（联合国人类住区规划署（人居署），2007 年 a）。有些地区也执行双向的财产继承制度，男女都可以继承财产，比如，斯里兰卡的僧伽罗人（Agarwal, 1994 年）。在历史上，在南亚不同的地区，所有这三种继承制度都并存过，但通过父系继承财产的制度最为常见（同上）。

185. 婚姻财产制度管制通过婚姻带来的和婚姻存续期间婚姻获得的财产的所有权和控制权，一旦丧偶或婚姻关系破裂，婚姻财产制度将决定妇女面临怎样的命运（Deere 和 Doss, 2006 年）。凡妇女被视为丈夫的监护对象，婚姻财产的控制权，往往还有所有权，一般都由丈夫和他们的家人掌控。许多妇女在她们解除婚姻或其丈夫死亡后其财产权容易被剥夺。在非洲部分地区，妇女一旦遭到遗弃或其丈夫死亡，她们很可能会失去土地使用权。越来越多的报告显示，因艾滋病导致丧偶的妇女更易受到损害，她们的土地、牲畜和其他资产被丈夫的家人剥夺（Strickland, 2004 年）。在南亚部分地区，妇女一旦成为寡妇，将一贫如洗，甚至在她们的合法权益被剥夺后，这些妇女不得不到其丈夫相对富裕的兄弟的农场充当农业工人（Agarwal, 1994 年）。

186. 不过，在拉丁美洲大部分地区，妇女从事家务劳动所做的贡献得到默认，这有助于在婚姻关系解除时她们可保留自己的个人财产以及一半共同财产（Deere

和 Doss, 2006 年)。另一方面, 在南亚, 如果婚姻破裂, 妇女有时很难得到她们要求分得的那份共同财产 (Agarwal, 2002 年)

以对性别问题有敏感认识的方式重新分配土地和财产

187. 许多国家进行了法律改革, 颁布了新的法律或修订了现行立法, 以保障妇女有权在其自己名下拥有或继承土地和财产, 禁止基于性别的歧视 (Benschop, 2002 年)。例如, 2004 年《莫桑比克家庭法》承认习惯法婚姻和非正式婚姻, 允许根据习惯法结婚的妇女获得婚姻财产 (人居署, 2007 年)。在卢旺达, 给予妇女土地权, 成为冲突后重建进程的一部分。《婚姻制度、继承权和馈赠法》遵从以下原则, 妇女与其兄弟平等地拥有财产所有权和财产继承权, 并要求登记结婚的夫妻共同承诺共享婚姻财产的所有权和处置权 (Grown 等人, 2005 年)。在印度, 《印度教继承法 2005 年修正案》(印度教徒占印度人口的 80%) 给予子女平等继承一切形式财产的权利, 包括对农业用地的继承权 (Agarwal, 2005 年)。

188. 经验表明, 立法改革未必能转化成“物权”, 尤其是社会上长期存在的偏向于男性拥有土地权的社会规范可能反弹。许多国家执法力度不够。即使妇女的权利得到法律承认, 社会习俗通常也会阻碍她们实际控制土地和其他生产性资产 (Deere 和 Leon, 2001 年; Agarwal, 1994 年)。在根深蒂固的农村等级制度中土地具有核心重要性, 这意味着妇女诉求其土地权利可能受到限制 (世界银行/粮农组织/农发基金, 2009 年; Walker, 2003 年)。妇女的从属地位、文盲、担心破坏家庭内部关系及只许男子拥有土地的文化规范等因素结合起来, 使这一进程变得艰难且代价高昂。在一些地区, 如在南亚许多地方, 妇女依赖于所出生的家庭, 将其作为婚姻破裂或丧偶后的一种退路, 她们往往放弃权利要求, 将这些权利让给自己的兄弟。当她们结婚嫁到远离故乡的地方时, 这种情况尤其突出 (Agarwal, 1994 年)。

189. 在过去十年多里, 人们一直就妇女拥有这种权利可以更好地改善妇女获得土地情况并提高其生产率进行辩论。人们认识到, 特定的社会经济环境决定了某类土地和财产权是否合适。个人的权利至关重要, 因为这会提高妇女的谈判能力, 使她们能够掌控自己的劳动成果, 并可按照自己的意愿给后代遗赠土地, 并在婚姻出现冲突时, 使她们有权要求其财产份额 (Agarwal, 1994 年)。不过, 在妇女的土地权利不存在或薄弱的情况下, 在中期联合拥有这些权利也可能更可取, 这样将来有可能获得个人权利 (Agarwal, 2002 年; Deere 和 Leon, 2001 年)。在某些情况下, 鉴于家庭关系在贫穷妇女生活中的重要性, 她们的利益可通过各种机制得到最好的维护, 这些机制使她们的权利得到保障并延伸到家庭集体资源 (Walker, 2003 年)。

190. 在其他情况下，如果妇女以团体方式拥有土地权，形成某种形式的土地托拉斯，拥有使用权但不拥有转让权，能够更好地满足她们的利益（Agarwal，2002年）。有人还建议，如果妇女集体合并她们的小块土地来耕种，她们能够更好地保持对土地及生产的控制权，会更有效地耕种土地，因为集体形式可使她们对单独供应不起的农资投入进行集体投资（同上）。这表明有必要对妇女的财产权问题，尤其是土地权问题采取因地制宜、多管齐下的具体解决办法。

191. 土地改革进程可以发挥重要作用，以应对妇女获得土地和财产方面存在的平等现象。早期的大多数土地改革，如南亚和拉丁美洲的土地改革主要针对男户主（Agarwal，1994年；Deere和Leon，2001年）。在非洲，土地所有权项目往往导致土地、树木和水资源权利的个别化，会排斥那些早先通过习惯法获得这些土地的人，包括妇女。例如，在津巴布韦，98%的农场和牧场土地的安置许可证都由丈夫持有（Petrie等人，2003年）。来自既得利益集团强大的阻力和薄弱的政治意愿，会破坏一些确保对性别问题有敏感认识进程的早期努力。

192. 不过，情况在逐步变化。例如，在越南，虽然再分配过程中的土地使用证曾主要登记在男子名下，但2003年《土地法》要求所有登记家庭资产和土地所有权的文件列入配偶双方的姓名（世界银行等，2006年）。然而，法律并不要求变更先前发放的土地登记证中的户主资料。根据2004年越南生活标准计量调查，男子持有60%农用土地和66%住宅用地的唯一土地登记证。

193. 在世界许多地区，土地市场是向妇女转让土地和财产的较为薄弱的一种手段（Grown等人，2005年）。就业方面以及获得其他资源如信贷方面的现有不平等现象会限制妇女进入市场。例如，个案研究显示，拉丁美洲的一些土地市场存在着性别歧视，研究同时表明需要有明确的、强制性的公共政策，以促进妇女的参与（Deere和Leon，2001年）。不过，市场能成为妇女，尤其是贫穷妇女获得国家补贴信贷的一个重要渠道。在南亚的一些地区，市场的潜力已经得到证明，在这些地区，无土地的妇女利用政府提供的补贴信贷，合伙租赁或购买土地并进行联合耕种（Agarwal，2002年）。在印度南部，10至15名贫穷妇女组成的小组利用政府的赠款和贷款补贴计划租赁或购买土地。妇女们一起工作，学会了土地测量、租赁设备、到城镇拜访政府官员以及获得所需的农资投入和产品营销。据报告，妇女在粮食保障、儿童保健和教育方面都得到了改善，她们可更好地控制家庭收入、减少家庭暴力并提高了社会地位（同上）。

194. 世界许多地区已经研究出不少创新做法，以在分配土地和财产时对性别问题有敏感认识。在危地马拉，国家发起的土地市场方案以土地银行为基础，要求在登记土地时土地证上有夫妻双方的名字（人居署，2007年a）。在印度，国家和地方政府各级通过奖励措施鼓励妇女获得土地所有权。例如，2002年，德里邦对登记在妇女名下的财产降低了印花税，将税率从8%降至6%，如果以夫妻共同名

义登记，印花税降至 7% (Narain, 2007 年)。在孟加拉国，民间社会团体开展动员工作，将政府未使用的土地重新分配给无土地的群体，导致土地证最初发放给“男户主”。后来妇女们动员起来，确保夫妻双方的共同所有权 (Kabeer, 2008 年 c)。在冈比亚，一项农业发展项目在征得社区同意后，将土地分配给新近定居的无土地妇女，作为回报，这些妇女须参加开垦沼泽地的劳动，用来种植水稻 (世界银行/粮农组织/农发基金, 2009 年)。在肯尼亚、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和乌干达，妇女获得土地信托机构利用妇女团体和住房合作社的储蓄，向地方当局收购土地。这些获得土地信托机构的作用是，在低收入妇女与国家政府、金融机构、私营部门和其他行为者之间发挥土地中间商的作用 (人居署, 2004 年、2007 年 b 和 2009 年)。

195. 为了促进对性别平等有敏感认识的立法、加强现行立法、使司法系统更好地响应妇女需求并为妇女服务，各方还需持续努力。此外，还需要在负责执法的机构中增强两性平等意识，为妇女争取自己的权利提供法律援助，并开展宣传运动，提请人们注意在土地政策上两性平等的重要性 (Knox 等人, 2007 年)。致力于促进妇女土地和财产权的妇女团体和网络所做的努力也应当得到支持。例如，在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虽然性别与土地问题工作队的动员活动未能如愿地对 1999 年《新土地法》中的习惯法进行改革，但她们所开展的宣传和行动确保制订了明文规定，以解决她们的一些关切，并就应对歧视妇女的做法的必要性展开广泛辩论 (Tsikata, 2003 年)。

B. 共有资源：水和森林

196. 获得水资源对于家庭和生产都是必不可少的。在许多国家的农村地区和城市贫民区，取水是妇女家务劳动中最耗费时间和精力的一项工作。据估计，在非洲，妇女和儿童每年要花费 400 亿个小时取水 (妇发基金, 2008 年)。如果旱灾、洪水、降雨分布不均和森林采伐破坏了水资源的质量和供应，其时间负担将大增。

197. 改善供水，确保在适当的距离内拥有足够数量和质量的用水，可以减轻妇女在家庭和生产活动中的工作负担，使她们能有更多的时间花在创收、参政和休闲活动上。例如，比较印度两个村庄的家庭供水情况后，发现在供水状况好的村庄里，妇女能够花更多的时间进行创收活动，并且她们的收入水平得到大幅提高，从每人每年 750 卢比提高到每人每年 5 500 卢比 (Sijbesma 等人, 2009 年)。

198. 从实地工作中吸取的经验教训突显了改善农村地区用水对于妇女的生产率具有重要意义 (Quisumbing 和 Pandolfelli, 2008 年)。在布基纳法索、乌干达和赞比亚，在住户 400 米内找到水源，每年可使每户节省大约 124 小时到 664 小时 (Barwell, 1996 年)。在津巴布韦农村地区，妇女的菜园是家庭收入和粮食保障的一个重要来源，当地的集水井项目为各个家庭和菜园提供生活灌溉用

水。虽然修建集水井和开发菜园的平均成本比打一口靠手压泵取水的标准水井成本高得多（分别为 10 600 美元和 4 700 美元），但是靠这些菜园赚来的钱可以用来投资做小生意或存入银行。在塞内加尔，社区向家庭和牧民销售社区井水赚得的收入可以贷给妇女群体，以便她们创办企业，如销售水果、蔬菜和花生。

199. 男女农民都需要用水来灌溉和饲养牲畜。在一般情况下，妇女比男子面临更大的障碍，因为要获得灌溉系统往往依赖于土地保有权。灌溉项目管理人员往往这么处理，要么将妇女用水需求放在男子名下，或者以家庭用水为名平均分配。妇女们往往被排除在用户协会之外或仅有极少人参加协会。男子，尤其是那些富裕家庭的男子，往往有更多的外部关系，包括与负责灌溉的官员有政治关系，他们更积极地参加用水者协会会议，在水资源管理决策上具有更大的影响力（Meinzen-Dick 和 Zwartveen, 1998 年）。

200. 有 28 亿人每天仅靠 2 美元或不足 2 美元生活，森林为其中近一半人提供给养（世界银行，2002 年）。森林在全球粮食保障、在提供食物、饲料、燃料和药品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整个发展中国家，妇女为森林养护，包括农林和流域管理做出了重要贡献。妇女拥有丰富的森林资源知识，为家庭提供了重要的营养和收入来源。²²

201. 森林枯竭对妇女产生严重影响。在世界许多地区，砍伐森林剥夺了妇女的主要烧柴来源（木柴在大部分发展中国家是最重要的烹饪燃料），剥夺了她们的动物饲料、补充食品项目、可带来季节性收入的非木材森林产品、草药及其他许多生活物品的来源（Agarwal, 1992 年）。

202. 在自然资源管理权利下放的背景下，人们越来越认识到，社区能够管理共同的土地、森林和水资源。这导致许多发展中国家形成了用户团体，他们集体工作，共同管理这些共有资源。会员的排他性规则和社会规范，有时导致这些用户群体被男子和更多的社会特权阶层所垄断（Rao, 2006 年；Agarwal, 2001 年）。例如，一些南亚国家，尤其是印度和尼泊尔都发起了社区林业方案，让森林用户团体参与到当地退化森林的恢复工作中。在印度森林管理联合方案中，妇女往往不是联合方案的成员，因为方案规则只允许每户一人加入——这个名额必然落在“男户主”头上。同样，在这些群体的决策机构中，妇女的参与程度也非常有限，尽管森林与她们的利益息息相关，而且她们拥有丰富的森林知识（Agarwal, 2000 年、2001 年）。例如，在尼泊尔国家一级，妇女仅占社区林业团体执行委员会成员的 24%（Ghimire-Bastakoti 等人，2006 年）。对个别森林用户团体进行的个案研究表明，在许多地区妇女所占比率甚至更小（Rao, 2006 年）。

²²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性别与食品保障：林业，网站简报》，可登录 <http://www.fao.org/gender/en/fore-e.htm> 查询。

203. 不过，妇女作为主要的森林用户越来越受到社会认可，她们的参与也得到鼓励。凡是重视治理结构、成员技能和资格、成员权限及代表所有用户利益的能力的地区，用户团体都能在加强妇女利用生产性资源方面发挥较好的作用。在印度的一些邦，一般机构的会员准则已经修改，会员可包括所有成年人；在印度和尼泊尔，执行委员会成立的指导方针正朝着更具性别包容性方向前进（Agarwal，2001年）。然而，在实际当中，这些指导方针往往得不到遵循。值得注意的是，实践证明，更多的妇女进入执行委员会，会大大改善森林养护成果，改善妇女获得木柴情况（Agarwal，即将出版）。

C. 基础设施、服务和技术改进

204. 在世界许多地区，妇女在运输上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特别是在农作物运输方面，而她们只能有限地利用原本可以减轻其负担的运输技术。妇女的运输负担加大了她们的长期贫困。在非洲，妇女用头顶运输，其平均负荷为每年头顶26公吨/千米，而男子头顶运输每年不到7公吨。据估计，在非洲，妇女占农村地区交通运输量的三分之二（Blackden和Bhanu，1999年），且头顶运输给妇女多加了20%的往返时间（世界银行/粮农组织/农发基金，2009年）。道路有限被认为与女性死亡率高和入学率低密切相关，女孩尤其如此（Roberts等人，2006年）。

205. 运输干预措施可以提高妇女的生产率和收入，有助于增强她们进入市场、接受教育、培训和信息，还会使她们有更多的时间休息和参与社区活动（Fernando和Porter，2002年）。例如，通过增加保健服务的获得，妇女可以体验到保健和福祉给她们带来的种种好处。尽管有这些潜在的收益，但两性平等仍然在许多运输政策和做法中处于边缘地位。运输基础设施的设计应当考虑到妇女的优先事项和需求，考虑到她们面临的挑战和制约因素。

206. 在改善公路网络的同时，应给予贫穷妇女低成本、固定、可靠的运输服务。在肯尼亚，在公共交通设施缺乏的地方，为了解决运输问题，一个妇女团体自己解决自己的运输问题，她们组织了一个合作社，贷款购买了一辆汽车，她们把这辆车当作一个营利企业来经营，给予合作社成员一定的优惠（世界银行/粮农组织/农发基金，2009年）。在印度，在1990年代初，泰米尔纳德邦开展了一场扫盲运动，期间人们将骑自行车的技术传授给妇女们，作为“赋予妇女经济权力的一种干预措施”（Rao，2002年）。参与这场运动的妇女主要来自贫穷和低种姓家庭，她们都从事长时间的有报酬和无报酬劳动。许多人购买了自行车或从亲属和邻居那里借来自行车开展一系列活动：从水箱和水井处拉水，把收获的稻子驮到磨坊以及收集燃料和饲料。

207. 农业推广服务包括咨询服务、信息和培训及获得生产投入，如种子和肥料，这种服务对于提高农业活动的生产率至关重要。尽管妇女在农业中发挥着关键作用，但是在许多地区，在农业推广服务方面，女农民基本上受到忽略（粮农组织，2008年）。例如，在越南，农业和发展部提供的数据表明，虽然妇女花费30%的劳动时间从事农业自营工作，而男子只为此花费了20%的时间，但妇女只占畜牧业培训方案参与者的25%，占作物种植培训参与者的10%（越南政府，2000年）。

208. 男性农业推广人员往往只将男农民作为培训目标，将重点放在他们所需的信息和投入上（世界银行/粮农组织/农发基金，2009年）。对尼日利亚农业推广服务所做的研究发现，得到女性推广人员支持的女农民更有可能获得推广服务、接受推荐的技术/方法，她们对女性推广人员提供的服务比对男性推广人员提供的服务更加满意（Lahai等人，2000年）。在加纳，社区挑选的女性推广工作人员在妇女团体与政府推广服务之间提供了一个有效的接口。尽管出现了这些积极影响，但全世界只有15%的农业推广人员由妇女担任（世界银行/粮农组织/农发基金，2009年）。这一数字在非洲更低，在这里妇女仅占农业推广人员的7%（Williams，2003年）。应努力使人们更容易获得农业推广服务，为此须采取措施增加女性推广官员的人数。

209. 在世界许多地区，妇女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来泵水、运输农作物和加工食品，这些任务本来可以通过应用现代技术更有效地完成，从而使妇女腾出时间参与其他生产和社会活动。例如，特意为妇女改造的农具和设备，如轻型犁或为妇女完成传统任务而专门设计的技术，如机械化谷物研磨，可以大大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减轻时间负担。雨水收集、水源保护和节能炉灶也可减少妇女取水和收集木柴或其他能源资源的时间负担。节水节能的好处也应延伸到妇女在农场之外的创收活动，如酿造啤酒，或制作熏鱼及销售（世界银行/粮农组织/农发基金，2009年）。

210. 目前，约有20亿人得不到电力照明和动力，30亿人依靠传统的生物量燃料做饭和满足取暖需要（世界银行/粮农组织/农发基金，2009年）。农村地区的电力供应，特别是针对妇女的关键用途，如谷物碾磨厂或水泵厂或诊所照明供应电力，还可减少妇女的工作负担，使她们有时间参与生产和家务活动以及参加社区活动。例如，在马里的农村地区，安装柴油发电机，为照明、农产品加工和抽水提供电力，使妇女能够节省时间，开发加工产品，使她们每天增加0.47美元的收入。研究证明，自从供电以后，农村妇女更有可能比农村男子创办自己的企业（世界银行/粮农组织/农发基金，2009年）。

211. 此外，技术进步还给健康和福利带来好处。在世界许多地区，使用传统燃料会造成一定的健康风险，因为贫穷妇女每天要花几个小时在室内生火做饭。在发

展中国家，有 160 万人死于室内炉火和炉灶产生的浓烟，其中大多数是妇女和 5 岁以下儿童（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2006 年）。

212. 但是，许多妇女在使用改进的技术方面面临一些障碍。这些制约因素包括：不适应当地的条件和需求、社会文化规范和惯例具有歧视性、缺乏足够的传播及成本高。例如，在苏丹，虽然妇女喜欢使用比柴灶更清洁、更快捷、更方便的液化石油气炉灶，但她们中有许多人仍然回过头来使用炭炉，尽管木炭成本更高。这是因为石油液化气只能盛在大容器中。由于现金流动问题，妇女没有钱购买大容器，不得不回过头每天购买少量的木炭使用（世界银行/粮农组织/农发基金，2009 年）。印度也遇到类似的问题。但在这种情况下，Spandana 作为一家专门为妇女提供服务的大型小额供资组织，与天然气灶生产商和天然气公司谈判，说服他们将价格减半，换取了大量的新客户。妇女得到贷款，使自己能够使用这项服务。在六个月内，有 70 000 名妇女签约使用这种炉灶，每天为她们节省了通常花在燃料收集上的三个小时的时间（Murr-ray，2008 年）。在设计节省劳动的技术时，同妇女们协商是十分重要的，重要的还有要为节省劳动的技术配备相关方案，包括培训，以提高新技术的可达性并使其得到充分利用。

213. 信息和通信技术是一种重要资源，能使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妇女广泛受益，可节约时间和劳动，促进信息的获取，并创造创收机会。例如，在许多国家，使用互联网和手机对农村地区的妇女产生了重大的影响，通过进入新市场和了解当前的农用物资和农作物市场价格，增加了经济机会。

214. 尽管实践证明信息和通信技术具有促进发展的潜力，但贫穷妇女获得这种技术仍是个问题，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的农村地区（提高妇女地位司，2005 年）。妇女使用现有的公共设施，如电信中心和网吧仍然受到多种因素的制约，如缺乏交通工具、网吧开放时间不方便、由于工作负担重没有时间以及环境不安全。妇女在可支配收入方面受到的约束也限制了妇女利用现有技术的机会。未以当地语言介绍相关内容是阻碍许多国家农村妇女充分受益于信息和通信技术的另一个障碍（同上）。

D. 住房、公用事业和服务

215. 《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第 11 条规定，人们有权获得相当的生活水准，包括足够的食物、衣着和住房，并能不断改进生活条件。在关于适当住房权的第 4 号一般性意见中，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委员会指出，人人都应当拥有一定程度的土地保有权，并受到法律保护，以免受强制驱逐、骚扰和其他威胁。适当住房权应被视为生活安全、安定和有尊严的权利。委员会指出，对许多因素都必须加以考虑，以确定每个人是否有足够的住房，包括保有权的法律保障；服务、材料、设备和基础设施的供应；负担能力；宜居程度；无障碍；位置和适当

的文化环境。委员会还指出，鉴于财产权（包括住房所有权）和获得财产或住所权方面的法律歧视和其他形式歧视的程度，当妇女无家可归时，她们特别容易受到伤害，包括遭受暴力和性虐待。

216. 在过去十年里，城市人口急剧增加，造成贫民区扩大。2005年，全世界共有9.98亿人住在贫民窟，如果目前的趋势继续下去，到2020年，贫民区居民将达到14亿（人居署，2006年）。在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地区，大约有9.34亿人生活在没有保有权的临时居所里。2001-2002年间，全球有超过670万人口——非洲400万人——被逐出家园，其中许多人生活在城市地区（Beall和Fox，2007年）。

217. 世界许多地方的住房仍然不足，缺乏饮用水、适当的排水和污水处理系统、适当的卫生设施、通风/散热设备、缺乏电力和基本社会服务（人居署，2003年）。大部分贫穷家庭居住的住房是临时的，而且往往是自己搭建的。据估计，生活在低收入、没有自来水的居住区的人在非洲10个城市中占66%，在亚洲14个城市中超过50%，而在拉丁美洲的8个城市中占33%（Hardoy等人，2001年）。

218. 住房对妇女来说是“一项重要的经济资产”，有助于妇女的独立、经济安全及其在家庭和社会中的话语权和谈判权（Miraftab，2001年）。没有适当的住房，就业就难以得到保障和维持，健康会受到威胁，教育会受到阻碍，暴力侵害妇女现象更容易永久化（人居署，2003年）。许多妇女因为家庭暴力而离家出走，她们很容易无家可归，并可能进一步遭受暴力侵害（E/CN.4/2005/43）。在城市地区，来自低收入家庭的妇女往往比男子更加集中在非正规部门的自营活动中，通常在家里或在家附近工作。她们比男子拥有更少的机会获得提升自己企业或扩展新业务所需的信息、信贷、工具和设备。获得安全而体面的住所，已成为数百万迁移到城市寻找工作或摆脱歧视和暴力的妇女的一个优先事项。不过，妇女平等地获得充足住房，仍是世界许多地区面临的一个挑战。

219. 虽然在世界许多地区可靠、可比的数据有限，但据估计，越来越多的住房紧张和无家可归者是妇女和儿童（人居署，2003年）。由于歧视性法律、政策、习俗和传统，妇女在获得和保有适当住房上遇到特殊制约因素（见E/CN.4/2006/118）。由于男女不平等，妇女在获得经济资源，如获得信贷和资金上也可能受到制约。某些妇女群体，如家庭暴力的受害人；寡妇、老人、离婚或分居妇女；女户主家庭；土著和部落妇女；残疾妇女；处于冲突中/冲突后局势的妇女；少数民族妇女，面临无家可归的风险更大。因拆除城市贫民区或开发项目而导致被驱逐，可能会给妇女加上过于沉重的负担。除了失去家园，她们还可能失去生计和支助系统，遭受身体和心理创伤。驱逐甚至可能导致妇女发病率和死亡率上升。

220. 在许多国家，立法改革规定人人平等获得住房，但传统的社会结构、重男轻女的态度、缺乏对住房和土地权的了解以及经济制约因素实实在在阻止了城乡妇女获得土地（见 E/CN.4/2003/55）。

221. 国家在促进公平获得适当住房方面可以发挥重要作用。可直接为城市穷人提供低成本住房，或促进和支持社区团体自建住房。例如，国家可以向房地产开发商提供税率奖励，让其建设经济适用住房单元，建立住房信托基金，通过赠款补贴低收入家庭房租，以及通过提供抵押贷款鼓励妇女和低收入家庭购置并拥有住房（非政府机构最佳做法中心，2002年）。虽然在许多国家占主导地位的做法侧重于个人财产权，但可以考虑广泛的合法选择，包括公私合租住房、合作建房、共同占有的权利、共享住房使用权以及各种形式的个人和集体租赁安排（人居署，2007年）。

222. 各国一直在城市地区推行类似于农村地区的土地保有权规范化行动。农村地区妇女在土地所有权归个人所有的过程中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对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八个国家 16 个低收入城市社区进行的研究发现，业主占有率从塞内加尔的 20%到斯里兰卡的 91%不等；但其中女性业主住户所占比率却相当少，从塞内加尔女性业主住户占家庭数量的 10%到哥斯达黎加的 76%不等（Miraftab, 2001年）。近期对一些拉美国家进行的家庭调查评估发现，妇女拥有自己住宅所有权的比率从厄瓜多尔的 21%到危地马拉的 73%不等（Deere 等人，2009年）。在赞比亚，在所转让的住房单元中，只有 12%的所有权为夫妻双方共同拥有（人居署，2007年 a）。但南非是一个重要的特例，人民住房进程允许许多女户主进行登记，因为一项资格标准是与其家属住在一起（同上）。

223. 许多国家通过的“地基服务”计划，为穷人提供小块土地和基本服务，在这些小块宅基地上，穷人可按照总体方针要求建造自己的房屋。贫民区改造的常见做法包括以下举措：通过转让合法的土地所有权改善现有的定居点、推出基本服务、康乐设施和基础设施。平民区改造往往要求社区参与项目开发，即使不参与规划和设计，至少也要参与项目实施（Chant 和 McIlwaine, 2009年）。让妇女参加“地基服务”计划的规划、设计和执行以及其他自助计划，将确保她们在应对适当的住房问题时发挥其特殊的作用并满足自身的需求。

224. 人们一直在努力确保妇女平等地受益于住房计划。倡议包括：促进共同拥有土地所有权；提供基础设施，如水、卫生设施和能源以减轻妇女的时间负担；鼓励妇女积极参与项目设计、实施和评估；以及确保男女都有机会接受项目管理及住房设计、建造和维修方面的培训。例如，2004年，由于妇女团体和住房运动提出的一项联合提案，巴西圣保罗市要求公共住房方案中纳入一些条款，即在合同受益人和市政基金资助的其他措施上给予妇女以优先权（人居署，2007年 a）。南非德班市谋求改善低收入家庭的用水情况，对其用水收取较低的费率——“生

命线费率”。这对那些低收入群体来说特别有益，这些人主要是妇女，她们在家劳动，要靠水开展工作，比如烹调外卖和洗衣服等（Chen 等人，2005 年）。

225. 在印度，妇女自主创业协会充分利用了以下这一事实，即相对于所有权而言，低收入家庭更容易获得居住权，它鼓励妇女将自己的名字登记在不同文件，如电费账单、期票和房产税/土地税文件上（Baruah，2007 年）。男子一般都不会反对这么做，此类文书为妇女提供了机会，万一她们离婚或分居，她们可向法院要求自己的居住权。

226. 除了住房和相关服务外，从事非正规贸易和服务的低收入男女需要进入公共场所，才能开展自己的业务。除了在一些社会中性别规范限制妇女外出之外，妇女占街头小贩总人数中大多数（劳工组织，2002 年 b）。在城市经济中，非正规活动的扩散经常与试图通过扩建商场、建造带“大门”的居住社区和写字楼而将城市空间私有化的做法直接冲突。这种扩建活动对那些经营小企业的人的生计会产生巨大影响。城市开发商应设计一套更公平的公共空间分配模式，对其发展采取更加合作的方式。

227. 现在已经出现许多网络，将不同的城市选区连接在一起，以最大限度地发挥其对公共政策的影响力。在许多城市，以社区为基础的组织已经超出了参与公共住房计划的范围，在设计和交付方面正在发挥更加积极的决策作用。在印度，马西拉-米兰联盟（妇女储蓄团体联合会）、全国贫民区居民联合会以及非政府组织，地区资源中心促进协会共同努力，制订了许多城市的城市住房政策，并确保把重点放在建设优质住房和提供基础服务，如供水、卫生设施、学校和保健服务；以及保障土地保有权上（Satterthwaite，2008 年）。在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类似的城市贫穷妇女和男子联合会已经出现，其会员规模从尼泊尔的几千人到泰国的 500 万人不等。这些联合会成功地影响到德班；印度孟买；金边和泰国一些城市（Satterwaite，2008 年）。妇女发挥了积极作用，并在许多联合会占居多数。

228. 街道网络创建于 2002 年，该网络采用会员制，将来自各个国家的街头商贩组织起来。该组织的章程规定，国际理事会成员及其任职人员至少有 50% 必须是妇女。到 2007 年，它在 25 个国家设立了 28 个分支机构，为非正规经济制订了集体讨论和谈判战略，制订了防御性和积极主动的诉讼战略，推动法律改革，以保护街头商贩的权利，并致力于为非正规经济中的工作人员推行社会保护战略（Lund，2008 年）。

五. 获得金融服务

229. 金融服务促进现金的跨时管理，以实现不同的目标：为未来消费或投资进行储蓄、购买意外保险，及为当前消费、投资或紧急情况提供贷款。在国际和国内

流动性不断加强的时代，金融服务也有利于现金的跨层级管理，可以使资金远距离快速转移。

230. 妇女获得各种金融服务，包括储蓄、保险、汇款转移和信贷服务，是必不可少的，以使她们能够充分受益于经济机会。有关妇女获得金融服务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小额供资上——针对低收入妇女客户的银行金融服务。

231. 本章重点阐述妇女在正规和非正规金融部门通过贷款和储蓄获得财政资源。妇女获得养老金和保险情况将在第六章讨论。本章记载了小额信贷组织的出现，作为应对正规金融机构各种限制的一种对策，这些组织随后演变为给予妇女优先权的小额供资机构。本章评估了小额供资的不同做法的优缺点，以及小额供资作为一项战略在使妇女获得和控制财政资源方面的局限性。对女企业家获得资金和妇女参与金融部门的决策也进行了探讨。本章还分析了金融服务商业化对赋予妇女经济权力的潜在影响。

A. 妇女获得正规金融服务

232. 正规金融服务是由公共和私营银行系统、保险公司、抵押贷款供应商和信贷公司提供的。这种服务广泛但不普遍，在发达国家可以获得。在欧洲联盟 15 个国家中约有 89% 的人、在美国约有 99% 的人都拥有银行账户或其同等账户（联合国，2006 年 b）。

233. 在发展中国家，正规金融服务极其有限，只有不到一半的人口拥有银行账户或其同等账户。在大多数非洲国家，该比率低于 5%，各国的比率从博茨瓦纳的 47% 到坦桑尼亚的 6% 不等（同上）。对肯尼亚和乌干达获得正规、半正规和非正规金融机构支持的调查发现，总体而言，只有 18% 的受访者获得过正规金融机构的支持（Johnson 和 Niño-Zarazúa，2009 年）。在肯尼亚仅有 8% 的人、乌干达仅有 3% 的人获得过半正规金融机构的支持，包括小额供资机构及储蓄和信贷合作社。获得正规金融机构的支持与政府就业、教育和性别政策密切相关。在上述两国中，两性不平等是妇女面临的一个障碍，不过乌干达的障碍更大一些。对孟加拉国和马拉维的研究发现，这两个国家的妇女比男子更可能受到信贷约束（Diagne 等人，2000 年）。

234. 金融服务覆盖面往往不利于穷人。正规金融服务提供商将少量的钱贷给大量的生计不稳定且季节性波动较大的散户，其成本总是大于收益的。即便政府赞助的方案和银行已设法弥补这种体制排斥缺陷，他们还是主要针对特定的优先部门，且通常将大部分穷人排除在外。

235. 有关贝宁、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墨西哥、菲律宾和乌干达国家一级的储蓄评估结果表明，尽管人们对正规储蓄机制需求高，但贫穷妇女和男子对正规金

融机构的使用率却较低。此项评估表明，信贷安全、距离远近和偿还能力等问题是造成正规服务使用率低的原因（Deshpande，2006年）。

236. 贫穷妇女和男子能够储蓄而且确实在储蓄，只是金额小且时间不固定。他们有必要将这种能力转化为他们为了各种目的不时需要的“大笔有用”的现金：在生命周期中与出生、结婚和死亡相关的开支；紧急情况；与健康相关的开销；购买耐用消费品以提高生活质量；以及投资于促进生计的新机会（Rutherford，2000年）。尤其是妇女，她们可能更加注重保护其储蓄不被贪得无厌的丈夫和纠缠不休的亲戚们花光借走，由于自营职业妇女比率较高，她们会寻找各种机会将资金投到其中小型企业的资本基础中。

237. 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由于对待风险的态度不同以及选择和制约因素不同，妇女和男子显示出不同的储蓄模式（Floro，2002年）。妇女进行储蓄对于其获得经济权力至关重要，因为如果她们的收入不稳，储蓄可以帮助她们维持原来的消费模式，她们还可以通过储蓄提供直接或间接的信贷担保或改善信用状况（见A/56/321和Corr.1），以进行融资投资。男女的储蓄模式差别对于储蓄动员和金融政策制订也有潜在的影响。对一些半工业化经济体进行的分析表明，1975至1995年间，妇女工资收入的增加导致储蓄总额增长速度提高（Seguino和Floro，2003年）。

238. 1970和1980年代所做的研究记载，妇女大规模被排除在正规金融部门之外，也被排除在政府提供的减贫信贷之外（Kabear和Hurthy，1996年；Berger，1989年）。妇女被排除在正规部门之外，反映了抵押担保要求和人们对向广大穷人，尤其是妇女提供贷款的风险认识，因为他们没有财产、回报率低，其生计不固定且不正规。妇女被排除在政府提供的信贷之外，说明这种方案被人口中较富裕的阶层夺得，他们获得这种信贷得到了政治庇护，而且这种方案偏向于男户主。

239. 妇女获得正规金融服务仍然有限。商业银行部门收取的利率较高，倾向于贷给信用好、久经考验的借款人，并将重点放在短期借贷上，这些因素导致向小农场和非农业企业贷款减少。穷人和农村地区的居民基本上无法得到机构贷款。在这种情况下，面向穷人的小额供资似乎提供了一种理想的解决方案，能够为穷人提供贷款（Johnson，1998年）。

B. 小额供资和两性平等

240. 小额供资服务之所以出现，是为了应对正规金融系统的疏忽和非正规金融机构的局限性。虽然小额供资由政府组织开创先河，通常得到捐助者和基金会的资金支持，但各国政府和商业银行越来越多地作为资金来源参与进来。小额供资

机构中的“小”字并非指其经营规模小——许多机构的业务已覆盖到全国和国外——而是指其服务交换的现金金额小。

1. 一个极其多样化的部门

241. 虽然有人倾向于将“小额供资部门”当作国内同质机构，但他们在服务提供上有许多不同的模式。将两个截然不同的理想模式进行对照，便可找到他们的主要差别（Robinson, 2001年）。“向穷人贷款”的特点是，以捐助者补贴贷款形式向穷人提供贷款，包括给最贫穷者提供贷款，这种方式通常与各种其他的支助服务连接在一起。从长远来看，这种办法不可能是在财政上可持续的贷款办法，因为由于未来的不确定性，不能长期依赖于捐助资金。而“金融系统”的做法强调财政上的可持续性，针对“银行愿意支持的穷人”提供最低限度的商业化一揽子金融服务。它避开补贴，强调成本回收，并力求促进中小型企业发展。非常贫穷的人被视为“银行不愿意支持的人”，他们可通过带补贴的就业机会或社会援助得到更好的服务。

242. 实际上，不管定位如何，大多数小额供资提供者认识到，需要更高的效率和财务持续承受能力。补贴是用来降低服务提供成本的，而不是降低利率。设定的利率通常高于正规银行部门的利率，但低于非正规供资者，如个人放贷者收取的利率。²³ 这些办法的主要区别在于，财务持续承受能力是否构成唯一的或者是主要的标准，依此来对小额供资方案进行评估。如果小额供资组织要像其他福利补贴方案那样有效地或者更有效地实现社会价值目标，包括减贫和赋予妇女权力，对其业绩进行评估就不得不采用财务持续承受能力和发展影响这个“双重底线”标准（Copestake等人，2005年）。

243. 小额供资组织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它们一直向妇女提供贷款。2007年，这种组织拥有客户1.548亿人，其中1.066亿人在得到第一笔贷款时是最穷的时候。而妇女占后者的83.4%（Daley-Harris, 2009年）。因此，小额供资部分上有助于弥补获得正规金融服务方面明显的性别偏向。妇女比男子还贷率高，为这种性别偏见提供了一种理性思考（De Aghion和Morduch, 2004年）。然而，从纯粹的工具角度来看，并非所有的小额供资组织都优先考虑向妇女提供贷款。许多小额供资组织也有一套更广泛的发展理由。对一些人来说，这是一种纠正获得资金方面两性差距的办法。对于其他人来说，这是一项宏伟战略中的一个要素，是实现其他有价值的两性平等目标的一种手段。

²³ 例如，格拉明银行贷款只按约30%的实际年利率收取利息，相比之下，个人放贷者收取100%以上的年利率。名义银行利率一般为约12%，但实际利率可能高达65%，这取决于去银行办理手续所需的次数及办完手续所需的时间（De Aghion和Morduch, 2004年；Ahmed, 2004年）。

244. 在实际当中，小额供资部门的特点是连续统一。这些组织集中在“金融系统”的另一端，他们认为将穷人排斥在金融服务之外，是一种市场失效，反映出信息不完善和合同执行方面的问题。例如，印度尼西亚人民银行就以适中的利率向个人提供贷款，该利率即有利于全部收回成本，又有助于获得利润。它根据不同的特点，在当地征聘贷款中介机构，以克服信息不对称的相关问题。它还出台奖励制度，促进员工争创佳绩和及时还贷。不过，这些借款人中只有 18%是女性（Khawari，2004 年）。

245. 在该系统的另一端是那些更接近于社会运动的组织。青年和社会发展中心在印度最穷的邦，同当地一些最贫穷、处于社会最边缘的妇女，主要是部族妇女一道工作，以巩固她们的生计，增强其群体凝聚力，培养公民参与、参与社区资源管理和民主治理所需的技能（Dash，2003 年）。玻利维亚多民族国职业妇女组织认为，建立女企业家的互助团体，只是个人和集体发展过程中的一个起点，在这里，面向集体组织的技术技能和能力培养是重要的里程碑（Velasco 和 Marconi，2004 年）。

246. 其他机构存在于这个连续统一体的某个地方，都与金融服务有关，但采用不同的战略。多数机构在提供服务时采用基于团体的办法，只是在一些基本原则上有差异。孟加拉国格拉明银行在提供服务时通常采用连带责任办法。它给由 5 名妇女组成的小组成员个人提供贷款，条件是所有成员同意相互为彼此的贷款做担保。贷款按小等份分期偿还，小组成员每周开一次会。一旦小组成员还完贷款，他们可以再次贷款（Fisher 和 Sriram，2002 年）。例如，在印度，自营职业妇女协会将银行提供的服务与自营职业的贫穷妇女合作社结合起来，促进其经济、社会和政治利益（Dasgupta，2002 年）。

247. 印度南部的迈索尔重新安置和开发署自创了自助小组办法，这种办法以储蓄为主导。自助小组由 15-20 名社会经济背景几乎相同的妇女组成，每周或每两周或每个月开一次会；小组成员同意定期储蓄指定金额的资金；将其捐献给某个共同资金库。小组成员需在共同商定的原则基础上，从这个基金里借款。一旦他们熟悉资金管理原则，他们就通过小额供资组织与政府扶贫贷款计划联系起来。这种自助小组模式的效力已导致政府采纳，政府通过连接方案，将这些自助小组与商业、区域或合作社银行的地方分行连接起来。目前，不仅是非政府组织成立了自助小组，政府开发机构，甚至银行分行工作人员也成立了自助小组（Fisher 和 Sriram，2002 年）。

248. 一些组织将团体贷款和个人贷款结合起来使用。虽然团体贷款对那些刚刚开始创业的人有用，但它对更成功的企业家来说可能是个制约因素。印度的BaSIX采用联合负债小组方式给个人贷款，尤其是给无地家庭的男女贷款，帮助他们自营职业，同时，还向农民和非农业生产者，主要是男性提供大额的无抵押个人贷

款，这些人很可能为穷人创造了工资就业机会（同上）。后者以前一般都是自助小组或联合负债小组的成员，有两到三次按要求还贷的记录。每次他们按时还款，接着会得到更高的贷款。借款人的个人信用记录就是担保，不需要团体担保。在孟加拉国，孟加拉国农村进步委员会还将联合负债小组面向贫困线以下的人的贷款与面向弱勢的非贫困人口个人贷款两种方式结合起来。²⁴ 俄罗斯联邦和东欧国家的方案也表明，两种信贷方式结合在一起能够取得成功（De Aghion和Morduch，2000年）。

249. 小额供资组织提供服务的方式有所不同。有些主要集中在提供信贷上，而且有强制储蓄要求，仅将此作为获得贷款的资格标准。格拉明银行最初采用这种方法，但后来做了修改，采用更灵活的办法进行储蓄，免除团体担保要求（不过团体依然要定期开会）。该银行还提供多种贷款产品，包括住房贷款（Yunus，2002年）。低收入妇女需要灵活而便捷的储蓄方式。安全储蓄银行是一个在孟加拉国达卡贫民区开展业务的合作社，它每日派人登门拜访，帮助人们存款、取款、付款和还款，这对妇女们来说尤其重要，因为她们在公共场所的活动受到限制（Schreiner，2000年）。

250. 采用自助小组方式的组织本身不直接提供金融服务，而是使小组能够积累自己的资金，学习金融管理技能，之后使这些自助小组与政府贷款设施建立联系。虽然有些小额供资组织仅限于提供金融服务，但有时他们也提供整套的业务技能，以促进创业精神，其他时候还将金融服务与各种社会服务结合起来。与其他服务挂钩的理由在于，同小组借贷方法联系在一起，能产生增效作用。妇女团体定期在同一时间和同一地点开会，为推广和宣传健康、营养和其他社会服务提供了机会。对于减贫而言，单一的干预措施可能不如同时提供信贷、初级保健、教育和其他服务那么有效。

251. 例如，菲律宾农业和农村发展中心把连带责任借贷方式与促进教育相结合（Copestake 等人，2005年）。孟加拉国农村进步委员会将连带责任信贷方式与广泛的服务相结合，包括保健、法律援助和小学教育以及社会问题培训和法律教育（同上）。在印度，发展行动专业援助计划将成立自助小组与支援小组成员的生计活动相结合，包括推广改良的农业做法和加强同市场的联系（同上）。秘鲁援助妇女组织实施综合信贷和微型企业培训方案。它也就赋予妇女经济权力、提供保健和计划生育培训，可能的话，让成员提供保健服务（同上）。

²⁴ 见 www.brac.net。

2. 小额供资的影响：共识和争论

252. 小额供资的影响评估产生了各种各样的结论，有些结论比其他结论赢得更广泛的共识。其中，对小额供资现有研究进行的一项最全面审查指出，在有些领域有关影响的共识是强有力的，在有些领域只有少量共识或者根本没有共识（Morduch 和 Haley, 2001 年）。取得了普遍共识的一项结论是，尽管它们公开的使命是向穷人提供金融服务，但有很大一部分小额供资组织忽视了赤贫者：10%至 50%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底层人口。这是因为人们越来越追求财务持续承受能力目标，寻求给穷人提供创收贷款的机构，也在追求其自身的财务维持能力，因此将形成一种把注意力只集中在“上层”和“中层”穷人的倾向（Hulme 和 Mosley, 1996 年）。

253. 不过，审查找到了大量的证据（Morduch 和 Haley, 2001 年），证明小额供资对收入产生了积极影响，包括减少收入波动。总之，小额供资的客户倾向于在减轻可能的风险情况下使用其贷款，而不是事后才处理危机影响。

254. 然而，也有证据表明小额供资对于增加收入的作用有限。虽然许多小额供资组织解决了妇女获得金融服务的制约因素，但在许多情况下仍未能解决与性别有关的制约因素，这些因素将女企业家局限在狭窄的、盈利较低的贸易和商业领域。例如，埃及的一项信贷方案研究采访了同等数量的男女客户，结果发现，在客户报告的 96 家不同企业中，妇女参与的企业仅占 28 家。另一项信贷方案研究发现，在 43 项信贷活动中，仅有 14 项有妇女参加（Sebstadt 和 Cohen, 2000 年）。

255. 在马拉维，由于市场的性别隔离、与中间机构不平等的垂直连接以及妇女面临体制歧视等综合因素，妇女的收入潜力受到严重制约（Johnson, 2005 年）。城市市场不仅按产品进行性别分割，而且按性别进行空间隔离，这使得妇女更难不遭白眼地进入传统上的男性部门。妇女往往被排除在利润较高的经济作物种植、屠宰业及制成品和技术产品销售的行业之外。其市场往往被较富裕的中间商所控制，这些中间商能得到运输工具和资本，因而能在城市中心进行批发销售。此外，其产品容易腐烂也给她们带来制约。除了许多小商贩面临的制约因素以外，女商人还容易受到各种形式的性骚扰（同上）。

256. 有关小额供资对健康、营养状况和小学入学率的影响的研究较少，但这方面现有的证据在很大程度上是确凿的、具有正面意义。一些研究表明，由妇女而不是男子引导小额供资，更有可能对儿童的福利产生积极影响，包括在学校教育中减少性别差距（Khandker, 1999 年；Holvoet, 2004 年）。

257. 还有一个有力的证据证明，小额供资组织在推广新技术方面能发挥重要作用，这些新技术能解决妇女的生育负担。第四章介绍了印度 Spandana 的有关情况。新技术可以促进新的生产机会。孟加拉国格拉明银行的乡村电话方案允许有

良好还贷记录的成员在一项租赁融资方案下购买移动电话，并允许在乡村一级销售电话拨打服务。这等于转让了一种新的营生和一种新的商业技能。事实证明，这给运营商带来了高额利润（Richardson 等人，2000 年）。此外，如果运营商是女性（约占总数的 75%），82% 的客户也是女性。如果运营商为男性，妇女只占其用户的 6.3%。女性电话运营商通常比一般村民更穷，但她们挣到的收入是很重要的，通常能占家庭收入的 30% 到 40%。自 2006 年以来，格拉明基金会一直在乌干达、卢旺达、喀麦隆和菲律宾推广类似的乡村电话业务。

258. 然而，对一些文献的审查表明，人们对于获得小额供资在多大程度上赋予妇女经济权力相当缺乏共识（Kabeer，2008 年 a）。研究发现，一方面，获得小额供资增强了妇女的决策权，增加了她们持有的资产，导致家庭暴力减少，使她们能将自己和丈夫从放债人的魔爪中及从降低人格的工资劳动形式中解脱出来，使子女在接受教育方面性别差距缩小，更加受到丈夫和其他家庭成员的尊重，并且通过其在团体中的成员资格，为妇女建立新的社会网络提供了机会。其他研究还发现，妇女贷款若由丈夫分配，向妇女提供贷款可能会增加家庭暴力和夫妻关系紧张，会增加她们的负债和工作量，导致商品市场中女性部分饱和，减少男子对家庭预算的贡献，并使男子处于边缘地位。

259. 这些相互矛盾的结果部分反映了计量赋予妇女经济权力时应用了不同的研究方法和指标。它们也可能反映不同小额供资组织的组织战略差异及其产生的重要影响。

260. 很少有研究探讨小额供资对妇女参与更广大的政治领域所产生的影响。南亚的最有力证据表明产生不同影响的战略的重要性（Copestake 等人，2005 年）。例如，SHARE，印度的一个要求最低的小额供资方案，在印度更具发展活力的几个邦里开展工作。该方案提高了供应商与客户之间的客户商业关系质量，但对更广泛的社区参政影响甚微。另一方面，在印度最穷的邦开展工作的青年和社会发展中心报告，其会员的政治积极性较高，比如参与投票选举、与政府官员互动、出席乡村委员会会议、参与集体行动以为子女向学校提出要求以及抗议男性酗酒。许多成员表示渴望参加地方竞选。这两个机构都采用基于团体的办法。两个机构的研究结果差异表明，仅靠小组成员制并不能说明公民参与的差异，而采用的巩固小组团结的战略才是最重要的。

261. 人们可以采取的措施，通过参与性市场调研、金融知识扫盲课程、促进产权和参政，提高小额供资方案在赋予妇女经济权力方面的效力（Mayoux，2009 年 a）。在乌干达，Green Home 和 Bukonzo 联合储蓄计划——一种将市场调研和金融知识扫盲相结合的办法——采用了性别行动学习制度，以增强该方案的影响力。妇女和男子利用参与流程和图表，识别其个人和集体计划的变化，并在一段时间里通过学习过程追踪这些计划，与其他人交流信息以扩大影响力（同上）。在加纳，

为了加强妇女参与灌溉土地，土地保护和小农户重建项目——一个由国际农业发展基金发起的以贫穷人口为目标的小组借贷项目——将与土地所有者、传统酋长、丈夫和男领导成功谈判等内容纳入其中（同上）。

3. 金融服务的商业化

262. 提供小额供资符合经济自由化的一些基本原则：重视穷人的创业精神，强调成本回收和财务持续承受能力，并通过国家范围之外的代理提供服务（Johnson, 1998 年）。不过，面向穷人的小额供资借贷所涉及的主要补贴元素，不符合新自由主义原则。因此，为了获得财务持续承受能力，近年来，小额供资组织一直承受着巨大的压力。捐助者援助流下降进一步加剧了这一压力，许多非政府小额供资组织被迫将自己转变为受管制的商业实体，以实现产品多样化，特别是动员存款，²⁵ 并开拓商业性供资来源。

263. 调动全世界广大穷人的储蓄潜力已经引起国际投资者的注意。受持续增长前景和盈利机会的吸引，约 225 家商业银行和其他正规机构进入小额供资领域（Isern 和 Porteous, 2005 年）。这些银行在投资技术创新方面处于优势，他们将提供密度更高的金融服务覆盖面。新的信息技术有可能大规模扩大其覆盖面，减少风险，降低服务提供成本（Helms, 2006 年）。智能卡、指纹阅读器和个人数字助理正在为玻利维亚多民族国、印度、墨西哥和南非的小额供资组织所使用。

264. 世界银行的一份报告指出，尽管贫困家庭和小企业家能受益于直接获得金融服务，但他们更能受益于强大的金融部门的“涓滴效应”（世界银行，2008 年 c）。贫困家庭可以受益于经济效率全面提高所带来的更多更好的工作，因为经济效率全面提高促进了经济增长和就业。即使金融部门主要服务于大型企业，小型企业也能看到其扩展机会。因此，金融部门的扶贫政策要求对穷人给予更广泛的关注，而不仅是为穷人提供金融服务：这就是改善被排除在外的非贫困微型和小型企业家获得供资，会给穷人带来非常有利的影 响（世界银行，2008 年 c）。这为人们放弃过去侧重于直接向穷人提供服务转向为“所有人”提供包容性金融服务提供了一个强有力的理由（联合国，2006 年 b；Helms, 2006 年）。

265. 鉴于发展中国家的许多人被排除在金融服务联络之外，重视包容性金融服务非常合乎逻辑要求。重视包容有助于金融服务范围扩大，将更大部分“未获得金融服务”的人纳入进来：包括中小型企业、妇女和男子。这也意味着金融服务并不局限于企业家。要求金融机构提供不同的金融产品：如贷款买房，支付学费或医疗费。需求不仅限于信贷。养老金领取人需要一套可靠的制度来接受其资金转移，工人要领取其薪金支票；其他人需要一个安全的地方储蓄。移民妇女和男子

²⁵ 虽然有许多小额供资组织强制要求客户储蓄作为其贷款方案的一部分，但他们没有合法权力去动员自愿存款。

需要可靠的低成本机制办理汇款转移。而汇款的女移民倾向于每次给家里少量汇款，却经常定期地汇款，因此，她们要花很多转账费。女移民进一步获得正规、可靠和负担得起的资金转移机制，将加大其汇款对其家庭生活福祉的影响力（提高妇女地位研训所和国际移民组织，2007年）。另外，人们还对保险服务感兴趣（第六章）。

266. 现在似乎有两种相互矛盾的趋势主导着目前关于金融服务使穷人受益的辩论。一方面，提倡一个“包容性金融系统”的观点强调，需要有一个更加一体的金融系统，以深化和拓宽金融覆盖面，但要维护机构做法多样性的原则，以解决穷人的非均质性。这种做法会让小额供资服务以一种连续统一的模式前进，并针对不同的市场部分。另一方面，人们越来越注重财务持续承受能力和加强商业部门的参与，似乎会进一步推动服务提供的同质化，以“金融系统模式”向前发展。

267. 从两性平等角度分析金融服务业商业化，提出了一系列不同的问题。小额供资组织一直成功地将贫穷妇女纳入的原因之一在于，他们采用创新的设计特点，专门解决妇女面临的针对其性别的制约因素。没有将这些制约因素考虑进来的组织一般不会成功地将妇女纳入进来。在发展中国家，团体信贷做法比个人借贷更能将妇女包容进来。

268. 对全世界 147 家小额供资组织的调查发现，妇女占个人借款人总数的 46%，占互助组——有小组担保——借款人总数的 73%，占“乡村银行”信贷的 89%。调查报告还指出，为个人借款者提供的贷款金额更高（个人借款平均额度为 973 美元，相比之下，团体贷款平均额度为 371 美元，乡村银行贷款平均额度为 136 美元），而且借款人个人的风险投资组合比率更高（分别为 3.7%、3.6% 和 3.5%）。²⁶

C. 女企业家获得金融服务

269. 有一种典型的业务案例确保妇女获得金融服务。在美国，妇女拥有的小型企业占注册小企业的 38%，在中国约占三分之一，在肯尼亚，妇女拥有的中型、小型和微型企业几乎占了一半，在乌干达占所有注册企业的 39%，妇女拥有的企业占亚太区域所有企业的三分之一（Narain, 2009 年）。

270. 妇女与男子一样都参与了广泛的创业活动。相对于男子而言，她们往往在更大的程度上集中在微型、小型和中型企业，因为它们缺乏担保、承担家庭责任、流动性受限，且融资技巧有限。妇女缺乏正规信用记录，“信誉担保”也限制了她们（Narain, 2009 年）。无性别区分的监管环境可能导致有性别差异的结果，

²⁶ 《微型银行简报》，小额供资信息交换中心（<http://www.mixmbb.org>）。

妇女可能比男子更难开创或管理企业，因为她们可能不如男子那样能够承受时间长且费用高的企业注册程序（Bardasi 等人，2007 年）。

271. 商业环境和企业绩效调查（2005 年）提供的 34 个国家，包括东欧和中亚 26 个前社会主义经济体的数据表明，妇女管理的公司比男子管理的公司获得贷款的概率低 5%，需要支付的利息却比后者平均高出 0.5 个百分点（Muravyev 等人，2009 年）。在一些金融部门先进的国家，女企业家更容易获得银行贷款，而且贷款所需的抵押规模较低（同上）。

272. 例如，研究发现，南非的女企业家在获得资金方面遇到重大障碍：该国的一家大银行的黑人经济权力平等基金在运营两年后，其女客户仅占 5%（Naidoo 和 Hilton，2006 年）。在乌干达，妇女只获得了提供的贷款的 9%，在农村地区该比率降至 1%（Ellis 等人，2006 年）。在孟加拉国，虽然经过二十多年的努力，证明妇女是“银行愿意支持的”，但她们在正规银行部门仍处于边缘地位。虽然妇女的存款占正规银行存款总额的 27%，但其在正规信贷中仅占 1.8%（Choudhury 和 Raihan，2000 年）。最新研究发现，妇女领导的小企业占正规银行机构的贷款不到 2%（Narain，2006 年）。在突尼斯，2006 年，47%的女企业主获得了银行信贷。约旦的比率为 34%，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32%，巴林 22%，黎巴嫩 17%。鉴于获得正规供资渠道受限，妇女的业务供资主要通过个人渠道，如储蓄、家人和朋友以及将其业务收益用于再投资（阿拉伯妇女训练和研究中心，2007 年）。

273. 对拉丁美洲、亚洲、中东和非洲 27 家小额供资组织 2002-2006 年间的数据进行的分析研究确认了一种可能性，即这种组织商业化会导致妇女获得信贷的比率下降（Franck，2008 年）。在本报告所述期间，许多这类组织已转型为受管制的商业实体。该研究报告发现，与仍然还是非政府组织的机构相比，这种转型增强了客户达到率，加快了贷款业务量的增长，增加了积极借款人和储户数量，增加了平均贷款规模。然而，尽管享受信贷服务的妇女人数随着客户基数的扩大而有所上升，但享受服务的妇女比率却有所下降。在“新的商业化机构”中，妇女借款人占 60%，比期初 88%的比率有所下降。另一方面，妇女从非政府组织信贷机构贷款的比率却由 72%增至 77%。根据向小额供资信息交换中心报告的所有金融机构的分析，相对于非政府组织而言，妇女占银行客户的比率小得多（同 2006 年的 79%相比，现在只占 46%），在新的商业化组织客户中，妇女所占比率也有所下降：从 1999 年的 73%降至 2006 年的 54%（同上）。

274. 研究结论强调，在整合金融服务的过程中必须保持多样性，还要解决妨碍女企业家扩展业务和获得金融服务的障碍。一些不利于妇女企业成长的因素包括：她们在生产活动与无报酬工作，包括照料工作之间如何分配时间；妇女往往将自己的盈余用于满足家庭消费和儿童的需求；她们被限制在过于拥挤的女性次级市场部门中；在有些地区她们倾向于投资多个企业，以便分散男性家庭成员的注意

力；还有文化规范和习俗削弱了妇女作为企业家的行为能力（同上）。对南非进行的研究认定了一个主要的制约因素，这就是，按照夫妻共有财产安排，已婚妇女需要丈夫签名和批准才能进行所有银行交易，而丈夫却不必这样做（同上）。有证据表明，即使没有法律规定，一些小型供资组织也要求在给妇女贷款时必须由其丈夫签字批准。

275. 妇女进入银行部门的其他障碍与该部门的做法有关（McCarter, 2006 年）。中东国际金融公司进行的一项调查发现，妇女的中小型企业往往在服务行业，由于没有机械等有形资产作为贷款评估根据，银行难以量化产出情况。此外，女企业家援引银行不“平易近人”为一个主要制约因素（同上）。

276. 金融机构已经主动采取了一些倡议，以增强女企业家获得金融工具的权利，如正规银行服务、债务融资和股权融资。作为一家国际银行，渣打银行推出了以妇女为重点的营销计划，定期为妇女提供金融服务，特别是一些国家中与银行正式打交道较少的妇女群体。2008 年 12 月，该银行在亚洲专门设立了一项 45 万美元的赋予妇女权力方案，以增强女性小企业主的金融知识、财务规划、投资和能力建设，计划到 2011 年覆盖的妇女人数达到 5 000 人（世界银行，2008 年 d）。美国 PNC 银行专门设立了妇女金融服务部，致力于为妇女拥有的企业服务，提供个性化核算、储蓄和贷款方案。该银行的业务还包括：评估扩大妇女拥有的企业的需求、为现有贷款再筹划资金，并最大限度地提高现金流。²⁷ SERO 租赁和金融有限公司是坦桑尼亚的一家妇女租赁和金融公司，专为妇女借款人——甚至包括那些没有信用记录和抵押担保的妇女——提供贷款，使其能够用得上资本设备或其企业所需的其他设备或产品（国际金融公司，2006 年）。

277. 还有一些国家一级的促进妇女创业倡议。在美国，全国妇女商业理事会——一个由两党成员组成的联邦咨询理事会——是为总统、国会和美国小企业管理局，专门就对妇女有重大影响的经济问题提出咨询意见和政策建议的独立机构。²⁸ 妇女企业所有权办公室对遍布美国的妇女企业中心网络进行监督。这些中心向女企业家，特别是经济和社会境况不利的妇女就广泛的主题提供多语种的全面培训和辅导，帮助她们开创和发展自己的企业。²⁹ 在法国，妇女企业创立、收购和发展担保基金为妇女提供中期贷款担保，为她们开办或重新开办的企业提供五年以下的周转资金或满足其投资需求。担保信贷金额为 5 000 欧元到 38 112 欧元，贷款期限为两至七年（欧洲联盟委员会，2008 年 b）。

²⁷ 见 www.pnc.com。

²⁸ 见 www.nwbc.gov。

²⁹ 见 <http://www.sba.gov/aboutsba/sbaprograms/onlinewbc/index.html>。

278. 在区域一级，欧洲促进妇女创业网络——其成员由各国负责促进妇女创业的政府代表组成——旨在提高现有女企业家的知名度，为增加女企业家人数、扩大妇女领导的现有企业规模创造有利环境。该网络为交流有关女企业家的国家政策信息及女企业家展开跨国访问和合作提供了一个平台（同上）。

279. “残疾妇女创业能力培训”是劳工组织的一个项目，向五个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残疾妇女开办或强化其微型企业提供支持。虽然该项目最初是一个独立项目，但在第二阶段（2005-2007年），此项战略有了修改，将残疾妇女纳入女企业家的主流机构，作为劳工组织另一个项目的组成部分。这种包容战略对所有参与者都产生了激发性影响，促进对残疾人认识的转变（劳工组织，2007年b）。

D. 妇女参与金融部门的决策

280. 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银行部门都没有妇女担任顶级管理职务的。在美国，妇女占金融服务业雇员总人数的75%，而在美国50家最大商业银行中，妇女仅占其管理职位的12.6%，其中只有一家银行的首席执行官由妇女担任，七家银行的财务主管由妇女担任。在100家最大的信用合作社中，只有八名女首席执行官（McCarter，2006年）。在美国风险投资决策者中，妇女只占8.6%（Brush等人，2004年）。

281. 2005年，公司女董事国际机构对私营部门的银行所做的研究发现，在全球50家最大银行的董事会中，妇女仅占董事会席位的10.3%。有些全球最大的银行甚至没有女董事。在妇女进入董事会任职方面，瑞典的北欧联合银行排名最高（妇女占36.4%），在其11位董事会成员中就有4名女董事（公司女董事国际机构，2007年）。

282. 在小额供资部门，两性平等问题还有很大的改进余地。2005年，妇女推广小额信贷国际机构对65个国家的198家金融机构所做的一项调查发现，尽管女客户占客户总数的约70%至90%，但妇女在金融机构中担任高级管理或经理职位的比率却各不相同，在多数金融机构，妇女占30%至40%（McCarter，2006年）。有必要在各级决策层建立一套更加公平的男女代表制。决策上更加平等有助于改善整体的财务业绩：对57个国家的226家小额供资组织所做的研究发现，凡是首席执行官由妇女担任的组织，其资产回报率更高（Merlsand和Strom，2008年）。

E. 增强妇女获得金融服务

283. 金融部门的改革和倡议需要应对妇女获得正规部门的供资和参与正规部门的决策时面临的制约因素。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已透彻地反映了放松对金融部门监管带来的发展成本。各国政府已参与进来，以挽救银行部门并对该部门的大部

分实行国有化。调控压力可能非常大。在形势不断变化的情况下，有必要对正规金融部门进行改革，以促进两性平等原则和做法，这与金融机构结构调整的更广泛改革是一致的，后者旨在使金融机构同发展优先事项密切接轨。应鼓励金融机构向重点部门提供低成本的金融资源以培育经济增长点，对新的创新投资所涉及的风险进行承保，并且满足非正规企业家的需求，其中多数是妇女。政府和金融机构有必要更好地了解妇女的储蓄和投资行为以及她们面临的制约因素，以便解决妇女获得金融资源受制约的问题，并能创立适当的金融机制以对所有妇女的需求做出反应。

284. 小额供资为大部分穷人提供了贷款，能够继续做出重要贡献。同时，要想更有系统地应对各种强化妇女被排除在金融资源以外的因素，小额供资部门本身有必要进行改革（Hussain, 2009年；Mayoux, 2009年b）。改革包括在组织愿景、任务和目标以及制订的组织政策中明确承诺两性平等和赋予妇女权力，只有这样才能将这种承诺转化为实践。将性别观点纳入小额供资网络制订的消费者保护准则的主流，注重隐私、道德伦理，尊重消费者和公平定价，都有助于在金融部门抵制对妇女潜在的忽视或虐待。这些措施特别包括：促进和支持不同的农村贷款提供者之间的合作；促进和支持对两性平等和赋予妇女权力的监督和研究，促进学习和能力建设网络，以及确保性别问题专家和妇女组织参与金融管理条例和消费者保护法的制订（Mayoux, 2009年a）。

六. 获得社会保护

285. 《世界概览》一直把调查重点放在提高妇女参与各种市场的能力以及可以改善妇女劳动回报的资源上，但是要提供生计保障，不能完全依赖市场。市场不仅未能产生足够数量和质量的就业机会，以满足世界上很大一部分劳动人口的基本需求，而且还增加了遭遇新型风险和不安安全的几率。

286. 在如何承受和应对风险、不安全因素和危机方面，男女之间存在着性别差异。在世界许多地方，由于产权不平等、生育造成工作时断时续、分担无报酬照料责任不平等、从事缺乏良好监管的工作以及报酬水平低，妇女们少有防备意外事件的能力。现在就知晓当前的全球金融和经济危机的结果虽然为时尚早，但有关前几次危机的研究突显了危机产生的有性别区分的影响（联合国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亚太经社会），2003年）。不论男女哪个人的工作受危机影响最大，妇女都会花更多的时间从事有报酬和无报酬工作，以抵消危机对家庭收入的影响。

287. 由于丢掉了工作，处境不利的妇女往往求助于受社会轻视或降低人格的创收手段，来作为最后的生计手段，如从事家庭服务、乞讨、甚至卖淫，这使得她们

面临新的风险（Atinc 和 Walton, 1998 年；Aslanbeigui 和 Summerfield, 2000 年）。如果吃饭都成问题，通常都是妇女减少自己的食品消费，以确保子女得到足够的营养。如果孩子们不得不辍学去工作，最先受到冲击的往往是女孩，她们要么在母亲在外从事更长时间有报酬工作时自己承担起无报酬的家务劳动，要么自己亲自去做有报酬的工作。

288. 社会保护制度通过保护公民免受侵害和剥夺来促进公民的福祉和安全（劳工组织，2003 年）。在许多国家，失业保险制度、普遍健康保险和社会养老金在促进两性平等、赋予妇女权力以及减缓贫穷、经济增长和发展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面向儿童的现金转移方案已显示出对改善儿童的健康、营养和教育具有积极成果。不需个人缴费的基本社会养老金有助于减轻老年男女之间在收入和生活质量上的不平等，并增加家庭的福祉。社会保护往往为边缘化群体提供他们初次与国家接触的机会，唤醒他们对自己的公民地位和权利的初步认识，从而增进社会凝聚力和包容性。人人获得基本社会保障，必将有助于实现所有千年发展目标。社会保护措施实验也为制订长期的社会保护战略和应对危机及其后果提供了重要的经验教训。

289. 本节以全球最低社会保护制度理念为基础，提出了所有国家都能够负担得起的一种普遍的社会保护办法，这些办法得到劳工组织的支持，该组织作为一个广泛框架，专门应对人们生活中面临的不同来源的不安全性和脆弱性。

A. 制订全球最低社会保护制度

290. 社会保障是一项人权。《世界人权宣言》第 22 条指出：“每个人，作为社会的一员，有权享受社会保障”。第 25 条进一步规定为“人人……在遭到失业、疾病、残废、守寡、衰老或在其他不能控制的情况下丧失谋生能力时，有权享受保障。”该宣言的根本信念是：人们为自己及那些依靠他们生活的人获得社会可接受的生活水平，不应仅由市场力量决定，或由分布不均的自给能力决定。然而，在《宣言》通过 60 年后，依然有近 80% 的世界人口得不到社会保障（劳工组织，2008 年 e）。

291. 虽然在经合组织国家普遍实行的福利制度在不同程度上慷慨地向其居民提供社会保障，但在发展中国家，法定的社会保障在很大程度上仅局限于那些有正规工作的人，许多国家的基本想法是，随着经济发展和劳动力市场逐步正规化，社保覆盖面会延伸到其余人口。

292. 随着市场放松监管和国家作用削减，许多国家提供的社会保障在缩水。在结构调整的早期阶段，设想的安全网的作用仅仅定义为调整期间的过渡成本。但是，金融危机频繁发生，引起了各国对采取更广泛的社会保护措施的关注。1997-1998

年的东亚金融危机突显了非正规保护措施的不足，以及需要采取预先的社会保护，以有效防止和减轻风险，而不仅仅是应对危机（亚太经社会，2003年）。这次危机开启了社会保护应具有全球社会保护特点的讨论之门。正如劳工组织所记载的，2004年的亚洲海啸以及最近发生的北美飓风也表明社会公共保障的重要性，这不仅包括便捷的保健，而且还包括当人们遭遇死亡、残疾或失业时社会保障制度下的现金转移，以应对这类大规模自然灾害所造成的严重后果（劳工组织，2009年e）。

293. 为了应对国家之间和国家内部的持续贫穷和日益严重的不平等，全球化所涉社会问题世界委员会发表的题为“公平的全球化：为所有人创造机会”的报告指出，作为全球经济的社会经济“底线”的一部分，为个人和家庭需要提供最低限度的社会保障，必须得到人们的认可而且应当是无可争议的（劳工组织，2004年b）。委员会认为，全球化的逻辑推动着各国竞相投入到一场福利底线竞赛中，以努力吸引国际流动资本。它呼吁实现以就业为中心的经济增长，以调集资源，为社会保护的长期发展提供财政支持，但它坚持认为，放松管制的全球经济不能保证稳定的收入或体面的工作条件（同上）。同样，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成员国在2006年经社理事会高级别会议上通过的《经社理事会部长级宣言》指出，各国必须制订政策，使其能够追求经济效率和社会保障两方面利益，发展覆盖面更广、更有效的社会保障制度。³⁰

294. 为了兑现千年发展目标的承诺，在关于社会保障和人人享有保护全球运动中，劳工组织推动建立一个基于以下基本社会经济保障的全球最低社会保护制度：

（a）通过加强家庭/儿童福利，保障面向所有儿童的收入安全，以便促进各类基本服务，如教育、保健和住房的获得；

（b）保障具有经济活力年龄组的穷人和失业者获得的经过经济情况调查的/自动瞄准的基本社会援助；

（c）通过基本养老金保障老年人和残疾人的收入安全；以及

（d）通过一系列相关措施（由税收及社会、私人和社区保险资助）保证获得基本保健福利。

295. 反对任何形式的普遍化主要论点之一，尽管不太严重，但涉及到负担能力问题。全球化所涉社会问题世界委员会建议，可以制订一套全球最低社保标准，使其起到推进作用，从而有利于其自身的长期发展。委员会进一步建议，最初提供

³⁰ 2006年经社理事会高级别会议的《部长级宣言》，第19段。

的保障可以是适度的保障标准，至少确保生活水平达到“贫困线”以上，之后随着人均国内总产值的不断增长和抚养比率下降而逐步提高保障水平。劳工组织的研究表明，几乎所有国家都负担得起基本的社会保障。一揽子基本福利的成本估算表明，可能占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国内总产值的 2%至 5%之间，如果把健康支助也算进来，可能介于 4%至 10%之间（劳工组织，2008 年 e）。建立一个稳固的、哪怕是适度的社会保护基础是可以负担得起的，而且可以根据经济发展水平，逐步增强社保（劳工组织，2009 年 e）。

296. 原则上，虽然承诺各种保护与就业状况或经济地位不挂钩对男女都有利，但很可能不太有利于妇女。参加社会保险制度通常取决于定期缴费的能力，这使许多妇女处于劣势，因为她们就业时断时续，而且她们更多地从事临时工作（社发所，2005 年）。正如第三章所述，大部分妇女的经济贡献要么是无偿的，要么回报过低。提供最低福利保障的社会保障计划同那些应享待遇可能非常低或从事从来没有报酬的工作的妇女息息相关。

297. 最低社会保障制度的这四个要素本身就会根据妇女在人生不同阶段的特需求和利益制订社会保护战略：童年时期、具有生产活力和生育能力阶段以及老年时期。在何种程度上实现这一可能，取决于在有关方案的设计和实施过程中对两性平等的明确关注程度。

B. 儿童的收入安全

298. 儿童的社会保护权利已被列入 1989 年《儿童权利公约》。收入匮乏在许多领域对儿童产生了负面影响，包括保健、营养、上学、教育成就以及在以后的人生阶段中在劳动力市场上的表现。研究表明，贫穷家庭长大的儿童更容易遭受失业、低工资和成年后健康状况不佳之苦（Vlemminckx 和 Smeeding, 2001 年）。儿童的收入安全维护了他们在幼年期间还需要他人照顾时的福利。促进儿童收入安全的政策采取的形式一般为：现金或实物补贴、税额抵免、或免费提供或提供带补贴的基本商品和服务。

299. 补贴对象可以明确针对妇女或男子，或者更笼统地针对照料者。比如说，有些国家的家庭津贴包括子女教育补贴，是与工资一起直接发给男子的，因为他们要承担家庭的所有开支（Bibars, 2002 年）。在大多数国家，这些政策以母亲为目标对象，前提是她们主要负责儿童的抚养。南非的儿童抚养补助金是发展中国家少有的几个儿童津贴方案之一，但它针对的是儿童的“主要照料者”，而不是亲生母亲，一个重要限定条件就是，在艾滋病毒/艾滋病高发区，许多儿童由祖父母和其他亲属照看，或者是自己照顾自己。而在实际当中，主要还是母亲们申请了补助金（案例等，2003 年）。

300. 关于妇女是主要的照料者、妇女主要负责家务劳动的设想，可以转化为一些政策，这类政策要么支持、要么破坏她们在家庭以外的就业能力。例如，在东欧，社会主义时代的家庭福利制度旨在帮助母亲们把有报酬工作与生育责任结合起来，以支持妇女的高就业率(Steinhilber, 2006 年)，这些计划从范围上讲一般都具有普遍性，包括产假、公费资助的托儿服务和儿童津贴。父亲常常被明确排除在这些计划之外。随着经济转型、福利制度的重大改组，导致对发放福利金要经过经济情况调查而且家庭福利总开支有所减少。在捷克共和国，为确保妇女集中精力照顾子女，领取育儿津贴的妇女在劳动力市场上受到限制(同上)。

301. 有条件的现金转移方案已成为一个重要的经济和社会政策工具(Heinrich, 2007 年)。这类方案的目的是向贫穷家庭提供短期援助，同时通过儿童保健和教育方面条件与责任挂钩来促进对长期人力资本开发的投资。在拉丁美洲地区，许多国家都执行了这种方案，最著名的两个方案是：墨西哥的进步方案(后更名为“机会方案”)、巴西的家庭补助方案，这个世界上最大的有条件的现金转移方案使 1 100 多万个家庭受益。

302. 现金福利往往提供给母亲。虽然直接提供给妇女的现金转移已被确定为对家庭福利具有积极影响，但有人对制订有条件的现金转移方案会强化原有的性别分工表示关切。例如，期望母亲们在遵守参与该方案的所有附加条件方面承担全部责任，而不考虑对其时间的其他要求(Molyneux, 2007 年)。例如，为了满足墨西哥进步方案/工作机会方案的条件，期待妇女为学校 and 诊所的开办参加义务劳动，而不只是承担送子女上学、定期光顾诊所及参加培训 and 会议的责任。这些条件可能给她们带来极其沉重的负担，特别是如果妇女还要参与经济活动，结果是一些有职业的母亲被排除在外，而其他人为为了满足这些条件只能放弃经济活动(Latapi 和 González de la Rocha, 2009 年)。

303. 研究还突显了作为方案内容一部分而提供的培训方式，这种培训重点关注教育和保健，强化了性别陈规定型观念。妇女本身表示偏爱这种可以增强其就业前景的培训，更喜爱参加与照顾子女需求不冲突的培训活动。男性教育方案中的优先事项涉及男子在家中的行为，包括关注家庭暴力和需要向男子传授保健和计划生育知识(Adato 和 Mindek, 2000 年)。

304. 妇女普遍赞赏这些方案，积极评价这些方案对其子女的积极影响，珍视提供给她们自己掌控的可预测的固定现金津贴(Latapi 和 González de la Rocha, 2009 年)。最近对机会方案进行的评估表明，尽管大多数儿童所受教育程度比其父母高，但这种代际改善在受益家庭儿童身上体现得最明显。评估还表明，年轻人，特别是年轻妇女，一旦完成了该方案，找到的工作比父母的工作职业等级高(González de la Rocha, 2009 年)。对于生活在社会边缘境地的巴西妇女而言，

家庭补助方案为他们提供了与国家初次接触的机会，增强了其对自身的公民身份的意识（Suarez 等人，2006 年）。

305. 评估显示，现金转移方案有益于实现目标（Rawlings, 2004 年；Barrientos 和 DeJong, 2006 年）。它们促进了儿童的营养、保健和学校教育，减少了童工现象。例如，据估计，墨西哥的进步方案/工作机会方案降低了 36% 的贫穷深度，减轻了参与家庭的儿童发育不良问题，降低了成人和儿童的发病率，提高了儿童入学率，尤其是女孩及其在中学阶段的入学率（Barrientos 和 DeJong, 2006 年）。

C. 对具有经济活力年龄组中的穷人和失业者的社会援助

306. 失业者的收入安全仍然是处在不同发展阶段国家的一个重大挑战。大多数领取福利金的失业工人都集中在工业化国家。一般来说，发展中国家的失业保险计划覆盖面有限（劳工组织，2001 年）。大多数低收入工人未被纳入正规社会保险制度之内，其中包括绝大多数女工，对于那些在农村或城市非正规部门工作的人来说，几乎没有什么失业保护。对于劳动适龄人口中找不到工作或失业的弱势群体提供收入安全保障，是全面的最低基本社会保障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劳工组织，2008 年 e）。

307. 不同国家制订了不同的战略，以扩大对那些没有被纳入现有计划的人的社会保障的覆盖。这些战略包括：逐步扩大社会保险计划、为非正规工人制订特殊安排、制订与现金转移相结合的方案、获得教育和保健以及就业保障计划（劳工组织，2007 年 b）。

308. 公共工程方案已广泛用于支持处于逆境的家庭。在某些情况下，如在阿根廷，这种方案是在金融危机爆发后出台的（Tabbush, 2009 年）。在其他情况下，可以执行长期方案，以应对农业劳动力需求的季节性波动，如在印度和孟加拉国（Kabear, 2002 年），或应对大范围的失业，如在南非（McCord, 2004 年）。

309. 从两性平等角度评估公共工程方案，突显了各种问题：从妇女的参与能力到方案对其福祉和赋予权力的影响。与性别有关的限制，例如，流动性限制都可能影响妇女参与这些方案，并能确定哪些妇女群体参与其中（Kabeer, 2008 年 c）。

310. 方案设计既可强化也能抵消这些制约因素的影响。在两性高度隔离的社会，妇女专用方案可能是必要的。例如，在孟加拉国，国家的主要公共工程方案，“以工换粮”主要针对贫穷男子；而较小的、以现金支付工钱的农村扶养方案针对赤贫妇女，后者获得了广泛的好评（Postgate 等人，2003 年）。但是，2008 年，孟加拉国实施的旨在帮助赤贫者应对高涨的粮价的“百日就业计划”，尽管没有专门针对妇女的具体条件，妇女还是占到了参与者总数的 28%（Fiorillo 和 Matin, 2009 年）。

311. 印度最新颁布的全国就业保障计划，就是落实工作权利的方案实例。该方案的若干特征明确涉及妇女的参与问题，包括应当为妇女提供三分之一的就业机会、五名以上妇女参加同一方案时解决好其托儿所要求以及同工同酬问题。现有数据表明，许多妇女参加了该方案（人类发展研究所，2009年）。2008年，在20个国家中，妇女至少占参与者的30%，而国家平均水平是49%。在许多国家，妇女参与率高于其劳动力参与率。早期的一些积极研究结果显示，贫穷移民人数有所减少，家庭收入和营养状况得到改善。此外，由于许多国家的工资发放机制与开立邮局或银行账户挂钩，因此，该方案使各阶层民众有了第一次接触机构供资的机会。初步评估显示，有效的基层非政府组织存在及其动员穷人团体的能力一直是方案成功的主要因素。

312. 对公共工程方案的评估还表明，提供哪类工作可能是鼓励或抑制妇女参与的一个因素。对南非公共工程项目的研究发现，妇女在更大程度上参与了环境项目，而不是被视为“男性”工作领域的筑路项目（Adato和Haddad，2001年）。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后马上出台的公共工程方案中，妇女的参与率极低，这是因为与男性劳动力更密切的工作更受人们的偏爱：建筑、修理和基础设施改造，再后来就是耕种旧地、生产水泥砖以及三级灌溉渠道的标准化（亚太经社会，2003年）。例如，在大韩民国，由于提供的活动范围狭窄，加上参加资格仅限于“户主”，导致1998年只有23%的妇女参加了第一轮公共工程项目。之后，妇女团体的抗议导致了项目标准放宽和项目内容扩大，纳入了更广泛的活动内容，将公共服务工程和环境项目也包括进来。妇女担当低收入家庭儿童的课外老师、社会服务助理、大学图书馆和政府办公室的办公室助理。因此，妇女的参与率上升到50%以上（亚太经社会，2003年）。

313. 能否将公共工程方案扩大到包括照料工作和社会服务，引起了人们对此类方案潜力的关注，这类方案旨在应对某些潜在的制约因素，这些制约因素因妇女主要负责无报酬的家务劳动所致。通过公共工程方案，这些家庭照料工作由集体负责，使妇女能够更充分地参与公共生活和劳动力市场，并更充分挖掘女孩上学的潜力。这也可能促使人们更加愿意以更公平的方式分担照料工作（Antonopoulos，2007年）。有一个特好的案子，这就是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鉴于艾滋病毒/艾滋病在该地区大流行护理需求达到高峰，因此需要考虑出台“护理换现金”方案（Lund，2004年）。另一个支持将照料工作纳入方案以创造就业机会的论点就是，从本质上讲，妇女更多地参与劳动密集型项目而不是基础设施项目。通过方案试点，人们意识到照料工作具有重要的经济意义，涉及到照料者的成本，能够节省正规保健和福利预算，因此照料工作的价值应得到加强（Lund，2004年）。

D. 老年人和残疾人的收入支持

314. 残疾和年老通常与身体活动和盈利能力水平下降相关。这些变化不一定意味着贫穷和不安全感会加剧，家庭和社区网络、私人储蓄、私人或社会保险、养老金计划和各种资产形成了保护形式。在较贫穷、容易被孤立和健康状况不佳的群体中，老年人和残疾人，特别是妇女一贯人数过多，这表明充足的保护还没有到位。

315. 正如《马德里老龄问题国际行动计划》（2002年）所承认的，老年对于妇女而言是一个特别容易脆弱的时期，妇女寿命比男子长，老年期较长，往往成为寡妇，而且往往陷入贫穷。目前，年龄达到60岁和60岁以上的妇女比男子多了约7 000万人，其中80岁及80岁以上的妇女人数是男子的两倍（联合国，2007年）。许多妇女经历过多次分娩，获得的初级保健服务有限，承担着繁重的工作。由于财产权和继承权具有性别偏见，她们不太可能比男子拥有资产。在整个生命周期里，由于获得教育和就业机会有限，其累积效应始终使妇女处于不利环境，从事经济活动的报酬更有可能比不上男子，更有可能是断断续续的，储蓄的余地更小，被养老金计划所覆盖的可能性更小，而且缴费能力有限。

316. 《残疾人权利公约》第6条侧重于残疾妇女，要求缔约国采取一切适当措施，确保妇女充分发展，地位得到提高，能力得到增强，目的是保证妇女能行使和享有本公约所规定的人权和基本自由。在第28条中，缔约国确认残疾人有权获得社会保护，并有权在不受基于残疾的歧视的情况下享有这项权利。

317. 目前，残疾人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0%，即约6.5亿人，据估计，其中的80%生活在发展中国家，许多人生活拮据。据估算，世界上最贫穷的人——每天生活费不到一美元、得不到食品、清洁水、衣服和住所等基本必需品的人，五个人中就有一人是残疾人（见E/CN.5/2008/6）。无法获得良好营养、保健、卫生以及安定的生活和工作条件，会增加残疾的危险性。残疾人在教育、就业和公共服务方面阻力重重，这些服务本来可以帮助他们脱贫。歧视性做法在继续剥夺残疾人的工作机会。在许多国家对农村地区残疾妇女进行的研究发现，80%以上的残疾妇女没有独立谋生手段，而且是完全依赖他人。³¹

318. 正规的社会保障制度——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通常都提供养老金和残疾津贴，但在提供条件方面会有很大的不同（Mesa-Lago，2002年）。公共系统的特点是倾向于长期增长的不限金额的缴款；根据法定公式计划最高值和最低值来确定福利金；以及以现收现付原则为基础的财政制度。另一方面，私人计划的基础是以限定金额向个人储蓄账户中缴费，长期设定在一个固定水平上。所获

³¹ 联合国残疾问题特别报告员在2005年国际妇女节上的讲话。

福利金的价值取决于个人在这些账户中缴了多少费、养老基金的投资回报以及更广泛的宏观经济环境。计划也可由公共/私营部门共同管理。

319. 正规的养老金计划与就业状况挂钩，它们在何种程度上在广阔的市场上重现两性不平等，取决于养恤金领取资格与就业历史的联系有多密切。工作年限短或根本就没有过正规职业的老年妇女，可能不会得到现有的社会保障制度的保护（劳工组织，2007年）。养老金计划范围内的再分配措施，有助于抵消劳动力市场上的弊端（Steinhilber，2005年），与之相关的包括：老年人最低收入保障、固定费率规定和收入上限、最低缴费期限以及计算福利金规定。

320. 1980年代以来，一些公共社会保障制度完善的国家进行了养老金制度的重大改革，人口老龄化和对其造成的财政负担的关切成为改革的部分动机。养老金改革一般涉及三大支柱组成的系统：（a）公共管理的强制性现收现付制度；（b）完全由个人储蓄账户资助的强制性的私人管理支柱；和（c）为获得额外保护由个人储蓄账户资助的自愿支柱。大多数国家采用了这种制度的变式（Mesa-Lago，2002年）。

321. 妇女在新的私有化计划下是否比在过去的公共计划下过得更好，这个问题引发了一些争论。世界银行对智利、阿根廷和墨西哥的养老金改革所做的一项研究指出，由于缴费与福利金联系密切，妇女个人每月的退休金金额只有男子的30%到40%。但是，妇女可以通过最低养老金保障从有针对性的再分配中受益，有些人在家庭内部重新分配，因为男子必须拿出联合年金，其中的福利金计算是以受益人及其家属的年龄和性别为基础的。如果妇女获得的好处包括个人账户上的养老金和遗属养老金，已婚妇女的终身受益金额增至男子终身受益的70%至90%，而从事全职工作的已婚妇女终身受益金额增至100%（James等人，2003年）。

322. 根据对养老金制度私有化的评论，如果公共系统和私营系统都存在两性不平等现象，由于多种原因，私营部门的不平等程度会更高（Mesa-Lago，2002年）。公共系统中的福利金公式采用不分性别的预期寿命表，每月平等地给男女发放福利金。每月平等地发放福利金，再加上妇女的预期寿命更长，这意味着如果给限定金额的福利金缴费，妇女得到的好处多于男子。另一方面，私营系统采用有性别区分的死亡率表来计算年金和预定提款额。个人账户中累积的养老金除以平均预期寿命，这样妇女的退休金低于男子，如果她们提前退休的话，情况更是如此。

323. 在欧洲转型经济体中，改革导致两性不平等增大。新的制度规定从业时间长和退休晚的人将受到奖励，不要求设立联合年金，遗属养老金被削弱了，公共支柱并不需要特别再分配。例如，在波兰的养老金制度里，养老金的固定组成部分被取消了，因此要依赖反映参保人的工资和工作年限的变量，这意味着妇女的养老金已从男子养老金的80%下降到73%（Steinhilber，2005年）。

324. 大部分公共和私人部门养老金制度主要适用于从事正规工作的工人，而不包括劳动人口中的新增部分。在智利，非正规工人原则上可以向私人养老基金缴费，但只有 43% 从事非正式工作的妇女附属于这些基金，只有 16% 的妇女缴费 (Todaro, 2008 年)。根据拉丁美洲养恤基金监督员国际协会 (Valente, 2008 年)，10 个成员国中只有 37% 的在业人口，主要是工资较高的工人定期向养老基金缴费。

325. 非缴费型养老金计划是更具包容性的社会保护办法。在拉丁美洲，古巴和尼加拉瓜的非缴费型养老金覆盖了所有老年人；智利出台了一份非缴费制度，保证所有年满 65 岁的公民都能获得不低于最低工资标准 150% 的养老金。这种养老金已在普遍发放，但领取其他退休金的人的补贴在逐渐减少，这样就减少了对公共资金的需求，并对那些对此项制度缴费的人给予奖励 (Barrientos 和 Lloyd-Sherlock, 2002 年)。这种计划对于那些很难进入劳动力市场、遭受某种形式歧视的弱势群体成员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从事各类非正规工作的人在获得有公平工资和社会保障的高质量就业机会方面尤其遇到更多的困难和限制。

326. 一些国家制订一些措施以惠及以前未被保障制度覆盖的群体。例如，南非、纳米比亚和博茨瓦纳全都执行大规模、不缴款的社会养老金制度 (Devereux, 2001 年)。南非的养老金制度是经过经济状况调查的，其他两个国家实行普遍养老金制度。纳米比亚的养老金是固定费率、限定金额的福利金，在到达一定年龄 (60 岁) 时自动启动，惠及所有纳米比亚公民，而且男女平等。该计划由政府收入，包括税收直接资助，而不是来自保险计划的缴费。该系统的申请人核查采用了生物识别法，不仅考虑到贫穷申请人中文盲率高，还要减少可能发生的腐败 (同上)。

327. 一些发展中国家采用了适度的普遍养老金制度，其最新经验显示对整个家庭减贫有积极影响 (劳工组织, 2009 年 e)，这些影响包括了经济利益，如动用养老金以增强家庭资产基础，并且根据养老金领取人及其他家庭成员的健康和营养状况发放社会福利金。

328. 为了惠及特定群体，智利制订了专门面向家庭佣工的终止就业方案。家庭佣工的雇主必须向在任何私人养老金系统开立的终止就业储蓄账户缴费 4.11%。该账户的余额将以与退休储蓄账户相同的方式，投资于生利的金融资产。一旦终止就业，家庭佣工有权领取账户上的余额。在智利，家庭佣工参加退休储蓄计划是自愿的，但终止就业方案有望加强其自愿参与 (Barrientos, 2004 年)。在巴西，1998 年《宪法》将基本养老金的普遍享受资格扩展到在农村从事非正规工作的老人和残疾人。Previdencia 农村社会保障计划向从事生计农业、渔业和采矿的 60 岁以上的男性劳动者和 55 岁以上的女性劳动者，如果主要受益人死亡或残疾，向其受抚养人，提供相当于最低工资的月津贴 (同上)。

E. 获得基本保健福利

329. 随着世界临近实现与保健有关的千年发展目标的截止时间，加强保健制度、提供负担得起的保健，摆到发展议程上。然而，健康保护覆盖不足令人震惊和保健不平等，依然存在于国家之间和国家内部。保健指标呈现出显著的跨区域差距。从高收入与低收入国家之间的儿童和产妇死亡率差距可以看出，贫穷、获得负担得起的保健服务与死亡率之间存在着密切联系（劳工组织，2008年b；妇发基金，2008年）。从经济状况来看，因怀孕或分娩死亡的风险差别很大，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为1/22、发达国家为1/7 300（联合国，2008年b）。在许多国家，妇女获得基本医疗，包括生殖保健服务极其困难。

330. 此外，由于许多人缺乏足够的财政手段来获取保健服务，全世界每年都有数百万人因为支付保健费用而继续陷入贫穷（劳工组织，2008年b）。在全球一级，卫生组织的数据表明，每年有多达1.78亿人因用现金支付保健费用而遭受财政灾难，还有1.04亿人仅仅因为支付医疗费而陷入贫穷（德国技术合作公司—劳工组织—世卫组织，2007年）。与中上等和高收入国家相比，估计低收入国家的人要多承担50%以上的保健支出。近年来，在美国，保健费用已成为主要的债务根源和导致破产的首要原因（Zelda和Rukavina，2007年）。³²

331. 缺乏获得保健的途径产生了重大的社会和经济影响。除对保健和贫穷有影响之外，健康、劳动力和市场和创新之间的密切关系影响着经济增长和发展。健康保护有助于累积提高生产率和促进经济增长的人力资本。

332. 削减公共卫生投入以及更多地依靠各种成本回收机制，包括追求利润的私人行为、收取治疗费和药费，导致保健服务利用大幅下滑，增加了妇女用来取代这些服务的无报酬工作时间（Mackintosh和Tibandebage，2004年）。服务提供不到位，既影响妇女，也影响男子，但它们对妇女的影响方式不同，比对男子的影响更剧烈，尤其是如果她们贫穷的话，因为妇女往往鲜有能力通过支付费用获得优质服务来替代公共投入的不足（妇发基金，2008年）。例如，国家研究发现，保健部门改革推出的用户收费制度，造成产妇保健服务使用率急剧下降（人口基金，2005年）。儿童健康和产妇保健问题千年项目工作队建议，应当废除基本保健服务的使用费（Freedman等人，2005年）。

333. 按照劳工组织的定义，社会健康保护是针对生产率降低、停工或收入减少或健康状况不佳造成的社会萧条和经济损失、由公共部门或公共部门安排的授权私人部门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劳工组织，2008年b）。这种社会健康保护由各种筹

³² 见《健康保险和保健成本说明》，2009年，华盛顿特区（全国保健联盟），引自《将父母的保健作为优先事项》，请登录http://www.nccp.org/publications/pdf/text_874.pdf 查阅。

资和组织选择组成，旨在提供充足的一揽子福利，使人们免受健康状况不佳和相关财政负担之害。许多资助保健服务的机制已经存在，包括由税收资助的国家保健服务；凭单和有条件的现金福利；缴费型义务性社会健康保险或受管制的私人非营利健康保险制度以及互助式和基于社区的非营利健康保险制度（同上）。

334. 许多国家在采取各种办法制订必要的法律框架和政策，以促进全面获得保健，这方面取得了进展。在经合组织的 30 个成员国中，15 个国家的社会健康保护制度主要是由通过社会保险基金筹集的缴费资助的，12 个国家的社会健康保护制度基本是由一般税收资助的，还有 3 个采用混合的保健资助制度。所有依赖集资缴费的国家基本上也得到了政府预算收入提供的资金，以使特定的人口群体，如穷人得到覆盖（德国技术合作公司—劳工组织—世卫组织，2007 年）。例如，德国和联合王国等国家的健康保护机制各不相同，但两者都实现了相同的全面覆盖或接近全面覆盖的目标。联合王国国家卫生局向住在境内的所有人提供医疗福利金，而不论国籍或是否缴费或缴纳所得税。在这些社会健康保护的先锋国家，包括比利时、法国和卢森堡，营利性私人保险仅占保健支出的一小部分（2008 年 b）。

335. 健康保险计划的结构和投保资格管理条例影响了男女获得保健情况，并且在利用服务和/或保健成果方面造成男女之间的区别和不平等。

336. 许多国家提出将健康保险计划作为用户缴费制度的一种替代选择，也作为获得医疗服务资助的一种手段。例如，哥斯达黎加试行了面向自营职业者和无报酬工人（家庭工人、家庭主妇和学生）的自愿保险制度。该制度将从未给退休金或健康保险计划缴费的人，以及那些缴费时间短、没有积累到足够的福利金的人作为目标对象。其成员的人均家庭收入必须低于国家统计局确定的一揽子基本食品标准。该计划的经费由国家和参保个人缴纳，国家缴费为参考收入的 0.25%，而独立工人缴纳 7.25%，个人缴费可以不一致，最低为 4.75%。据估计，近四分之三（74%）的独立工人缴纳了健康保险费（Lund，2004 年）。

337. 自 1981 年以来，泰国也将健康保险覆盖面逐步扩大到社会保障系统之外的低收入家庭（Limwattananon 等人，2005 年）。为了回应全民保健制度公共运动，2002 年通过了国民健康保险法案。最初缴纳 30 铢的保健计划允许那些没有获得正规保健福利的人，每次看病只需支付 30 铢，即可获得正规保健福利。这种付款后来被取消，该计划更名为全民保健方案。一开始有人担心需求将会急剧增加，威胁计划的财务的持续负担能力，但事实证明这是毫无根据的。对有组织的、以家庭为基础的女工——一个健康状况不佳成为最安全隐患的群体——进行的研究发现，它最容易获得政府福利计划的资助。85%以上的妇女参加了全民保健方案，85%以上的人给予了积极评价（Doane 等人，2006 年）。

338. 在墨西哥, Seguro 大众健康保险方案始于 2004 年, 旨在帮助没有投保的人, 最终目标是在 2010 年实现全面覆盖。该方案为一套明确规定的保健干预措施提供补贴, 经费来自国家和州政府及各个家庭的缴费。缴费是渐变的, 这样家庭的缴费额会随着收入的提高而增加。该方案着重于妇女特有的保险问题, 包括孕产妇死亡、艾滋病毒/艾滋病、宫颈癌和乳腺癌及基于性别的暴力。大概同时间开始的国家妇女与保健方案, 旨在将两性平等观点纳入保健部门的所有国家政策和方案。其主要优先事项是满足妇女在整个人生的保健需要, 并且应对妇女担当家庭保健人员和照料者时遇到的挑战 (Langer 和 Catino, 2006 年)。

339. 以社区为基础的健康保险计划是由地方政府、地方社区、非政府组织、工会、保健设施或合作社发起、拥有及经营的。与穷人群体保持密切和经常联系的小额供资组织, 完全能够利用必要的信息, 监测各种行为, 并履行大量非正式工人的合同。自这些组织设立行政和信息传播系统以来, 在服务套餐上添加小额保险只需较少的开办费。以前与小额供资组织建立的联系有助于招募成员, 并帮助克服信任和信心问题。例如, 专门面向非正规经济中的妇女的最悠久且最著名的方案之一, 是印度自营职业妇女协会的综合健康保障计划。自营职业妇女协会设立了自己的银行, 向其成员提供储蓄和借贷服务, 并且很快了解到疾病是妇女不能按时还贷的主要原因。该计划最初提出了初级保健方案, 1992 年建立了 Vimo SEWA——一个综合保险方案, 由三部分组成: 人寿保险、资产保险和健康保险。健康保险的福利金包括每年最多多少天之内的住院费。成员可以自己选择公共保健提供者或私人保健提供者。自营职业妇女协会就哪些保健提供者提供咨询意见。共同要求包括: 加入自营职业妇女协会、在自营职业妇女协会开立银行账户及参与该一揽子方案的全部三个部分。成员可以缴纳年费或支付一次性缴费, 但后者金额较大, 缴费全部存入自营职业妇女协会银行。存款利息支付 58 岁——该方案的上限年龄——以下的年费, 到了这个年龄, 所有存款都返还给成员。缴纳固定存款的人将领取更多的福利金, 包括领取产妇津贴 (Chatterjee 和 Ranson, 2003 年)。

340. 为了应对许多国家社会健康保护方面的欠缺, 劳工组织制订了一项战略, 以加速实现全面覆盖并促进公平 (劳工组织, 2008 年 b)。覆盖方面的差距和获得方面的欠缺必须从两性平等角度评估, 必须应对有性别区分的差距和挑战。2004 年组建的德国技术合作公司—劳工组织—世卫组织联合会, 从许多国家收集了提供社会健康保护方面的良好做法和经验教训, 并且帮助有关伙伴国家建立社会健康保险制度。

七. 结论和建议

341. 全球政策框架的基本假设是，减少国家干预、增强全球竞争，将促成更有效的资源配置和更高的增长率。通过紧缩和财政货币政策的双重措施控制通货膨胀，一直是宏观经济政策中压倒一切的目标。结构性政策的重点是减少国家的作用、促进私人企业的发展，放松对劳动力市场的管制和取消资本管制。

342. 该政策框架的目标只有一部分得到实现。发达国家的人均增长率自 1970 年代以来一直呈下降趋势，而发展中国家自 1990 年代以来一直呈增长态势，同时收入贫穷在减少，如果印度和中国的增长率不计算在内，这些趋势就不太具有积极意义。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收入不平等一直在加剧。有利于资本而不是劳动的收入分配，预示着等级界限日益明显。由于更多的男女从业于非正规经济，获得体面工作逐步受到损害。

343. 第六次《关于妇女在发展中的作用的世界概览》是在影响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全球经济和金融危机爆发之时编写的。对于许多发展中国家来说，危机将进一步恶化与 2007-2008 年发生的粮食和燃料危机相关的困难局面。发展中国家可用于执行抵御危机影响的适当的反周期政策的资源减少。危机中反映出的社会和经济成本以及两性平等影响很可能是深远的，并将危及实现国际商定的发展目标，包括千年发展目标。

A. 未能解决有性别区分的制约因素

344. 在过去十年里，阻碍赋予妇女经济权力的结构性制约因素没有得到适当解决。两性平等观点在宏观经济分析时基本上被忽视了，大多数增强平等措施只在微观层面上施行，许多急需而有效的措施，如促进小额供资和现金转移，未能充分解决限制妇女获得和控制经济及财政资源的根本制约因素。

345. 在过去十年里，在关键资源分配方面的男女平等进展非常不平衡。教育方面的性别差距已经缩小，特别是在中小学阶段，但进展缓慢，区域差异较大。虽然整个 1980 年代和 1990 年代，妇女的非农业就业机会增加了，但其就业份额在过去十年保持相对不变。过多的妇女从事非正规和非全时工作，发展中国家的许多女工处于“弱势”就业形态，包括从事无报酬家务劳动或自营工作。

346. 妇女集中在“非标准”工作领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职业隔离的制约因素和无报酬家务劳动及照料工作责任的不平等。妇女集中在报酬不太丰厚的活动，表明她们缺乏资源、缺乏讨价还价的能力以及她们在更广泛的经济领域面临歧视。

347. 在某些领域，横向和纵向上的性别隔离虽然已呈现为逐渐变小但可察觉的趋势，但在国家和区域两级仍存在巨大差异。与男子相比，妇女的劳动回报仍然普遍较低，世界各个地区的工资差距依然存在。尽管妇女更多地参与劳动力市场，但男女分担无报酬工作并还没有显著增加。

348. 世界许多地区的妇女在获得土地、住房、财产和其他生产性资源方面继续面临着歧视。在修改法律方面虽然取得了一些进展，但歧视性习惯法和传统依然存在、妇女维权意识淡薄不利于法律付诸实施。立法变化必须辅之以对所有关键利益攸关方的宣传和培训，以确保他们充分参与。承认并且保护现有的部族权利，并逐步健全习惯法，对确保贫穷妇女获得生产性资源也很重要。

349. 许多贫穷妇女和男子，特别是农村地区和城市贫民区的贫穷妇女和男子，被排除在正规金融服务之外。由于法律、规章、体制和文化障碍，妇女只能有限地获得正规金融服务。虽然小额供资组织已经成功地惠及贫穷妇女，但它们目前仅惠及到一小部分需要金融服务的人。

350. 在一些国家，经济改革是为了应对危机，将国家提供社会保护限制为建立狭义的安全网。许多就业形态不稳定的妇女被排除在与就业有关的公共保障之外，且负担不起私营保险的保费。这对于年老、健康状况不佳、残疾、失业和遇到其他生活危机的人造成了重大的安全漏洞。社会保护方面的实验证明，精心设计、基础广泛的社会保护战略可以提供超出危机应对功能的好处。

351. 虽然越来越多的妇女参与公共生活，但她们在大多数领域，特别是在经济决策领域人数严重不足。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妇女能够提出重要的观点和优先事项，促成技能和能力的多样性，使政策和预算决策更好地响应所有群体的需要和优先事项。促进妇女参与各个领域而且最高级别的经济决策机构，需要做出系统努力。妇女在获得和控制资源上的不平等、长年累月地担负无报酬家务和照料工作责任，限制了她们的生产率，制约了她们应对新的经济机会和充分有效地参与公共生活的能力。她们缺席确定宝贵资源和机会分配的重要决策论坛，使得两性不平等永久化。未能开发和积累经济增长和发展方面重要的妇女人力资本，产生了非常重大的总体影响。

B. 赋予妇女经济权力的倍增效应

352. 加强资源分配方面的性别公平引发了强烈争论。深入的微观研究、住户调查、国家和跨国家数据所提供的证据表明，改善妇女获得和控制资源以及增加充分受益于这些资源的机会，产生了一系列经济和社会的倍增效应。在微观一级，这些倍增效应是通过加强妇女的能力以提高其生计工作的生产率、有效分配时间和精力

力以投资于儿童保健和教育及其个人发展及参与社区活动来实现的。在宏观一级，倍增效应加强了经济可以依靠及提高国家人均生产率的劳动力和人才库。

353. 虽然两性平等对经济增长的积极影响获得了有力证据的支持，但经济增长影响两性平等的证据则显得更薄弱且更复杂，特别是在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经济增长促进了妇女的正规就业机会，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出口行业中就业。然而，它对这些国家两性平等其他方面的影响却微乎其微，对妇女预期寿命的影响更是有限，在关于降低产妇死亡率的千年发展目标方面依然没有取得什么进展，对妇女在更高级别上参与经济决策或政治生活也没有产生什么影响。经济增长最有可能对赋予妇女权力产生积极影响，前提是要有明确的政策来促进妇女教育、就业、人权和谈判能力。

354. 不过，赋予妇女经济权力关键方面的证据基础极不平衡，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对增长、经济活动和各种政策后果所做的大量重要分析，没有关注分配成本或社会成本，包括高度相关的两性平等观点，如妇女在非正规经济中人数过多和不平等分担无报酬工作的影响。虽然在使官方数据收集与利用对性别问题更具敏感认识方面已经取得了一些进展，但需要更多的资源来培养发展中国家研究机构的能力，以便及时研究赋予妇女经济权力问题，还需要提高国家统计局的能力，以产生妇女获得和控制资源方面准确、贴切而及时的统计数据 and 指标。

C. 以就业为中心、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相结合的、对性别问题有敏感认识的发展战略

355. 确保赋予妇女经济权力及获得和控制资源，需要采取增长与发展相结合的综合办法，侧重于认识到性别差异的就业促进机会，了解经济与社会发展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认识到性别差异的经济增长战略，应以增强理解和关注赋予妇女经济能力的限制因素为基础。制订战略需要全盘了解经济，要从根本上认识到人类劳动是一种“生产”，而非“天赋”生产要素，具体体现为人类的养育主要依靠妇女的无报酬劳动。这种战略还应当认识到，尽管妇女和男子都在从事各种生产活动以满足他们的需求并为未来投资，但妇女参与这些生产活动受到以下限制：不平等分担无报酬劳动、奉献其“人力资本”的机会有限以及获得和控制资源方面不平等。这些不利条件使许多妇女在家中依靠男子养活，削弱了她们在家庭、社区、国家和国家以下各级的话语权和影响力。

356. 经济和社会政策、正规和非正规经济、有报酬和无报酬工作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必须得到承认和明确的应对。例如，保健、教育和社会保护投资，在传统意义上被视为“社会政策”，不仅可以减轻妇女的无报酬工作负担，还有助于提高其生产率和承担风险能力，把握住不断变化的经济机会。另一方面，归类为经济

投资的道路交通系统如果得到改善，可以产生社会影响，如女性死亡率降低和入学率，特别是女孩入学率提高。

357. 全球竞争、灵活的劳动力市场以及经常的金融危机造成了不安全，导致强烈要求国家支持社会保护。人人享有基本保障，应当成为国家与公民的社会契约的一部分，要尽一切可能免受市场力量左右，并且通过税收和交叉补贴制度进行资助。最近的经验教训表明，缩小短期和长期需要时要认识到性别差异，一个实例就是扩大公共工程方案范围，使其超越传统的基础设施项目，纳入社会基础设施和保健服务，这些方案鼓励男女共同参与，有助于改变人们对待照料工作的态度并且更加公平地分担无报酬护理工作责任。另一个例子是使用现金转移，鼓励为培训方案投资，以便利劳动力市场的再进入，并增强适应快速变化的市场环境的能力。

358. 经济增长理论日益认识到，对人力资源的投资是一个关键因素。人们对在中小学教育阶段消灭性别差距给予了相当大的关注，但不太注重提高现有劳动力的生产率。处在当今技术、人口和经济快速变化的时代，工人不但需要掌握基本技能，也需要掌握现代技术，以增加在一系列部门择业的机会。许多妇女有着特殊的技能需求，原因在于她们时断时续地工作及主要从事非全职工作，需要得到不同形式的能力培养和培训，包括职业培训和在职培训，这些培训由不同行为者，包括小额供资组织、工会和非政府组织来安排。应当开发利用信息和通信技术的创新方案以增加联网和信息交流。

359. 其他人力资源投资正在成为优先事项。一个例子是，需要对无报酬照料工作给予更多的支持，促进男女之间更公平地分担这项工作。艾滋病毒/艾滋病大流行带来的照料责任主要由妇女和女孩承担，人口转型将照料老人的问题提上了政策议程。价廉质优的保健设施和获得保健及教育，已成为世界各地从事有报酬工作和自营职业以及因缺乏儿童保育支持而失业的妇女的重要需求。这种服务对于确保男子进一步参与照料工作也非常重要。需要付出更多努力，以确保充分的生产性就业和人人有体面工作。加强现行劳动管理条例的执法力度至关重要。劳动力市场管理条例也应当扩大到包括非正规经济中的工人。许多自营职业妇女处于劳动管理条例的覆盖范围之外，她们也可以受益于政府提供给中小型企业的支持和补贴，她们大都因为企业规模小和未注册而被排除在政府支助和补贴之外。简化登记程序和创造性地使用信息和通信技术，将有助于降低交易成本和鼓励更多的妇女注册自己的企业。

D. 协调办法

360. 有必要在不同的宏观经济政策手段之间加强协调，以实现以促进就业为中心的、促进两性平等的增长。重要因素包括：刺激经济的扩张性财政政策；更多关

注国内收入调动情况以资助这些政策并减少对外部资本的依赖；强化资本流动管理以减少其波动性；以及加大对金融市场的监管力度以避免过度投机。

361. 扩张性财政政策必须资助社会和经济基础设施方面的投资，还要更有效、更公平地调动国内资源。通过堵漏洞、降低间接税率、取消消费间接税转而对财富和收入征税，扩大了税收基础，消除了浪费性补贴，使税收更为公平，这是产生必要资源以制订应对市场上的两性不平等现象的政策和方案的重要步骤。

362. 金融部门改革也可以促进更公平的增长战略。精心设计的资本控制可以减少短期资本流动的波动，防止资本外逃。这将增加工人，尤其是女工随着其生产率提高而争取更高工资的谈判能力。金融部门改革还可以将金融惠及范围扩大至一些工人、农民、小企业家，特别是妇女，他们都因认为交易成本高被银行部门的私有化排除在外。中央银行可以通过开发银行和对优先部门包括妇女企业提供信贷补贴，促进基础广泛的增长。促进金融服务供应商的多样化及提供信贷服务之外的更广泛的服务，包括储蓄、保险、资金转移和咨询服务，让男女自由选择。所有金融机构的组织任务、目标和体制安排，都应当有一个明确的两性平等承诺，以确保妇女充分受益于服务扩大。

363. 要促进公平分配经济增长带来的好处，需要一个综合的经济和社会政策框架。社会目标必须纳入经济政策中。经济增长战略应当更多地注意实体经济，把重点放在创造充分就业和体面工作上，而不仅仅是财务收益。制订社会保护措施，应尽量减少妇女在扮演其生产和生育角色时面临的折衷方案，扩大妇女最有效地利用自己时间的能力。除了社会保障，要有一套更广泛的社会政策来支持儿童、病人和老人的照料工作，并增加人力资本投资及维持长期增长所必需的能力。

364. 近几十年的经验表明，市场力量本身几乎无力减少获得和控制资源方面的两性不平等，需要制订具体的政策以通过直接和间接行动来解决不平等现象。两性平等观点必须在促进以就业为中心的增长努力的方方面面中得到确认和落实。促进两性平等的预算分析，是确保以促进两性平等方式筹集和支出公共资源的一个重要工具，也是让政府对两性平等的政策承诺负责的一个重要工具。要对确保妇女参与公共财政管理改革的所有领域和所有各级决策给予明确关注。立法、临时配额和平等权利行动，是克服该领域固有的变革阻力的必要措施。

365. 国家的重要作用在于通过追求增强公平的政策、逐渐发展的立法和管理条例及体制变革提供一种有利的环境，包括捐助者、非政府组织、工会和私营部门在内的其他利益攸关方也能发挥重要作用。

366. 妇女组织，包括自然资源用户团体、小额供资团体、自助团体、工会和其他形式的劳工组织，可以极大地增强妇女获得和控制经济及财政资源的能力。在许多情况下，世界各地的这种组织允许妇女诉求其权利、影响政策、让政府负责，

并寻求集体解决问题之道。妇女组织和网络作为经济可持续增长和发展过程中的关键角色需要得到承认和资助。

367. 私人公司为维护企业的社会责任原则承受了巨大的压力，许多公司通过了行为守则，包括在工人待遇方面承诺两性平等，有些企业成立了私人基金会，以支持促进在各种环境下的妇女权利。

368. 认识到性别差异的发展援助有助于提高两性平等和赋予妇女权力，不过，这种援助的重点应当扩大到社会部门之外的更多生产部门，以确保妇女更多地获得和控制经济及财政资源。应当解决的疑虑是，由于预算支助的侧重点，新的援助实效议程的侧重点可能导致两性平等政策和方案供资减少。需要加强监测双边和多边基金的利用情况，培养捐助机构的能力，将两性平等观点有效地纳入所有支持领域。

E. 建议

369. 为了确保妇女公平地获得和控制经济及财政资源，会员国应当充分履行《北京行动纲要》、大会第二十三届特别会议成果和千年发展目标中所载的两性平等和赋予妇女权力的承诺，《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的缔约国应全面执行该公约规定的各项义务。

370. 为此，各会员国、包括联合国在内的国际组织、私营部门、非政府组织、工会和其他利益攸关方不妨也采取以下行动：

(a) 宏观经济环境：

- (一) 通过确定和应对涉及所有经济和财政资源的两性平等观点，包括通过进行社会性别分析、性别影响评估以及促进两性平等的预算编制，更加努力地落实性别平等主流化的战略；
- (二) 进行并传播关于宏观经济稳定、结构改革、税收、投资，包括外国直接投资以及所有相关经济部门的两性政策和方案分析；
- (三) 使经济政策与社会发展政策挂钩，确保全体人民，包括穷人和弱势群体按照《蒙特雷共识》的目标，受益于经济增长和发展；
- (四) 基于所有男女都能充分地享有生产性就业以及体面工作，制订和实施对性别问题有敏感认识的、以就业为中心的增长战略；
- (五) 采取适当措施以查明并应对经济和金融危机对妇女和女孩的消极影响，为两性平等和赋予妇女权力保持足够的供资水平；

- (六) 设计应对金融危机的一揽子刺激方案，提供对性别问题有敏感认识的有形基础设施和社会基础设施及就业投资，把有报酬工作与无报酬工作以及移民妇女等特别弱势群体的处境考虑在内；
- (七) 进行并传播所有政策领域收入和支出的性别分析，把成果转化为客户资源调动及预算规划、分配和评价；
- (八) 进一步开发促进两性平等预算程序的方法、工具和能力，确保将两性平等观点系统地纳入预算和规划程序中；
- (九) 制订累进税收制度，消除税收制度中的性别偏见，并通过更有效的征收工作、扩大税收基础和有效打击逃税来加强税收；
- (十) 确保国家发展计划、减贫战略、千年发展目标执行战略和其他宏观一级的规划手段和方法充分考虑到增强妇女获得和控制经济及财政资源的权利；
- (十一) 通过性别平等主流化、为有针对性的活动供资以及捐助者与伙伴之间加强对话，巩固以两性平等和赋予妇女及女孩权力为目标的发展援助重心和影响，以及加强各种机制，有效计量用于在发展援助各个领域纳入两性平等观点的资源；
- (十二) 通过鼓励竞争、要求汇兑公司提供准确的汇率及手续费信息、监督转移的安全保障以及为汇款的移民妇女和收款人提供金融扫盲培训，采取措施降低汇款转移成本；
- (十三) 采取措施，确保妇女平等参与所有经济决策领域，包括相关政府部委、国际组织、公司董事会和银行部门的最高决策层；
- (十四) 更好地收集、汇编和使用妇女参与经济决策机构的数据；

(b) 充分的生产性就业和体面工作：

- (一) 在正规和非正规部门通过并执行体面工作原则，如同劳工组织第 100、111、156、183 号公约所载的那样，在执行时适当兼顾两性平等观点；
- (二) 制订并充分支持积极的劳动力市场政策，促进充分的生产性就业及人人有体面工作，让城乡地区的男女都能充分参与；
- (三) 对国家劳动法律和标准进行性别分析，并对就业做法，包括对跨国公司制订对性别问题有敏感认识的政策和准则，同时特别关注出口加工区，以包括《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和劳工组织各项公约在内的多边文书为基础；

- (四) 通过具有具体针对性的措施，通过和/或审查及充分执行对性别问题有敏感认识的立法和政策，减少横向和纵向职业隔离及两性工资差距；
- (五) 在正式和非正式部门大力推行最低工资管理条例，并确保同值工作同等报酬；
- (六) 开发和维护统计工具，从数量和质量两方面计量国民账户之外的无报酬工作，以更好地反映其在所有相关部门的政策、战略、计划和预算中的价值；
- (七) 增强国家统计局的能力，以全面有效地收集各类活动的统计信息，包括开展时间使用调查，为制订促进男女分担无报酬工作的政策提供依据；
- (八) 促进各方进一步认识到，照料工作应当由国家、私营部门、民间社会和家庭以及男女之间共同分担，加强所有利益攸关方之间的对话和协调；
- (九) 发展和/或扩大面向儿童、老年人、病人、残疾人和艾滋病毒/艾滋病感染者的质优价廉的公共护理服务；确保这种服务在距离、营业时间和费用方面，符合护理者和受护理者的需要；
- (十) 通过和执行促进工作与家庭责任兼顾的法律和政策，包括通过增加工作安排的灵活性如非全时工作；确保男女均可享有产假、陪产假、育儿假和其他形式的休假，且在享受这种福利时不会受到歧视；
- (十一) 鼓励男子通过培训、教育和同等方案，充分参与照料和扶助他人，包括老年人、残疾人、艾滋病毒/艾滋病感染者、病人、儿童和其他受抚养者；
- (十二) 加大保护家庭佣工，包括移民妇女权利的力度，确保他们有体面工作的条件，特别是她们的工作时间、条件和工资、享受保健服务及其他社会和经济福利；
- (十三) 采取具体措施，包括通过提高认识及宣传和树立正面典型，消除与男女就业有关的陈规定型观念；
- (十四) 采取适当措施，减少各级教育，特别是中学一级的不平等，以应对限制妇女充分参与劳动力市场，特别是接受教育、科技培训，包括信息和通信技术方面的制约因素；
- (十五) 提倡终身学习，促进妇女平等获得职业和在职教育和培训方案以及信息和通信技术创新方案，包括非传统领域、领导和管理方案要特别关注失业妇女和重返劳动力市场的妇女；

- (十六) 鼓励妇女进入男性占主导地位的研究、就业和培训领域，也鼓励男子进入女性占主导地位领域；
- (十七) 维护并促进组织和集体谈判权利；促进妇女参与社会对话并充当代表；在社会对话议程中纳入两性平等问题；以及
- (十八) 通过政策和支助各种机制，为妇女组织和网络创造有利环境，包括自助团体、工人组织和合作社，特别是支持移民妇女、土著妇女和残疾妇女等弱势群体的教育和就业机会的团体；

(c) 土地、住房和其他生产性资源：

- (一) 通过和/或审查立法和政策，确保妇女平等获得和控制土地、住房和其他财产，包括通过继承、土地改革方案和土地市场，并对执法给予应有的重视；
- (二) 采取措施以促进平等获得土地和财产权利，包括提供培训使司法和行政系统对两性平等问题更加敏感；对寻求权利诉求的妇女提供法律援助；支持妇女团体及网络的工作；开展提高认识运动，以提请人们关注妇女获得土地和财产的平等权利；
- (三) 开发、记录和推广创新办法，确保妇女平等获得土地、住房和其他财产，包括提供带补贴的贷款和支持妇女的集体努力；
- (四) 采取措施，消除习惯法中与土地和财产权有关的歧视性内容，在对性别问题有敏感认识方面不断取得进步；
- (五) 通过改善获得信贷和储蓄的途径，加大工作和投资力度，以提高农村妇女工作的生产率；使她们获得重要的基础设施和服务，如交通、能源、供水和卫生设施、推广服务和市场以及包括信息和通信技术在内的适当技术；
- (六) 通过适当措施，承认并保护妇女获得社区资源，包括森林、湿地和公共商品的权力；
- (七) 通过协商和参与性进程，加大对农村地区和城市贫民区供水和环境卫生方案的投资力度，以提高健康和福祉，减轻妇女和女孩的工作量，让她们腾出时间和精力从事其他生产性活动，包括创业；
- (八) 采取措施，确保妇女充分参与森林和水资源管理方面的规划和决策，增加参加培训课程的妇女人数；

- (九) 确保妇女积极参加围绕着基本的生产性资源，如水和森林建立的用户团体，通过确立目标、培训方案和其他奖励措施，确保妇女参与资源分配的重大决策；
- (十) 评估农业政策和战略，确保妇女在粮食保障中的重要作用得到认同，并将其视为短期和长期应对粮食危机的一个组成部分；
- (十一) 采取措施，在与男子平等的基础上，使妇女融入应对气候变化努力的规划、决策和适应和减缓倡议的执行过程之中，并确保她们获得相关的财政资源和技术；
- (十二) 制订战略，增加对妇女非农业创收活动的资源分配，包括通过获得金融服务和技术改进；
- (十三) 推动并促进妇女和女孩平等获得信息和通信技术，包括那些生活在农村地区的妇女和女孩，例如，通过进入对优先事项和男女各自的需求有敏感认识的电信中心；接受利用信息和通信技术的教育和培训，建立网络、开展宣传、信息交流以及商业和教育活动；以及寻找机会开发适当的内容；
- (十四) 加大工作力度并增加资源分配，在妇女和男子介入的协商和参与性进程的基础上，通过经济适用房方案满足基本住房需求；
- (十五) 采取步骤修订法律，废除歧视妇女、使她们得不到安居、不能平等拥有充足住房的做法；
- (十六) 在公共资源分配和重要基础设施开发和服务方面，加强同妇女磋商并使其参与所有决策，如交通、水资源，特别是在城市贫民窟和农村地区，以确保这些工作能满足男女的优先事项及需求；
- (十七) 支持加强妇女获得和控制土地、住房、财产及其他生产性资源方面的研究和数据收集，为政策和战略制订提供信息；

(d) 金融服务：

- (一) 通过系统进行性别分析和性别影响评估，推动将性别平等观点纳入金融部门的所有政策和方案中；
- (二) 查明并解决妇女在获得金融服务，包括储蓄、信贷、保险和现金转移服务方面面临的具体制约因素；
- (三) 采取一切适当措施，确定并解决妇女在获得和控制银行贷款、抵押贷款和其他形式金融信贷方面遇到的歧视，对贫穷妇女给予特别关注；

- (四) 采取适当措施，确保所有金融服务提供商的机构任务、目标和体制安排对两性平等做出明确承诺，确保妇女充分受益于服务范围的扩大；
- (五) 加强现有的及新增小额信贷机构的能力，以便惠及农村地区和城市贫民区的贫穷妇女；
- (六) 确保小额供资方案着重于开发安全、方便、妇女可享有的储蓄产品，支持妇女努力保留自己的储蓄控制权；
- (七) 开发各种方法和工具，包括指标，通过正规和非正规渠道，包括收入、福利和其他社会指标，确保更系统、更有效地监测小额供资的影响；
- (八) 评估小额供资日益商业化对妇女获得和控制金融资源的影响；
- (九) 通过增加妇女获得金融工具的机会、提供培训和咨询服务、促进联网和信息共享以及促使她们更多地参加咨询委员会和其他有利于金融机构制订政策和方案编制及审查的论坛，创造一种有利于增加女企业家人数及其企业规模的氛围；
- (十) 促进妇女平等参与各级正规和非正规金融机构的决策；
- (十一) 支持对妇女的需求和优先事项、获得正规和非正规金融服务以及此类服务的影响和适当性进行研究和数据收集，并有效地传播研究成果；

(e) 社会保护：

- (一) 增加拨给基本社会保障的公共开支份额，以应对与童年、老年、健康状况不佳、残疾、失业和其他生活危机有关的脆弱性；
- (二) 制订并改进充分的、可持续的、促进两性平等的社会保护计划，包括社会保险、养老金和储蓄计划，满足整个生命周期的最低基本需要，并在计算各自的福利金时承认照料时期；
- (三) 确保健康保险、儿童和家属津贴等社会保护措施及这些福利信息可为所有工人，包括移民工人和非正规部门的妇女所享有，这些措施还不会增强性别偏见；
- (四) 审查、加强和扩大社会保护，以充分满足贫穷人口的需求，把妇女的具体需要和有关不平等分担无报酬工作的优先事项考虑在内；
- (五) 确保就业保障政策和方案以及以家庭为基础的现金转移方案在制订时是以性别分析为依据的，同时考虑到男女各自的需求和优先事项，并且不会强化性别偏见；

-
- (六) 采取措施，确保老年妇女和残疾妇女切实平等地享有基本社会服务、适当的社会保护/社会保障措施，同时特别关注农村地区和城市贫民区生活贫穷的妇女，使她们能过上独立、健康的生活；
 - (七) 制订不受缴费年限限制的最低养老金制度，以确保最低基本需要得到满足，并在计算退休金福利时承认照料时期；
 - (八) 依照男女平等原则，确保妇女和女孩在整个生命周期普遍获得适当的价廉质优的保健服务；
 - (九) 按照要求，采取创新措施，使基本健康保险覆盖面扩大到所有人；
 - (十) 加强双边和多边援助，旨在确保提供认识到性别差异的基本社会服务；
 - (十一) 改善按性别和年龄分列的及时、可靠、可比数据的收集、编辑和传播，进一步开发定量和定性指标，以增强整个生命周期社会保护措施获得和影响力。

参考文献

- Addati, L. 和 N. Cassirer (2008年)。男女平等分担责任，包括照顾艾滋病病毒/艾滋病感染者。为联合国提高妇女地位司组织的男女平等分担责任，包括照顾艾滋病病毒/艾滋病患者专家组会议编写，日内瓦。
- ____ (2007年)。扩大妇女就业机会：非正规经济工人和儿童保育需求。非正规经济区域间专题讨论会：妥善地过渡到正规化。11月27日至29日。日内瓦：国际劳工组织。
- Adato, M., and L. Haddad (2001). Targeting poverty through community-based public works programmes: a cross-disciplinary assessment of recent experience in South Africa. Washington, D.C.: International Food Policy Research Institute.
- Adato, M., and D. Mindek (2000). Progress and women's empowerment: evidence from six Mexican states. In *The Impact of PROGRESA on Women's Status and Intrahousehold Relations*, Adato, De la Briere and others, Washington, D.C.: International Food Policy Research Institute.
- Agarwal, B. (forthcoming). Gender and forest conservation: the impact of women's participation in community forest governance. *Ecological Economics*.
- ____ (2005). A landmark step to gender equality. *The Hindu*, 25 September.
- ____ (2002). *Are we not peasants too? Land rights and women's claims in India*. New York: Population Council.
- ____ (2001). Participatory exclusions, community forestry, and gender: an analysis for south asia and a conceptual framework. *World Development*, vol. 29, no. 10, pp. 1623-48.
- ____ (2000). Conceptualizing environmental collective action: why gender matters. *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 24, pp. 283-310.
- ____ (1997). "Bargaining" and gender relations: within and beyond the household. *Feminist Economics*, vol. 3, no. 1, pp. 1-51.
- ____ (1994). *A field of one's own. Gender and land rights in South Asi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____ (1992). The gender and environment debate: lessons from India. *Feminist Studies*, vol. 18, no. 1, pp. 19-158.

- Agarwal, B., and P. Panda (2007). Toward freedom from domestic violence: the neglected obvious. *Journal of Human Development and Capabilities*, vol. 8, no. 3.
- _____. (2005). Marital violence, human development and women's property status in India. *World Development*, vol. 33, no. 5, pp. 823-850.
- Ahmed, I. (2004). Rates on interest in the microcredit sector: comparing NGOs with commercial banks. In *Attacking poverty with microcredit*, Ahmed, S., and M. Hakim, eds. Dhaka: University Press.
- Anker, R. (2005年)。妇女获得具有权威、影响力和决策权的职业。日内瓦：国际劳工组织。
- Anker, R. 等人 (2003年)。1990年代基于性别的职业隔离。日内瓦：国际劳工组织。
- Antonopoulos, R. (2008). The unpaid care work-paid work connection. Annandale-on-Hudson: The Levy Institute.
- _____. (2007). The right to a job, the right type of projects: employment guarantee projects from a gender perspective. Annandale-on-Hudson: The Levy Institute.
- Appleton, S. 等人 (2002年)。中国劳动力紧缩：成因和后果。《中国经济评论》，第13卷，第2-3期，第252-275页。
- _____. (1999). The gender wage gap in three African countries.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vol. 47, no. 2, pp. 289-312.
- Aslanbeigui, N., and G. Summerfield (2000). The Asian crisis, gender, and the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architecture. *Feminist Economics*, vol. 6, no. 3, pp. 81-103.
- Association for Women's Rights in Development (2007). *The second FundHer report: financial sustainability for women's movements worldwide*. Mexico, AWID.
- Atinc, T. 和 M. Walton (1998年)。东亚金融危机的社会后果。摘自《东亚：复苏之路》。华盛顿特区：世界银行。
- Baird, S. 等人 (2007年)。发展中国家商业周期内的婴儿死亡率。《政策研究工作文件》，第4346卷，华盛顿特区，世界银行。

- Bardasi, E., and J. Gornick (2008). Working for less? Women's parttime wage penalties across countries. *Feminist Economics*, vol.14, no.2, pp.37-72.
- Bardasi, E. 等人 (2007年), 非洲的性别、创业精神和竞争力, 摘自《非洲竞争力报告》。华盛顿特区: 世界经济论坛。
- Barker, G. (2008年)。让男子和男孩参与照料: 对拉丁美洲研究、实践和政策宣传的反思。为联合国提高妇女地位司组织的男女平等分担责任, 包括照顾艾滋病毒/艾滋病感染者专家组会议编写, 日内瓦。
- Barnett, K., and C. Grown (2004). *Gender impacts of government revenue collection: the case of taxation*. London: Commonwealth Secretariat.
- Barrientos, A. (2004). Women, informal employment and social protection in Latin America. In *Women at work: challenges for Latin America*, Piras, C., ed. Washington, D.C.: Inter-American Development Bank.
- Barrientos, A., and J. DeJong (2006). *Reducing child poverty with cash transfers: a sure thing? Development Policy Review*, vol. 24, no.5.
- Barrientos, A. 和 P. Lloyd-Sherlock (2002年)。非缴费型养老金和社会保障。《社会保护问题、社会保护领域、解雇论文》第12期。日内瓦: 国际劳工组织。
- Baruah, B. (2007). Gendered realities: exploring property ownership and tenancy relationships in urban India. *World Development*, vol.35, no.12, pp.2096-2109.
- Barwell, I. (1996年)。交通与村庄: 非洲村庄一级旅行和交通服务及相关研究的结果。华盛顿特区, 世界银行。
- Basu, B., and F. Famoye (2004). Domestic violence against women, and their economic dependence: a count data analysis. *Review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16, no.4, pp.457-472.
- Beall, J., and S. Fox (2007). Urban poverty and development in the 21st century: towards an inclusive and sustainable world. London: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 Beaman, L., and others (2008). Powerful women: does exposure reduce bias? Massachusetts: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 Bellamy, K., and K. Rake (2005). *Money, Money, Money: Is it still a rich man's world?* London: Fawcett Society.
- Benería, L. (2008). The crisis of care,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and public policy, *Feminist Economics*, vol.14, no. 3, pp.1-21.
- _____. (2003). *Gender, development and globalization: economics as if all people mattered*. London: Routledge.
- Benería, L., and M. Floro (2005). Distribution, gender and labour market informalization: a conceptual framework with a focus on homeworkers. In *Rethinking informalization: poverty, precarious jobs and social protection*, Kudva and Benería, eds. Ithaca, New York: Internet-First University Press.
- Benería, L., and M. Martínez-Iglesias (2009). The new gender order and reconciliation policies: the case of Spain. Paper presented at the conference on the theme "Towards gender equality in the labour market: work-family life reconciliation policies", Istanbul Technical University, May 27, organized by Women for Women's Human Rights.
- Benschop, M. (2002年)。权利与现实：妇女对土地、住房和财产的平等权利在东非得到落实了吗？内罗毕：联合国人类住区规划署。
- Berger, M. (1989). Giving women credit: the strengths and limitations of credit as a tool for alleviating poverty, *World Development* vol.17, no. 7, pp. 1017-1032.
- Berik, G. (2008). Growth with gender inequity: another look at East Asian development. In *Social justice and gender equity: rethinking development strategies and macroeconomic policies*, Berik, Rodgers and Zammit, eds. London: Routledge.
- Berik, G., and Y. Rodgers (2008). Engendering development strategies and macroeconomic policies: what's sound and sensible? In *Social justice and gender equity: rethinking development strategies and macroeconomic policies*, Berik, Rodgers and Zammit, eds. London: Routledge.
- Berik, G., and others (eds.) (2009). Inequality, development and growth. *Special issue of Feminist Economics*, vol.15, no.2.

- Bibars, I. (2002年)。社会安全网覆盖到妇女了吗？阿拉伯世界的妇女社会保障权利。在主题为“阿拉伯世界中的妇女：为了平等的公民权而奋斗”的世界银行第四次发展问题圆桌会议上发言，华盛顿特区。
- Bickham Mendez, J. (2005). From revolution to the maquiladoras: gender, labour and globalization in Nicaragua.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 Blackden, C. M., 和C. Bhanu (1999年)。《性别、增长和减贫：援助非洲特别方案》。华盛顿特区：世界银行。
- Boserup, E. (1970). *Women's role in economic development*,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 Brachet-Márquez, V., and O. de Oliveira (2004). Gendering the debate on the welfare state in Mexico: women's employment and welfare entitlements in the globalized economy. In *Globalization, export-oriented employment and social policy: gendered connections*, Razavi, Pearson and Danloy, eds. 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 Braunstein, E. (2008年)。妇女就业、赋予妇女权力与全球化：经济透视。为联合国提高妇女地位司组织2009年《关于妇女在发展中的作用的世界概览》专家协商会编写，曼谷。
- Braunstein, E. 和M. Brenner (2007年)。外国直接投资与中国城市地区的工资：男女差异。《女权主义经济学》，第13卷，第2/3期：第213-237页。
- Braunstein, E., and J. Heintz (2006). Gender bias and central bank policy: employment and inflation reduction. Salt Lake City: International Working Group on Gender, Macroeconomics and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 Breneman - Pennas, T. 和M. Rueda Catry (2008年)。妇女参与国家一级的社会对话机构。日内瓦：国际劳工组织。
- Brickner, R. (2006). Mexican union women and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women's labour Pights. In *Latin American Perspectives*, vol. 33, no. 151, pp. 55-74.
- Broadbent, K. (2007). Sisters organizing in Japan and Korea: the development of women-only unions. In *Industrial Relations Journal*, vol. 38, no. 3, pp. 229-251.
- Brush, C., and others (2004). *Gatekeepers of venture growth: a Diana Project report on the role and rarticipation of women in the venture*

- capital industry*. Kansas City, Missouri: Ewing Marion Kauffman Foundation.
- Budlender, D. (2008年)。六国照料和非照料工作的统计证据。日内瓦：联合国社会发展研究所。
- Caouette, T., and others (2006). Labour migration in the Greater Mekong subregion. Bangkok: Rockefeller Foundation.
- Case, A., and others (2003). The reach of the South African child support grant: Evidence from KwaZulu-Natal. Princeton University: Woodrow Wilson School of Public and International Affairs.
- Castro, M. E. (2007年)。促进墨西哥私营部门的两性公平：开发成功模式。咨询服务调查表中的宝贵经验教训（10月）。华盛顿特区：世界银行集团国际金融公司。
- 阿拉伯妇女训练研究中心（2007年）。中东和北非的女企业家：贡献、特点和挑战。突尼斯：阿拉伯妇女训练研究中心和国际金融公司两性创业市场。
- Chant, S. (2003). Female household headship and the feminization of poverty: facts, fictions and forward strategies. London: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
- Chant, S., and C. McIlwaine (2009). *Geographies of development in the 21st century: an introduction to the global south*. Cheltenham: Edward Elgar.
- Chant, S. 和 C. Pedwell (2008年)。妇女、性别和非正规经济：劳工组织研究评估与发展方式建议。日内瓦：国际劳工组织。
- Charmes, J. (2009年)。概念、计量和趋势。摘自《非正规正常吗：为了发展中国家有更多和更好的工作》，Jutting和Laiglesia编辑，巴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 Chatterjee, M., and M. Ranson (2003). Livelihood security through community based insurance in India. In *Global health challenges for human security*, Chen and others, ed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Global Equity Initiative, Asia Centre.
- Chen, M. 等人 (2005年)。2005年世界妇女的进步：妇女、工作和贫穷。纽约：联合国妇女发展基金。

- Chen, S. 和 M. Ravallion (2008年)。发展中国家比我们想像得更穷，但战胜贫穷还是取得了成功。华盛顿特区：世界银行。
- Chikarmane, P., and L. Narayan (2005). *Organizing the unorganized: a case study of the Kagad Kach Patra Kashtakari Panchayat*. Pune: Kagad Kach Patra Kashtakari Panchayat (Trade Union of Waste-pickers).
- Choudhury, T., and A. Raihan (2000). *Structural adjustment participatory review initiative. Bangladesh study theme 2(C): implications of financial sector reforms (mimeo)*. Dhaka. Available at http://www.saprin.org/bangladesh/research/ban_finance.pdf.
- Commonwealth Secretariat (1989). *Engendering adjustment for the 1990s: report of the Commonwealth Secretariat Expert Group on Structural Adjustment*. London.
- Copestake, J., and others (2005). *Money with a mission, vol. 1: microfinance and poverty reduction*. Warwickshire: ITDG Publishing.
- Cornish, M. (2007年)。在全球劳动力市场上赋予妇女权力的法律意义。世界银行关于赋予妇女经济权力的法律意义的学习对话。华盛顿特区：世界银行。
- Corporate Women Directors International (2007). *Women board directors of the 2007 Fortune Global 200*. Washington: D.C. GlobeWomen.
- Costa, J., and others (2009). *The role of gender inequalities in explaining income growth, poverty and inequality: evidence from Latin American countries*. Brasilia: International Poverty Centre.
- Daley-Harris, S. (2009). *State of the microcredit summit campaign report 2009*. Washington, D.C.: Microcredit summit.
- Das, M. (2006年)。传统的排斥裁减影响印度的劳动力市场成果了吗？华盛顿特区：世界银行。
- Dasgupta, S. (2002年)。印度社会经济保障的组织安排。日内瓦：国际劳工组织。
- Dash, A. (2003). *Strategies for poverty alleviation in India: CYSD's holistic approach to empowerment through the self-help group model*. *IDS Bulletin*, vol. 34, no. 4, pp. 133-142.

- Davin, D. (2004). The impact of export-oriented manufacturing on Chinese women workers. In *Globalization, export-oriented employment and social policy: gendered connections*, Razavi, Pearson and Danloy, eds. 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 De Aghion, B.A., and J. Morduch (2004). Microfinance: where do we stand? In *Financial development and economic growth: explaining the links*, Goodhart, C., ed.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 _____ (2000). Microfinance: beyond group lending. *Economies of transition*, vol.8, no.2, pp.410-420.
- Deere, C., 和C. Doss (2006年)。发展中国家的性别与财富分配。赫尔辛基：联合国大学世界发展经济学研究所。
- Deere, C., and M. Leon (2001). *Empowering women: land and property rights in Latin America*. Pittsburgh: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 Deere and others (2009). Poverty, headship and gender inequality in asset ownership in Latin America. Paper prepared for the Congress of Latin American Studies Association, Rio de Janeiro, June 11-14.
- _____ (2004). Female land rights and rural household incomes in Brazil, Paraguay and Peru. Massachusetts: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 Deininger, K. 等人 (2007年)。埃塞俄比亚的农村土地证：发放过程、对其他非洲国家的初步影响和意义，华盛顿特区：世界银行。
- Deshpande, R. (2006). Safe and accessible: bringing poor savers into the formal financial system. Washington, D.C.: Consultative Group to Assist the Poor.
- Devenish, A., and C. Skinner (2004). Organizing workers in the informal economy: the experience of the Self-Employed Women's Union 1994-2004. South Africa: University of Kwazulu, Natal, School of Development Studies.
- Devereux, S. (2005). Can minimum wages contribute to poverty reduction in poor countrie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vol.17, no.7.
- _____ (2001). Social pensions in Namibia and South Africa. Brighton: Institute of Development Studies.

- Diagne, A., and others (2000). Empirical measurements of households' access to credit and credit constraint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Washington, D.C.: International Food Policy Research Institute.
- Doane, D., and others (2006). *Social protection for home-based workers in Thailand and the Philippines*. Bangkok: HomeNet South-east Asia.
- Dolan, J. (2000). The Senior Executive Service: gender, attitudes and representative bureaucracy. *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search and Theory*, vol. 10 no. 3, pp. 513-519.
- Dollar, D. 和 R. Gatti (1999年) 两性不平等、收入和增长：有利时机是否对妇女有利？华盛顿特区：世界银行。
- Doraisami, A. (2009). The gender implications of macroeconomic policy and performance in Malaysia. In *Social Justice and Gender Equality: Rethinking Development Strategies and Macroeconomic Policies*, Berik, Rodgers and Zammit, Institute for Development Studies. London: Rowledge.
- Doss, C. 等人 (2008年)。性别与资产所有权：个人数据收集指导。华盛顿特区：世界银行。
- Ellis, A. 等人 (2006年)。《性别与乌干达的经济增长：释放妇女的潜能》。华盛顿特区：世界银行。
- Ellis, F., and others (2009). *Social Protection in Africa*. Cheltenham: Edward Elgar.
- Ellis, P. (2003). *Women, gender and development in the Caribbean*. London: Zed Press.
- _____ (2006). Budgeting for women's rights. Monitoring government budgets for compliance with CEDAW. New York: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Fund for Women.
- Ellis, A., and others (2006). Gender and economic growth in Uganda: unleashing the power of women.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 Elson, D. (2006年)。编制妇女权利预算。监督政府预算是否遵守《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纽约：联合国妇女发展基金。

- _____ (1991). Male bias in macroeconomics: the case of structural adjustment. In *Male bias in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Elson, D., ed.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 Epstein, G., and D. Power (2003). *Rentier income and financial crises. An empirical examination of trends and cycles in some OECD countries*. Massachusetts: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Economy Research Institute.
- Esplen, E. (2009). Gender and care: overview report. London: BRIDGE.
- 欧洲联盟委员会 (2009年)。欧洲政坛中的妇女：行动时刻。布鲁塞尔：就业、社会事务和平等机会总局。
- _____ (2008年a)。2007年男女参与决策：局势和趋势分析。布鲁塞尔：就业、社会事务和平等机会总局。
- _____ (2008年b)。欧洲促进妇女创业网络，2007年活动报告。布鲁塞尔。
- Evers, B., and B. Walters (2000). Extra-household factors and women farmers' supply response in sub-Saharan Africa. *World Development*, vol. 28, no. 7, pp. 1341-1346.
- Federal Ministry for Family Affairs, Senior Citizens, Women and Youth (2008). Exploring new avenues: portraits of men in transition. Berlin, Germany.
- Fernando, P., and G. Porter. (2002). Bridging the gap between gender and transport. In *Balancing the load: women, gender and transport*, Fernando and Porter, eds. London: Zed Books.
- Fiorillo, C., and I. Matin (2009). Study of the first phase of the 100-Day Employment Generation Programme. Bangladesh: National Food Policy Capacity Strengthening Programme and BRAC.
- Fisher, T., and M. Sriram (2002). Beyond microcredit: putting development back into microfinance. London: New Economics Foun
- Floro, M. (2002). Mobilizing domestic resources for development: through the lens of poor women. Paper presented at the conference on gender budgets, financial markets and financing for development, 19-20 February 2002, Heinrich Böll Foundation, Berlin.

- Floro, M. 等人 (2004年)。性别问题和对发展筹资的关切。多米尼加共和国：联合国提高妇女地位国际研究训练所。
- Fodor, E. (2009年)。彻底重组经济结构和社会动荡对妇女经济地位的影响。为联合国提高妇女地位司组织的2009年《关于妇女在发展中的作用的的世界概览》专家协商会编写的文件，哥本哈根，2月17日至19日。
- Folbre, N. (1994). *Who takes care of the kids? Gender and the structures of constraint*. London: Routledge.
-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 (2008年)。良好的农业推广和咨询服务实践全球审查。罗马：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
- Franck, A. (2008). Key feminist concerns regarding core labour standards, decent work and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Belgium: WIDE Network.
- Frank, C. (2008). Stemming the tide of mission drift: microfinance transformations and the double bottom line. Washington, D.C.: Women's World Banking.
- Freedman, L., and others (2005). *Who's got the power? Transforming health systems for women and children*. New York: Millennium Project Task Force on Child Health and Maternal Health.
- Fukuda-Parr, S. (2008年)。金融危机对穷人和丧失权利的人民和国家的人类影响。为大会全球金融危机的互动小组编写的文件，10月30日。
- Fussell, E. (2000). Making labour flexible: the recomposition of Tijuana's maquiladora female labour force. *Feminist Economics*, vol. 6, no. 3, pp. 59-79.
- Ghimire-Bastakoti, K., and others (2006). Social inclusion in community forestry: why women are frequently excluded from decision-making and leadership in Nepal. Nepal: Resource Identification and Management Society.
- Ghosh, J. (2009). Informalization and women's workforce participation: a consideration of recent trends in Asia. In *The gendered impacts of liberalization: towards "embedded liberalism"?*, Razavi, S., London: Routledge.

- González de la Rocha, M. (2008). Life after Oportunidades. In *External Evaluation 2008: Oportunidades programme after ten years of intervention in rural areas*. Mexico City: SEDESOL.
- Government of VietNam (2000). *Situation analysis and policy recommendations to promote the advancement of women and gender equality in VietNam*. Hanoi: National Committee for the Advancement of Women.
- Grown, C. 等人 (2006年)。《实现两性平等和赋予妇女权力的金融需求》。华盛顿特区：世界银行。
- _____ (2005). *Taking action: achieving gender equality and empowering women. Report of the Millennium Project Task Force on Education and Gender Equality*. London: Earthscan.
- 德国技术合作公司 - 劳工组织 - 世卫组织 (2007年)。扩大保健方面的社会保护：发展中国家的经验、吸收的教训和建议。可登录 www.gtz.de/de/dokumente/en-extending-social-protection-in-health.pdf 查阅。
- Hallman, K., and others (2002). *Childcare, mothers' work and earnings: findings from the urban slums of Guatemala City*. New York: Population Council.
- Hardoy, J., and others (2001). Environmental problems in an urbanizing world: finding solutions in cities in Africa, Asia and Latin America. London: Earthscan.
- Heinrich, C. J. (2007). Demand and supply-side determinants of conditional cash transfer programme effectiveness. *World Development*, vol. 35, no. 1, pp. 121-143.
- Heintz, J. (2006年)。全球化、经济政策和就业：贫穷及其对两性的影响。日内瓦：国际劳工组织。
- Heintz, J., and R. Pollin (2005). Informalization, economic growth and the challenge of creating viable labour standard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In *Rethinking informalization: poverty, precarious jobs and social protection*, Kudva and Beneria, eds. Ithaca, New York: Internet-First University Press.
- Helms, B. (2006). *Access for all: building inclusive financial systems*. Washington, D.C.: Consultative Group to Assist the Poor.

- Holden, S., and others (2007). Impact of land certification on land rental market participation in Tigray region, northern Ethiopia. Paper presented at the Nordic Development Economics Conference, Copenhagen, 18-19 June.
- Holvoet, N. (2005). The impact of microfinance on decision-making agency: evidence from South India. In *Development and Change*, vol. 36, no. 1, pp. 75-102.
- _____ (2004). Impact of microfinance programmes on children's education: do the gender of the borrower and the delivery model matter? In *Journal of Microfinance*, vol. 6, no.2, pp.1-23.
- HomeNet/Institute of Social Studies Trust (2006) *Social protection for home-based women workers in South Asia: learning from action and research*. New Delhi: Institute of Social Studies Trust.
- Hook, J. (2006). Care in context: men's unpaid work in 20 countries, 1965-2003. In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vol. 71, no. 4, pp. 639-660.
- Huber, E. (2006). Gendered implications of tax reform in Latin America: Argentina, Chile, Costa Rica and Jamaica. In *Gender and social policy in a global context*, Razavi and Hassimb, eds. Basingstoke: Palgrave.
- Hulme, D., and P. Mosley (1996). Finance for the poor or poorest? Financial innovation, poverty and vulnerability. In *Who needs credit? poverty and finance in Bangladesh*, Wood and Sharif, eds. Dhaka: University Press Ltd.
- Hussain, S. (2009年)。小额供资和赋予妇女权力：神话与现实。为联合国提高妇女地位司组织的2009年《关于妇女在发展中的作用的世界概览》专家协商会编写的文件，哥本哈根，2月17日至19日。
- Institute for Human Development (2009). NREGS in India: impacts and implementation experiences. Report on the international seminar on the theme "National Rural Employment Guarantee Scheme in India: impacts and implementation experiences," New Delhi, September 16-17, 2008.
- 国际复兴开发银行/世界银行 (2008年)。21世纪的女孩教育：平等、赋权和增长。华盛顿特区。

国际金融公司（2006年）。女企业家及获得供资情况：世界各地方案简况。华盛顿特区：国际金融公司和考夫曼基金会。

国际农业发展基金（2008年）。《国际移民、汇款和农村发展》。罗马。

国际劳工组织（2009年a）。两性平等是体面工作的核心。日内瓦。

____（2009年b）。全球妇女就业趋势。日内瓦。

____（2009年c）。工作与家庭：照料办法在于分担！两性平等是体面工作核心宣传运动2009年3月的主题，2008-2009年。

____（2009年d）。工作中的社会对话：男女的呼声和选择。日内瓦。

____（2009年e）。人人都有社会保障：为社会公正和经济发展投资。日内瓦。

____（2008年a）。工作场所报告。日内瓦。

____（2008年b）。社会健康保护：劳工组织人人获得保健战略。社会保障政策简介。1号文件。日内瓦。

____（2008年c）。全球妇女就业趋势。日内瓦。

____（2008年d）。国际劳工大会第九十七届会议通过的决议。日内瓦。

____（2008年e）。低收入国家负担得起基本社会保障吗？日内瓦。

____（2007年a）。《工作中的平等：应对挑战》。总干事的报告，日内瓦。

____（2007年b）。联系与学习：将残疾妇女纳入劳工组织的妇女创业发展与两性平等方案。非洲四国的进展评估。日内瓦。

____（2004年a）。《打破玻璃平顶：妇女参与管理》：2004年最新消息。日内瓦。

____（2004年b）。公平的全球化：为所有人创造机会。日内瓦。

____（2003年）。社会保障：在整个生命周期连续投资，促进社会公正、减贫和社会发展。日内瓦。

____（2002年a）。体面工作与非正规经济。国际劳工大会第九十届会议报告六。日内瓦。

____（2002年b）。非正规经济中的男女：统计情况。日内瓦。

____（2001年）。社会保障：新的共识。日内瓦。

国际移民组织（2008年）。《2008年世界移民报告：在不断演变的全球经济中管理劳动力的流动》。日内瓦。

- 联合国提高妇女地位国际研究训练所（2007年）。性别、汇款与发展。圣多明各。
- 联合国提高妇女地位国际研究训练所和国际移民组织（2007年）。性别与汇款：从非洲中部和西部及地中海到西班牙的哥伦比亚移民。圣多明各。
- International Trade Union Confederation (2008). The global gender pay gap. Available at <http://www.ituc-csi.org/IMG/pdf/gap-1.pdf>.
- 各国议会联盟（2009年）。妇女进入议会：截至2009年5月31日的情况。登录 <http://www.ipu.org/wmn-e/world.htm> 查阅。
- Isern, J., and D. Porteous (2005). Commercial banks and microfinance: evolving models of success. Washington, D.C.: Consultative Group to Assist the Poor.
- James, E. 等人（2003年）。养老金改革对两性的影响：跨国分析报告。华盛顿特区：世界银行。
- Jejeebhoy, S. (1995). *Women's education, autonomy, and reproductive behaviour: experience from developing countries*. Oxford: Clarendon Press.
- Jenkins, P. (2004). Beyond the formal/informal dichotomy: access to land in Maputo, Mozambique. In *Reconsidering informality: Perspectives from urban Africa*, Hansen, K., and M. Vaa, eds. Uppsala: The Nordic Africa Institute.
- Johnson, S. (2005). Gender relations, empowerment and microcredit: moving on from a lost decade. In *European Journal of Development Research*, vol. 17, no. 2, pp. 224-248.
- ____ (1998). Microfinance north and south: contrasting current debate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vol. 10, no. 6, pp. 799-809.
- Johnson, S., and M. Niño-Zarazúa (2009). *Financial access and exclusion in Kenya and Uganda*. United Kingdom: University of Bath.
- Jomo, K. S. (2009). Export-oriented industrialization, female employment and gender wage equity in East Asia. In *Economic and Political Weekly*, vol. 44, no. 1, pp. 41-49.
- Kabeer, N. (2008a). *Mainstreaming gender and social protection in the informal economy*. London: Commonwealth Secretariat.

- _____ (2008b). Paid work, women's empowerment and gender justice: critical pathways of social change. Brighton: Institute of Development Studies.
- _____ (2008c). Citizenship narratives in the absence of good governance: voices of the working poor in Bangladesh. Working paper 2008-19. Brighton: Institute of Development Studies.
- _____ (2002). Safety nets and opportunity ladders: addressing vulnerability and enhancing productivity in South Asia. In *Development Policy Review*, vol. 20, pp. 589-614
- _____ (2001). Resources, agency, achievements: reflections on the measurement of women's empowerment. *Discussing women's empowerment: theory and practice*. Stockholm: Swedish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Cooperation Agency.
- Kabeer, N., and R. Murphy (1996). Compensating for institutional exclusion: government and non-government credit interventions for the poor. Institute for Development Studies discussion paper 356, Brighton, United Kingdom.
- Kabeer, N., and S. Mahmud (2004). Globalization, gender and poverty: Bangladeshi women workers in export and local market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vol. 16, no. 1, pp. 93-109.
- Kapsos, S. (2005年)。增长的就业密度：趋势和宏观决定因素。日内瓦：国际劳工组织。
- Katz, E., and J. Chamorro (2003). Gender, land rights and the household economy in rural Nicaragua and Honduras. Paper presented at the annual conference of the Latin American and Caribbean Economics Association, 9-11 Oct., Puebla, Mexico.
- Katz, II. K. (2000). *Converging divergencies: world wide changes in employment systems*. Ithaca,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Kaufmann, C. (2007). *Globalization and labour rights: the conflict between core labour rights and international economic law*. Oxford: Hart Publishing.
- Khandker, S. (1999). *Fighting poverty with microcredit: experience in Bangladesh*. Dhaka: University Press Ltd.

- Khawari, A. (2004). *Microfinance: does it hold its promises? A survey of recent literature*. Hamburg, Germany: Hamburg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 Klasen (1999年)。两性不平等会阻碍增长和发展了吗？跨国经济衰退的证据。性别与发展政策研究报告。华盛顿特区：世界银行。
- Klasen, S., and F. Lamanna (2009). The impact of gender inequality in education and employment on economic growth: new evidence for a panel of countries. *Feminist Economics*, vol. 15, no. 3.
- Knowles, S., and others (2002). Are educational gender gaps a brake on economic development? Some crosscountry empirical evidence. *Oxford Economic Papers*, vol. 54, pp.118-149.
- Knox, A., and others (2007). *Mending the gap between law and practice. Organizational approaches for women's property rights*. Washington, D.C. : International Centre for Research on Women.
- Kucera, D., and W. Milberg (2007). Gender segregation and gender bias in manufacturing trade expansion: revisiting the "Wood Asymmetry". In *The feminist economics of trade*, Van Staveren, I., and others, eds. London: Routledge.
- Kulkarni, S. (2005). Looking back, thinking forward: the Khudawadi experience with access to irrigation for women and the landless. In *Flowing upstream: empowering women through water management initiatives in India*, Ahmed, S., ed., Thousand Oaks, California: Sage Publications.
- Lahai, B., and others (2000). The gender of the extension agent and farmers' access to and participation in agricultural extension in Nigeria.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Education and Extension*, vol. 6, no. 4, pp.223-233.
- Langer, A., and J. Catino (2006). Health reform in Mexico: a work in progress. *The Lancet*, vol. 368, no.9549.
- Lastarria-Cornhiel, S. (1997). Impact of privatization on gender and property rights in Africa. *World Development*, vol. 25, pp.1317-1333.
- Latapi, A., and M. González de la Rocha (2009). Girls, mothers and poverty reduction in Mexico: evaluating Progres-a-Oportunidades. In *The*

gendered impacts of liberalization: towards “embedded liberalism”?, Razavi, S., ed. London: Routledge.

- Lee, S. (2007年)。注意差别：大韩民国的非正规就业和劳动力市场隔离。《国际劳工组织工作条件研究丛刊》。可登录SSRN: <http://ssrn.com/abstract=1092488> 查阅。
- Lim, J. (2000). The effects of the East Asian crisis on the employment of women and men: the Philippine case. *World Development*, vol. 28, no. 7.
- Limwattananon, S., and others (2005). Equity in financing health care: impact of universal access to health care in Thailand. Bangkok: Equity in Asia-Pacific Health Systems project.
- Luce, S. (2005). The case for international labour standards: a “northern” perspective, Brighton: Institute for Development Studies.
- Lund, F. (2008年)。非正规经济、社会保护和赋予妇女权力：建立联系和减贫良好做法。提交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发展援助委员会/机构间妇女和两性平等网络减贫会议的文件。巴黎（3月）。
- _____ 2004年。非正规工人获得社会保障和社会保护。为联合国社会发展研究所两性平等报告编写的背景文件：在不平等的世界里为了公正而奋斗。日内瓦：联合国社会发展研究所。
- Lyons, L. (2006). The limits of transnational activism: organizing for migrant workers’ rights in Malaysia and Singapore. Paper presented at a workshop on the transnationalisation of solidarities and women’ s movements (27-28 April). Canada: University of Montreal, Political Science Department.
- Mackintosh, M., and P. Tinbandebage (2004). Inequality and redistribution in health care: analytical issues for developmental social policy. In *Social policy in a development context*, Mkandawire, T., ed., 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 Mason, K., and H. Carlsson (2004). The impact of gender equality in land rights on development. Paper presented at the conference on the theme “Human rights and development: towards mutual reinforcement”, hosted by the New York University School of Law, 1 March, New York.

- Mayoux, L. (2009a). 支持和赋予妇女权力：将性别平等观点纳入农村小额供资主流：从业人员指南。罗马：国际农业发展基金。
- _____ (2009b). *A gender justice protocol for financial services: framework, issues and ways forward*. The Hague: OFAM Novib.
- _____ (2008年)。乌干达：卡巴罗雷研究和资源中心的参与型、自我管理的小额供资模式。摘自《农业和农村发展》。性别与农业原始资料手册。华盛顿特区：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和世界银行。
- McCarter, E. (2006). Women and microfinance: why we should do more. *University of Maryland Law Journal of Race, Religion, Gender and Class*, vol. 6, no.2, pp.352-366.
- McCord, A. (2004). Policy expectations and programme reality: the poverty reduction and labour market impact of two public works programmes in South Africa.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Analysis Unit, Oversea Development Institute, working paper no. 8. Available at http://www.odi.org.uk/spiru/publications/working_paper/Esau_8_South_Africa.pdf.
- McCrack, E. (2000). The growing class divide among American women. In *Capitalism, socialism and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y*, Pollin, R., ed., Cheltenham: Edward Elgar.
- McKenzie, D. (2004). Aggregate shocks and urban labour market responses: evidence from Argentina's financial crisis.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vol. 52, no. 4, pp.719-758.
- Meinzen-Dick, R. and M. Zwartveen (1998). Gendered participation in water management: issues and illustrations from water users associations in South Asia. *Agriculture and Human Values*, vol.15, no.4, pp.337-345.
- Mersland, R., and R. Oystein Strom (2008). Performance and corporate governance in microfinance institutions. Germany: University Library of Munich.
- Mesa-Lago, C. (2002). Reassessing pension reforms in Chile and other countries in Latin America. Paper presented at Workshop on Social Protection for the Poor, 21-25 October. Manila: Asian Development Bank.

- Miraftab, F. (2001). Risks and opportunities in gender gaps to access shelter: a platform for interventio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olitics, Culture and Society*, vol.15, no.1, pp.143-160.
- Molyneux, M. (2007年)。拉丁美洲社会保护的变化与连续性：享受国家服务的母亲们。日内瓦：联合国社会发展研究所。
- Morduch, J., and B. Haley (2001). Analysis of the effects of microfinance on poverty reduction. Ottawa: RESULTS, Canada, for the Canadian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Agency.
- Morrison, A. 等人 (2007年)。两性平等、贫穷和经济增长，《政策研究工作文件》，第4349期，世界银行，华盛顿特区。
- Muravyev, A., and others (2009). Entrepreneurs' gender and financial constraints: evidence from international data.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vol.37, no.2, pp.270-286.
- Murray, I. (2008). Women's World Banking study: the capacity of poor women to grow their businesses in the Dominican Republic. *Global Urban Development Magazine*, vol.4, no.2.
- Nagy, B. (2008). Challenging the male norm of employment. Evidence from Sweden, Norway and Hungary. In *Global perspectives on gender equality: reversing the gaze*, Kabeer and Stark. London: Routledge.
- 非政府机构最佳做法中心，就业和社会服务政策研究司 (2002年)。加强低收入家庭获得住房。《问题简报》。华盛顿非政府机构最佳做法中心。
- Naidoo, S., and A. Hilton (2006). Access to finance for women entrepreneurs in South Africa. Pretoria: International Finance Corporation/Department of Trade and Industry/FinMark Trust.
- Narain, S. (2009年)。增强妇女获得供资方面的问题。为联合国提高妇女地位司组织的2009年《关于妇女在发展中的作用的全球概览》专家协商会编写的文件，哥本哈根，2月17日至19日。
- ____ (2007年)。孟加拉国中小型企业女企业家获得供资情况。为两性创业市场、国际金融公司和南亚企业发展贷款机制编写的报告。孟加拉国。
- ____ (2006年)。第一小额供资银行的性别战略。喀土穆：两性创业市场/国际金融公司的报告。

-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2008年）。《性别与可持续发展：最大限度地发挥妇女在经济、社会 and 环境保护中的作用》。巴黎。
- _____（2005年）。支持两性平等的援助活动，1999-2003年贷方报告制度。巴黎。
-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发展援助委员会（2007年）。提供援助支持两性平等和赋予妇女权力，基于发展援助委员会成员国关于两性平等政策制订者报告的统计资料，2004-2005年。巴黎。
-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发展援助委员会两性平等网络（2007年）。理解《巴黎宣言》与两性平等和赋予妇女权力之间的联系。巴黎。
- Oostendorp, R. (2009). Globalization and the gender wage gap. *World Bank Economic Review*, Advance Access (6 January), pp.1-21.
- Palmer, I. (1991年)。非洲经济调整中的性别和人口问题：变革计划。日内瓦：国际劳工组织。
- Patnaik, U. (2003年)。全球资本主义与发展中国家的通货紧缩和农业危机。《社会政策与发展工作文件》第15期。日内瓦：联合国社会发展研究所。
- Petrie, R., and others (2003). Seeking women landowners and ownership in Zimbabwe: case studies of women's access to land and land use. Madison, Wisconsin: Land Tenure Center,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 Piper, N. (2005年)。两性平等与移民。为政策分析和研究方案编写的文件。日内瓦：国际移民问题全球委员会。
- Postgate and others (2003). Performance review of the Rural Maintenance Programme (RMP), Phase III, Stage 2, Bangladesh. Bangladesh: CARE International.
- Psacharopoulos, G., and H. A. Patrinos (2004). Returns to investment in education: a further update. *Education Economics*, vol.12, no.2, pp.111-134.
- Quisumbing, A. (2003). *Household decisions, gender and development: a synthesis of recent research*. Washington, D.C. International Food Policy Research Institute.
- Quisumbing, A., and B. De la Briere (2000). The impact of PROGRESA on intra-household decision-making and relative schooling achievement of boys and girls, part I. In *The Impact of PROGRESA on Women's Status*

- and Intra-household Relations*, Adato, M., and others. Washington, D.C.: International Food Policy Research Institute.
- Quisumbing, A., and others (2008). Helping women respond to the global food price crisis. Washington, D.C.: International Food Policy Research Institute.
- Quisumbing, A., and L. Pandolfelli (2008). Promising approaches to address the needs of poor female farmers: resources, constraints and interventions. Paper prepared for the Bill and Melinda Gates Foundation. Washington, D.C.: International Food Policy Research Institute.
- Rama, M. (2002年)。公共部门裁员的性别影响：越南的改革方案，华盛顿特区，世界银行。
- Ranis, G. 等人 (2000年)。经济增长与人类发展。《世界发展》，第28卷，第2期：第197-219页。
- Rao, N. (2006年)。妇女获得土地及其他生产性资源的权利：对性别关系和提高生产率的影响。新德里：联合国妇女发展基金。
- _____ (2002). Cycling into the future: the Pudukkottai experience. In *Balancing the load: women, gender and transport*, Fernando and Porter. London: Zed Press.
- Rawlings, L. (2004年)。获得社会援助的新办法：拉丁美洲执行有条件的现金转移方案的经验。华盛顿特区：世界银行。
- Razavi, S. (2007). The return to social policy and the persistent neglect of unpaid care. *Development and Change*, Vol. 3, no. 1-2, pp. 2-32.
- _____ (2003). Introduction: agrarian change, gender and land rights. *Journal of Agrarian Change*, vol. 3, no. 1-2, pp. 2-32.
- Razavi, S. 和 S. Staab (2008年)。照料工作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经济：阶层和两性不平等争议。为联合国提高妇女地位司组织的男女平等分担责任，包括照顾艾滋病感染者专家组会议编写的文件，日内瓦。
- Regional Hunger and Vulnerability Programme (2009). “Ever upwardly mobile” : how do cell phones benefit vulnerable people? *Wahenga Brief* no. 16.

- Richardson, D., and others (2000). Grameen Telecom's Village Phone Programme in Rural Bangladesh: a multimedia study. Report to the Strategic Planning and Policy Division of the Aisa Branch Poverty Reduction Project. Ottawa: Canadian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Agency.
- Rodriguez, F., and D. Rodrik (2001). Trade policy and economic growth: a sceptics' guide to the cross-national evidence. In *Macroeconomics Annual 2000*, Bernanke and Rogoff, eds.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 Roberts, P. 等人 (2006年)。农村获得服务指数：关键发展指标。华盛顿特区：世界银行。
- Robinson, M. (2001年)。《小额供资革命：面向穷人的可持续供资》。华盛顿特区：世界银行。
- Rodgers, Y. (1999年)。在劳动力市场上保护妇女和促进平等：理论和证据。为世界银行性别政策研究报告编写的背景文件。华盛顿特区：世界银行。
- Rutherford, S. (2000). *The poor and their money*. New Delhi: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Salway, S., and others (2005). Women's employment in urban Bangladesh: a challenge to Gender Identity? *Development and Change*, vol. 36, no. 2, pp. 317-349.
- Sánchez, M. 和 R. Vos (2009年)。全球危机对拉丁美洲实现千年目标的影响，纽约：联合国/经济与社会事务部（即将出版）。
- Satterwaithe, D. (2008年)。建设家园：城市穷人联合会的作用。摘自《资产、生计和社会政策》，Moser和Dani编辑，华盛顿特区，世界银行。
- Schreiner, M. (2000). Informal finance and the design of microfinance. Centre for Social Development, Washington University, St. Louis. Available at http://www.microfinance.com/English/Papers/Informal_Finance_Lessons.pdf.
- Sebstad, J., and M. Cohen (2000). Microfinance, risk management and poverty. Washington, D.C.: Assessing the Impact of Microenterprises Services Project, US Agency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 Seguino, S. (2009). The road to gender equality: global trends and the way forward. In *Social justice and gender equity: rethinking*

- development strategies and macroeconomic policies*, Berik, Rodgers and Zammit, eds. London: Routledge.
- _____ (2002a). Gender, quality of life and growth in Asia 1970 to 1990. *The Pacific Review*, vol.15, no. 2, pp.245-277.
- _____ (2002b). Promoting gender equality through labour standards and living wages: an exploration of the issues. Paper prepared for presentation at Global Labour Standards and Living Wages Conference, Political Economy Research Institute, Amherst, Mass., 19-20, April.
- _____ (2000). Gender inequality and economic growth: a cross-country analysis. *World Development*, vol.28, no. 7, pp.1211-1230.
- Seguino, S., and C. Grown (2006). Gender equity and globalization: macroeconomic policy for developing countrie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vol.18, no.8, pp.1081-1104.
- Seguino, S., and M. Floro (2003). Does gender have any effect on aggregate saving? An empirical analysis.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Applied Economics*, vol.17, no.2.
- Sen, A. (1999). *Development as freedo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_____ (1990). Gender and cooperative conflicts. In *Persistent Inequalities*, Tinker, I., e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Sender, J. (2003) Rural poverty and gender: analytical frameworks and policy proposals. In *Rethinking Development Economics*, Chang, J., ed. London: Anthem Press.
- Sharp, R. (2003年)。编制两性平等预算：注重业绩的预算编制框架内的两性平等预算编制倡议。纽约：联合国妇女发展基金。
- Sijbesma, C., and others (2009). Impacts of domestic water supply on gender and income: results from a participatory study in a drought-prone region in Gujarat, India. *Water Policy*, vol.11, pp.95-105.
- Smith, L., and others (2003). The importance of women's status for child nutrition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Washington, D.C.: International Food Policy Research Institute.
- Standing, G. (1999). *Global labour flexibility: seeking distributive justice*. United Kingdom: Macmillan Press.

- Stark, A. (2008). Don' t disturb the men: a viable gender equality strategy? In *Perspectives on gender equality: reversing the gaze*, Kabeer and Stark. London: Routledge.
- Steinhilber, S. (2006). Gender and post-socialist welfare states in Central Eastern Europe: family policy reforms in Poland and the Czech Republic. In *Gender and social policy in a global context*, Razavi and Hassim, eds. Basingstoke: Palgrave.
- Steinhilber, S. (2005年)。养老金改革的性别影响：一般说明和特定国家的证据。为联合国社会发展研究所两性平等报告：在不平等的世界为了两性平等而奋斗编写的背景文件。日内瓦：联合国社会发展研究所。
- Strickland, R. (2004). To have and to hold: women' s property rights in the context of HIV/AIDS in sub-Saharan Africa. Working paper. Washington, D.C. : International Centre for Research on Women.
- Suarez, M., and others (2006). *The Bolsa Familia Programme and the tackling of gender inequalities. The challenge of promoting the reordering of the domestic space and women' s access to the public space*. Brazil: Ministry of Social Development.
- Tabbush, C. (2009). Gender, citizenship and new approaches to poverty relief: conditional cash transfer programmes in Argentina. In *The gendered impacts of liberalization: towards "embedded liberalism" ?*, Razavi, S., ed. London: Routledge.
- Takhtamanova, Y., and E. Sierminska (2009). Gender, monetary policy and employment: the case of nine OECD countries. *Feminist Economics*, vol.15, no.3.
- Todaro, R. (2008). Chile under a gender lens: from import substitution to open markets. In *Social justice and gender equity: rethinking development strategies and macroeconomic policies*, Berik, Rodgers and Zammit, eds. London: Routledge.
- Tokman, V. (2006). *Integrating the informal sector in the modernization process*. Paper prepared for the 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 Development Forum on Productive Employment and Decent Work, 8-9 May.

- Tsikata, D. (2003). Securing women's interests within land tenure reforms: recent debates in Tanzania. *Journal of Agrarian Change*, vol.3, nos.1-2, pp.149-183.
- Tzannatos, Z. (1999). Women and labour market changes in the global economy: growth helps, inequalities hurt and public policy matters. *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vol.27, no.3, pp.551-569.
- 联合国(2009年)。《2009年世界经济形势与展望》，截至2009年的最新消息。联合国出售品编号：E.09.II.C.2。
- _____(2008年a)《世界经济和社会概览》。联合国出售品编号：E.08.II.C.1。
- _____(2008年b)。不要忘记粮食危机：需要新的政策方针。《政策简报》第8期。纽约：经济和社会事务部。
- _____(2008年c)。《2008年千年发展目标报告》。纽约：经济和社会事务部。
- _____(2007年)。《2007年世界经济和社会概览：老龄化世界的发展》。纽约：经济和社会事务部，联合国出售品编号：07.II.C.1。
- _____(2006年a)。结束暴力侵害妇女现象：从言论到行动，秘书长的研究报告。纽约。
- _____(2006年b)。《建立促进发展的包容性金融部门》。联合国出售品编号：E.06.II.A.3。
- _____(2004年)。《关于妇女在发展中的作用的世界概览：妇女与国际移民》。纽约：经济和社会事务部，提高妇女地位司。
- _____(1999年)。《关于妇女在发展中的作用的世界概览：全球化、性别和工作》，纽约：经济和社会事务部，提高妇女地位司。
-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1989年)。无形的调整：贫穷妇女与经济危机。波哥大，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 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2008年)。将性别平等观点纳入贸易政策主流：个案研究。由日内瓦贸易和发展委员会组织的关于将性别平等观点纳入贸易政策主流的专家会议，2009年3月10日-11日。日内瓦。
- 联合国妇女发展基金(2008年)。谁给妇女答案？性别与问责制：2008/2009年世界妇女的进步。纽约。
- _____(2006年)。数字背后的故事：中欧、东欧和独立国家联合体西部国家的妇女与就业情况。纽约。

-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2009年）。性别与气候变化资源指南。纽约。
- _____（2008年）。促进妇女获得经济权力的创新办法。纽约。
- _____（1995年）。性别与人类发展，《人类发展报告》。纽约
- 联合国提高妇女地位司（2005年）。2000年及以后的妇女：通过信息通信和技术争取两性平等和妇女获得权力。纽约。
- 联合国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亚太经社会）（2007年）。《2007年亚洲及太平洋经济和社会概览：在变幻莫测的时代勇往直前》。泰国。
- _____（2003年）。妇女的社会安全网络。《性别与发展研究》，第4期。曼谷。
- 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2008年）。消除不平等：为什么治理很重要。《2009年全民教育全球监测报告》。巴黎。
- 联合国人类住区规划署（2009年）。两性平等行动计划，内罗毕。
- _____（2007年a）。世界各地妇女获利土地、财产和住房权决策者指南。内罗毕。
- _____（2007年b）“妇女获得土地和住房——乌干达金贾模式”，联合国人类住区规划署，《维多利亚湖区域通讯》，第1期，7月。
- _____（2006年）。《2006/2007年世界城市状况报告》，内罗毕。
- _____（2004年）。“与伙伴合作执行《北京行动纲要》情况自评”，提交非洲经济委员会非洲性别和发展中心，内罗毕。
- _____（2003年）。监督住房权利：制订一套指标以监测人类适当住房权逐步充分落实情况。为2003年住房权监测专家组会议编写的背景文件。内罗毕：联合国人类住区规划署住房权方案和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
- 联合国人口基金（2005年）。《2005年世界人口状况报告》。纽约。
- 联合国人口基金和小额信贷首脑会议运动（2006年）。从小额供资到宏观变化：整合保健教育与小额供资，赋予妇女权力和减贫。纽约。
- 联合国社会发展研究所（2005年）。两性平等：在不平等的世界里为了公正而奋斗。日内瓦。
- Valente, M. (2008). Latin America: future of private pension funds in doubt. 26, Nov. *Inter-Press Service* (<http://www.ipsnews.net/news.asp?idnews=44872>).
- Van Staveren, I., and A. Akram-Lodhi (2003). A gender analysis of the impact of indirect taxes on small and medium enterprises in VietNam.

Paper presented at the conference of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Feminist Economics (27–29 June). Barbados: University of West Indies.

Velasco, C., and R. Marconi (2004). Group dynamics, gender and microfinance in Bolivia.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vol.16, no.3, pp.519–528.

Vleminckx, K., and T. Smeeding, eds. (2001). Child well-being, child poverty, child policy in modern nations. Bristol, England: University of Bristol, Policy Press.

Walker, C. (2003). Piety in the sky? Gender policy and land reform in South Africa. *Journal of Agrarian Change*, vol.3, nos.1–2, pp.113–148.

Walters, B. (1995). Engendering macroeconomics: a reconsideration of growth theory. *World Development*, vol.23, no.11, pp.1869–1882.

Whitehead, A. (2009). The gendered impacts of liberalization policies on African agricultural and rural livelihoods. In *The gendered impacts of liberalization. Towards “embedded liberalism”?*, Razavi, S., ed., London: Routledge.

Whitehead, A. (2005年)。自由化政策对非洲农业经济和农村生计的性别影响。为联合国社会发展研究所关于两性平等：在不平等的世界里为了公正而奋斗的报告编写的背景文件。日内瓦：联合国社会发展研究所。

Whitehead, A., and N. Kabeer (2001). *Living with uncertainty: gender, livelihoods and pro-poor growth in rural sub-Saharan Africa*. Brighton: Institute for Development Studies.

Williams, M. (2007年)。为两性平等和赋予妇女权力供资：从贸易和宏观经济政策角度研究某些理论和实践问题。为联合国提高妇女地位司组织的为两性平等和赋予妇女权力供资专家组会议编写的背景文件，挪威。

_____ (2003). *Gender mainstreaming in the multilateral trading system*. London: Commonwealth Secretariat.

世界银行 (2009年a)。危机重创发展中国家的穷人。第2009/220/EXC号新闻稿，华盛顿特区。

_____ (2009年b)。《移民与发展简报》(3月23日)，华盛顿特区。

_____ (2008年a)。《移民与发展简报》(11月11日)，华盛顿特区。

- ____ (2008年b)。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汇款走廊：使正式转移成为妇女和无证移民最好的选择，雅加达：世界银行，东亚社会发展股。
- ____ (2008年c)。为所有人供资？扩大获得供资渠道的政策与圈套。《政策研究报告》，华盛顿特区。
- ____ (2008年d)。全球私营部门领导人论坛，世界银行集团两性平等计划倡议，小册子。华盛顿特区。
- ____ (2007年)。秘鲁第二个农村公路项目的实施、完工和结果报告。华盛顿特区。
- ____ (2007年c)。私营部门发展与性别。《性别与发展简报》。华盛顿特区。
- ____ (2002年)。爱护森林：发展战略。华盛顿特区。
- ____ (2001年)。促进发展：权利、资源和话语权方面的两性平等。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
- 世界银行等 (2006年)。越南：国家性别问题评估。河内：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联合王国国际发展部和加拿大国际开发署。
- 世界银行、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和国际农业发展基金 (2009年)。《农业中的性别问题原始资料》。华盛顿特区：世界银行。
- 世界卫生组织 (2006年)。生活燃料：家庭能源与健康。日内瓦。
- Yunus, M. (2002). Grameen Bank II: designed to open new possibilities (October). Bangladesh: Grameen Foundation.
- Zelda, C., and M. Rukavina (2007). Borrowing to stay healthy: how credit card debt is related to medical expenses. New York: Demos.
-